

临沂市在山东省的位置

临沂市政区地名图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东夷文化发祥地
-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中国市场名城
- 中国地热城
- 中国书法名城
- 国家园林城市
-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图例

- 市政府
- 县(市、区)政府
- 乡、镇(街办)
- 铁路
- 高速公路及道号
- 国道及道号
- 省道
- 县道
- 省界
- 设区市界
- 县(市、区)界



2011·03,2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文学院

编委主任：王晓嫒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吕国明
高 明 胡爱军 伊廷军
刘兆东 李凤军 颜景芳
高文堂 郑克勤 曲文军
牟海善 王纪明 郑士选
高 雷 王傢玉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朱海涛 王志刚 杨兴文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郑士选

本期执行主编：刘兆东

责任编辑：宋希芝 杜 帅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0）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目 录

【本期特载】

- 不朽的丰碑——记邓小平同志为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题词 高 雷 04

【峥嵘岁月】

- 毛泽东与沂蒙战场（连载） 刘兆东 06
燃烧的土地（连载）
——沂蒙军民抗日斗争记略 朱兆彬 09
父子参军 刘 坤 13

【史海撷萃】

- 沂州幅军斗争纪略 刘洪连 任建华 16
乾隆皇帝与郯城 刘卫星 孙长生 20
古临沂县境内的驿站 李凤军 23

【文化掇英】

- 根植沂蒙沃土的艺苑奇葩（连载）
——山东柳琴戏起源与发展概述 肖 民 25

【名人素描】

- 燕翼堂及其主人 匡秀夫 30
孙镗抗倭殉国 于 泳 33
武宣卞皇后 杜 帅 34

【琅琊风物】

- 记忆中的乡村文化生活 王兆军 36

【古城旧事】

-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9

【探索发现】

- 新发现汤头温泉的重要刻石 刘家骥 许 涛 44
“天外来客”
——莒南大铁牛庙村的陨石 徐淑彬 46

【诗画赏析】

- 美景动诗灵 好诗留美景 李兴河 48
颜真卿书法之古代研究 胡拙安 辑 52

【典籍考辨】

- 曾子故里武城考略 李洪廷 55

【史料辑存】

- 清代历任山东巡抚 井窥斋 58

【文史论坛】

- 马陵之战战址之争 秦士杰 62
特色鲜明 亮点纷呈
——简评《东山区志(1991—2005)》 周 博
张广卫 66

【沂蒙乡亲】

- 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者——王沂蓬 俞 阳 69
雪域神医 门巴将军
——记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总医院院长李素芝
孙文婷 70

【百家渊流】

- 兰陵萧氏 唐士文 72

【沂蒙名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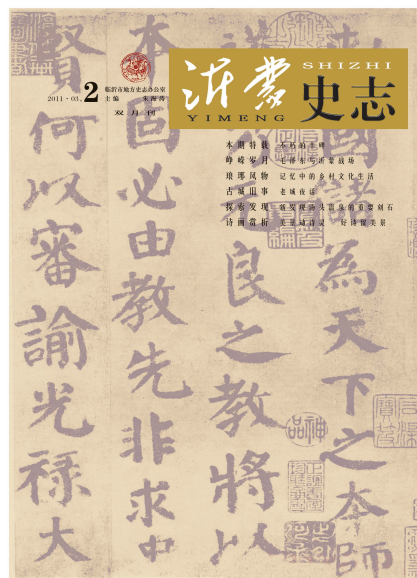
- 架起生命的桥梁
——记临沂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侯子山
刘 伟 77

【史志动态】

80

封面为颜真卿《自书告身帖》

封底为沂南北寨汉墓《乐舞百戏图·马技》拓片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不朽的丰碑

——记邓小平同志为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题词

高 雷/文 李照东/图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坐落于秀丽的金雀山与银雀山之间，背靠神奇的龟驮城，缠绵的青龙河环绕其中，山峦叠翠，流水潺潺，气势磅礴，风光无限。当你轻轻走近她的身边，敬慕之心，油然而生。共和国没有忘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在这里为他们选择了最后的栖身宝地。

光照千秋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是山东、华东党政军指挥中心。为纪念在两战中牺牲的华东区的革命烈士，1949年2月，华东局提议，在临沂建立大型革命烈士陵园。随后，山东省省政府成立了由张云逸、郭子化、许世友等同志组成的“山东省纪念革命烈士建筑委员会”。同年陵园主体建筑烈士纪念塔在此奠基，5月，山东省委、山东省政府派人进京，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为烈士陵园题词纪念，告慰英灵。由此征集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以及董必武、刘伯承、陈毅、罗荣桓等开国元勋的题词，做为国之重宝镌刻在陵园之内。

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步入老年，更加珍视卓越的战斗历程和革命传统教育，在有关方面的促成下，于1990年12月7日欣然命笔书写了“光照千秋·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的题词。表达了老人的革命情结，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理想风范。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但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1992年他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所发表的重要谈话，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阐明了中国发展的方向，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永驻青史。“邓小平同志不仅以他创立的光辉的革命理论指引着我们，而且以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感召着我们”。题词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本人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对沂蒙人民的鼓舞和激励。

毛泽东与沂蒙战场 (连载)

刘兆东

四、“扭住山东这个枢纽”

从1939年到1941年，日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加之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活动，鲁中、鲁南、滨海各抗日根据地被封锁、蚕食和分割。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势，山东党、政、军领导层在诸多问题上认识也不尽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致电将要返回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帮助工作，并进一步指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作为华中、华北乃至东北的战略枢纽的重要性，要求解决好山东领导层的思想认识以及干部配备、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切实“扭住山东这个战略枢纽”。

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化名胡服）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及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滨海区临沭县朱樊村。

刘少奇到达沂蒙后，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坚强的群众观念，深入调查研究，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仔细翻阅山东党政军民有关材料，全面分析战局态势，针对山东存在的问题，相继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



刘少奇在临沭县朱樊村与中共山东领导层合影。左起：黎玉、周长胜、刘少奇、陈光、萧华、梁兴初、罗荣桓。

粮食问题》等8个报告，使山东的干部受到了一次系统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在刘少奇的指导帮助下，山东分局正确总结了抗战四年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各级干部对形势和工作方针的认识，统一了军事指挥，确立了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争取基本优势的中心任务。对扭转山东被动局面，度过抗战艰苦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

五、“暂时恐难休息”

山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任何一个军事家、战略家来说，都是不容轻视的。它北控京、津，牵制东北；西窥晋察豫皖，问鼎中原；南扼徐、淮，威逼长江。占据山东，就可以控制半壁河山。所以日本侵略军不惜重兵予以占领和布防，并千方百计铲除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准了这步棋，所以韩复榘的不战而逃，使蒋介石恼羞成怒，处以严刑，并立即委任心腹干将沈鸿烈予以把守。毛泽东作为千古伟人当然洞察得更清晰，所以派由红一军团改编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军山东。这可以说是高手对决的一招妙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发展，毛泽东的这步棋更显得高深奥妙，迭出杀招。而这步棋灵活运用、发挥到极致的，是毛泽东信任、重用的罗荣桓同志。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又一例证。

1941年前后，山东的抗战局面错综复杂，危机四伏。日军频繁调集重兵，用尽种种残酷的手段扫荡、清剿、围困沂蒙山区。除了正面进攻外，用5万多人进行敌后大扫荡，这在日军侵华史上是不多见的。日军大扫荡之后，在根据地内外修路，挖封锁沟，在主要村镇、交通要道安设据点，构筑碉堡，并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趁火打劫，清除异己，抢占地盘，掀起一次次反共浪潮。而我军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形势极端严峻，稍有不慎，我们在山东这块地盘上就难以站稳脚跟，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同志非常焦虑。1943年，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心彻底解决山东问题，将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五大职务的担子全部压到罗荣桓肩上，完全实现党在山东的一元化领导。在罗荣桓的正确领导下，山东的抗战局面为之一新，踏上了胜利的道路。到抗战胜利时，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最大的唯一以省为建制的根据地。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自卫团发展到200万人，成为共产党发展革命事业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所以毛泽东说，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的棋就活了，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对罗荣桓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毛泽东信任、重用罗荣桓还有一个插曲：1943年，由于日夜操劳，罗荣桓积劳成疾，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当罗荣桓得知中央要委以重任时，担心病体难支，要求休养半年，毛泽东考虑到山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担心外出治病的不安全，就回电说：“你的病如果不是很严重，暂时恐难休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器重。

六、“诱敌深入”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以58个旅约45.5万人的庞大兵力进攻华东解放区。他们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企图首先侵占苏皖解放区，消灭华中野战军或迫其北撤，然后在苏北、鲁南和华中地区与华中、山东解放军决战，进而占领整个华东地区。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统一部署，陈毅率山东野战军南下，配合苏中解放军作战。先后发起朝阳集、泗县等战役，挫败了国民党军的锐气，有效地阻拦和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犯步伐。



1947年1月陈毅（坦克上中）、张云逸（坦克前右一）等在鲁南战役后和战士合影。

1946年12月，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被蒋介石大骂了一通，为加快进犯步伐，遂拟定了苏北、鲁南作战计划：以12个整编师20余万人，从东台、淮阴、宿迁、峰县分兵4路向苏北、鲁南进犯，妄图切断解放军苏北与鲁南之间的联系，进而歼灭华中解放军主力，然后再进占山东。其中敌整编第二十六师为进攻鲁南解放区主力。尤其是新配备的第一快速纵队，全部机械化装备，号称“国军精华”。国民党陆军参谋总长陈诚曾吹嘘说：“有5支这样的纵队，就可以纵横天下。”第二十六师仗恃其武力，像一支箭头直插至苍山一带才驻足，阴谋待其他部队跟上后再进占当时的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并扬言要到临沂城过年。一时间黑云压城，形势骤然紧张。

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洞悉了敌人的阴谋，指示山东、华中野战军回师鲁南，迷惑调动敌人，集中力量全歼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峰（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山东、华中野战军秘密北上，于1947年2月2日22时，突然分左右两路纵队向卞庄之敌发起进攻，经3昼夜激战，除7辆坦克绕路逃跑外，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悉数被歼。2月5日，山东、华中野战军又乘胜向峰县、枣庄发起进攻，至2月19日结束战斗。这次战役共歼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及第五十二师一部共5.3万余人，缴获坦克、装甲车20余辆，汽车400余辆，榴弹炮、野炮、战防炮、迫击炮、机关枪420多门，其他枪支弹药不计其数，为尔后华东野战军成立特种兵纵队奠定了基础。

（未完待续）

燃烧的土地 (连载)

——沂蒙军民抗日斗争记略

朱兆彬

不屈不挠艰苦斗争

1941年至1943年，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狂，中国人民的敌后抗日战争形势日益恶化。日军将侵华兵力的60%、伪军的90%以上，集中到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掀起新的反共浪潮，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沂蒙抗日根据地处在极其艰难困苦之中。

在沂蒙南部地区，1941年2月，日伪军出动坦克、汽车向郯城重坊一带进行“扫荡”。115师教2旅4团奋勇反击，毙敌伪军300余人，击毁坦克一辆。我军也有较大伤亡。4月，国民党51军683团张本枝部，纠集顽固派荣子恒、王洪九、李子瀛、李以锦等部2000多人，向临郯费峰四县边区发起进攻，仅在九女山下就枪杀、活埋共产党员、革命群众77人。5月，刘桂堂（刘黑七）部配合日军袭击费南县委、县政府，先后捕杀抗日军民120多人，费南大部伪化。10月10日，日军从徐州、连云港、兖州、青岛等地调集8000余人，对鲁南根据地进行“长途奔袭”。鲁南三区党、政、军机关遭到重大损失，被迫转移。三军分区副政委赖国清、沂河支队独立一团团长颜岳岩等10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临郯地区大部伪化。10月25日，国民党张本枝部又纠集王洪九突然袭击鲁南区党委机关驻地银厂村，鲁南区委书记赵搏等10余人不幸被捕，后被活埋于九女山西隅，制造了闻名全国的“银厂惨案”。

在沂蒙中、北部地区，敌人“扫荡”尤为残酷。1941年11月，日军出动53000余人，在新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直接指挥下，对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配合下，分兵11路，将山东分局、115师、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围困在岸堤、依汶、马牧池一带，意在一举消灭我党、政、军机关和115师主力。在罗荣桓等领导人果断指挥下，与敌人巧妙周旋，没用一枪一弹，在留田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敌人“扫荡”受挫后，又在泰（安）、石（臼所）、潍（坊）、青（口）公路等交通要道、重要村镇筑碉堡、设据点、挖封锁沟、垒封锁墙，进行“梳篦式”分片“清剿”，毁灭性梯次“蚕食”。尔后又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总力战”，建立伪政权，发放“良民证”，实行“保甲制”，大搞“治安强化”运动。这次，敌人“扫荡”人数最多，时间最久，我们的损失也最大。省战工会副主任陈明、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鲁中区党委社会部长朱玉淦、115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山纵宣传部长刘子超、山东妇委执委委员陈若克、抗大一分校二团政委刘惠东以及国际友人、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等1400多人壮烈牺牲。敌人杀害群众3500多人，抓走青壮年10000多人，抢走粮食160余万斤，家禽家畜等物资不计其数。

在沂、沭河以东地区，1941年12月，日伪军1000多人进犯渊子崖村，全村300多自卫团员和男女老少齐上战场，用土枪、土炮、锄头、菜刀与敌人进行激烈拼杀，消灭日伪军100余人，全村147人壮烈牺牲。充分表现了沂蒙人民不屈不挠、勇于战斗的高贵品质。

面对严峻困境，沂蒙军民咬紧牙关，苦熬苦斗，积累力量，坚持斗争。在军事上，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采取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力发展武工队和民兵，实行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政治上加强攻势，采取“亲友喊话”、“点黑红点”等攻心战术，分化瓦解敌人；在统一战线上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占据沂蒙山区的于学忠部采取主动友好的态度，对以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政权建设上，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各级政权组织；在经济文化上，各根据地普遍实行精兵简政，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扩大物质交流，强化民政、司法、工商、教育运动各项事业。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使沂蒙根据地度过了艰苦的岁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2年4月，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代表刘少奇到达山东，在临沭朱樊一带住了近4个月，帮助山东分局总结了抗战4年的工作。

在刘少奇的指导帮助下，山东分局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巩固抗日政权、争取党在山东优势”的战略方针。沂蒙党、政、军、民认真贯彻刘少奇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日伪军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沂蒙根据地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沂蒙南部地区，1943年春，我抗日军民开展春季反“扫荡”，以机动灵活的战术



与敌周旋，使其“突袭”、“拉网”、“合围”连连扑空。同时抓住战机，短促突袭，连续拔除敌伪据点6处，解放村庄50多个。8月，在平邑松林痛创国民党28集团军北犯部队，将其驱逐出鲁南。接着，集中兵力，发起费县柱子山战斗，击毙伪军、匪首刘桂堂（刘黑七），解放了大片地区，基本恢复了鲁南抗日根据地，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在沂蒙中、北部地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蘑菇战等游击战争，破据点、扒公路、炸桥梁、反伪化，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的“三光”，不断取得反“扫荡”的胜利。这一时期，曾发生了著名的南北岱崮保卫战。1943年12月，日伪军10000多人“扫荡”沂蒙山区，鲁中军区11团7连、8连的93名指战员奉命阻击敌人，在南北岱崮与敌激战。敌人凭借飞机、大炮的掩护，连续向岱崮发起攻击。我抗日战士依托天险勇猛杀敌，在缺粮、缺水、缺弹药的艰难处境下，与敌人顽强拼杀18天，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我军仅伤7人，牺牲2人，被授“岱崮连”光荣称号。

在沂、沭河以东地区，我军采取“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开展边沿斗争。在甲子山区，先后三次发起讨顽战役，消灭了孙焕彩部，打通了滨北与滨南的联系。1943年1月，115师教2旅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日伪长期盘踞的重镇郯城，毙伤日伪军600多人，首创山东敌后攻城范例。与此同时，还开展了赫赫有名的“沭河大戒严”。在160多里的沭河东岸，组织民兵进行大联防，筑起了一道“铁壁铜墙”，使敌人无隙可乘。

在反“扫荡”中，沂蒙人民立场坚定，威武不屈，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沂水县朱家岭和高家庵子村埋藏了《大众日报》社部分机器，敌人将这两个村的群众抓去300多人，架起火堆，当场把人投入火中，并用刺刀连挑三人，威逼群众交出机器，但没有一个人向敌人低头，完整地保存了机器；沂南县横河村妇女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成为家喻户晓的“沂蒙红嫂”。沂水夏蔚区区委委员武善桐，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与敌人同归于尽。沂水西墙峪村村民张效治，背着父亲躲避“扫荡”，路遇我重伤员田桂英，他毫不犹豫地放下父亲，背起伤员冲出包围圈，而年迈的父亲却惨遭敌人杀害。沂南县王换于大娘为革命日夜操劳，动员儿媳将仅有的一点奶水喂养烈士后代，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没有成活。像这样的事迹在沂蒙山区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万众一心迎接胜利

从1944年开始，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敌我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经过6年的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损兵折将，转入劣势；沂蒙抗日军民前赴后继，愈战愈强，我党我军抓住有利战机，向日伪进行大规模反击。

在沂蒙南部地区，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发动春、夏攻势。1944年3月，鲁南军区“长途奔袭”，一举攻克土顽李子瀛部驻地辛庄，彻底歼灭李部800余人；4月，临沂伪军警备12大队杨廷芸部起义，恢复了临郯原有根据地。从3月至7月，鲁南部队作战65次，攻克据点51处，毙、伤、俘日伪军3437人，收复国土3500多平方公里。

1945年2月，鲁南军区发动讨伐王洪九战役，歼敌1000余人，攻克了岑石、沙沟崖等5处据点；6月，配合滨海部队歼灭梁钟亭部4000多人，解放了郯城，鲁南、滨海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沂蒙中、北部地区，沂蒙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主力发起第三次讨吴（吴化文）战役，毙、伤、俘伪军7000多人，攻克据点59处，大大改善了鲁中根据地的形势。8月，攻



用乳汁救助伤员的沂蒙红嫂——明德英（左）

克沂水城，沂中全境解放。1945年3月解放蒙阴城，毙、伤、俘日伪军1200余人。为了挽回败局，1945年5月，日军集中海、陆、空3万多人向沂蒙腹地“拉网扫荡”，妄图一举摧毁沂蒙抗日根据地。沂蒙军民采取了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术，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军民并肩作战，内线、外线歼敌，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粉碎了日军对沂蒙山区的最后一次大“扫荡”。8月，费城之敌弃城逃跑，蒙山南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沂河以东地区，1944年1月，滨海专署发布《关于拥护抗日军队的决定》，号召各地开展拥军优属工作，迅速掀起参军热潮，全区一次就参军6343人，完成原计划的373%。接着，连续发起春、夏攻势，毙、伤、俘日伪军2000多人，争取了伪军莫正民部3500人反正，解放了滨中地区。至此，滨海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沂蒙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8年抗战，沂蒙军民取得辉煌战果，共作战4万多次，毙、伤、俘日伪顽25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0余万只，火炮500门及大宗军用物资等。但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我党、政、军伤亡4万多人，有20万人民群众惨遭杀害，房屋、粮食、牲畜等物质损失更是难计其数，沂蒙地区受到空前浩劫。

在浴血奋战中，沂蒙人民广泛发动起来，中老年人参加自卫队，青壮年参加民兵组织，妇女参加妇救会、识字班，儿童少年参加儿童团，他们积极参战，踊跃支前，站岗放哨，救护伤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御辱、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沂蒙党、政、军、群等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很大发展，为后来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沂蒙的抗战史，是沂蒙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历史；是开辟根据地、创建新社会的历史；也是沂蒙精神诞生发展的历史。在这场空前伟大的斗争中，沂蒙军民携手并肩，万众一心，演奏出一曲气势恢宏的时代颂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华灿烂的篇章。

（全文完）



父子参军

刘坤

日本兵一打来，我们家乡——山东临沂县任桥村（后来任桥划归苍山县），就被烧得精光。爹和娘含着眼泪，在烧焦的屋框里，搭起一个破席棚，一家人白天出去给地主家干活，晚上就蜷缩在这里歇息。

一天夜里，狂风卷着大雪，扯得席棚吱吱作响。我蜷在草堆中，冻得牙齿咯咯直打架，怎么也睡不着。迷迷糊糊听见爹和娘在小声谈着话，起先是商量借粮的事，后来爹突然说：“高泉回来了！”

我心里不由一喜。高泉是俺庄最早参加八路军的一个。他们部队就在我们这一带活动。他每次回来都教我们唱歌，讲打日本的故事。现在听说他又回来了，我一丝睡意也没有了，睁大眼睛听爹继续说下去。

爹说：“坤他娘，我想跟高泉去当八路打日本，你看怎么样？”娘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才抽抽噎噎地说：“你走了，我们娘儿几个可怎么过啊！”

俺家九口人，只有爹一个劳动力。爹一年到头拼死拼活给地主干活，还顾不住全家吃糠咽菜，妈还要到地主家去洗衣服，做针线，挣一点残汤剩饭。要是爹一走，日子就更难熬了。妈这一说，爹也不讲话了。棚里一阵寂静，只有寒风像要席卷一切似地打着唿哨，一阵阵从棚外滚过。

突然爹说：“那就叫坤跟高泉去吧？”

娘听了就说：“你发疯了，孩子才十四岁，连大枪也扛不动呀！”

爹又说：“扛不动大枪，可以背盒子炮嘛！”



娘哭道：“我舍不得。”

爹生气地说：“唉哟！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你光知道疼自己的孩子。你看咱村多少年轻人参加了八路，人家也是父母养的嘛！”过一阵，爹又说：“你没听高泉说，国亡了哪还有家。只有把鬼子撵出去，才能过安生日子。”爹越说声音越大，娘埋怨道：“看你，把孩子吵醒了！”接着，深深叹了口气：“那就让孩子去吧！”

我一听娘答应了，全身顿时热了起来，牙齿也不打架了。我是多么想当八路军啊！每当看到村里的年轻人一批批去参加八路军，我就抱着爹娘的膝盖央求，但爹娘总是说：“你还太小呀！”不让我去。

这一夜过得真慢，好不容易熬到公鸡叫。我悄悄爬起来，迎着刺骨的寒风，踩过膝的大雪，一股劲跑到高泉家门口。大门还结实地关着哩！我焦急地在大门外踱来踱去，一直等到东方发白，才见高泉开门出来。我迎上去就问：“我年纪小，当八路要不要？”

高泉愣住了，睁大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我要当八路，打鬼子。是爹叫我来的。”

“噢！”高泉笑了。他把我叫到屋里，用条帚扫去我身上的雪，亲切地摸着我的头说：“是爹叫你来的吗？好！明天我带你去试试看。”

第二天，太阳照到当头的时候，高泉带我来到沙埠村。村子里不断碰到三三两两的八路军，有的扛着枪，有的扛着梭镖或大刀。还有一些年龄和我不相上下的小八路。看到这些小八路，我的心立刻踏实了。心里想：“不收我就不行，兴人家当兵，就得兴我当兵。”

我跟在高泉后面一蹦一跳，走进一间小屋里。高泉告诉我这是连部。一个粗眉毛、大眼睛、红脸、高个儿的人站在我面前，笑眯眯地望着我。高泉向他敬了个礼，说：“连长，这是俺村的刘坤，来当八路军的。”

我也学着高泉的样儿给连长敬了个礼。连长张开大嘴笑了，一双大手按着我的肩头问：“你是自愿来的吗？”

“嗯。”我望着他，点点头。

“来干什么？”

“背盒子炮，打鬼子！”

周围的几个同志听了我的话笑了，但连长没有笑，又问：“为什么要打鬼子？”

“不愿意当亡国奴呗！”

连长满意地点点头，随即叫人拿来又热又香的煎饼。我一点也不拘束了，放开裤腰带，美美地吃了个饱。

饭后，一个圆脸中等个儿的八路军——大家叫他二班长，把我带到班里。他帮我换上一件又肥又大的棉袄，束上一根皮带，插上两颗手榴弹，背上一把闪闪发光的大刀。我高兴得不得了，神气十足地在屋里一摇一摆走了几趟。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这两个月里，我给班里同志添了不少麻烦：夜里不敢站岗，班长和同志们陪我站；行军走累了，同志们帮我背东西，到了宿营地烧水给我洗脚；鞋子破了，班长趁我睡觉的时候，给我补好……

一天下午，班长正教我读识字课本：“侵略军，狗强盗，带着飞机和大炮，来到中国瞎胡闹……”读着读着，忽然有人大声喊：“刘坤，你爹来啦！”

我丢了识字课本，爬起来就往连部跑。跑到连部门口，听见连长说：

“你是自愿来的吗？”

“是自愿来的。”

啊！可不真是爹的声音吗！我一头闯进连部。爹见了我也高兴得站了起来，走到

我面前，只顾上下打量。过了好一会，才摸着我的头激动地说：“坤，爹来和你一起干八路，打鬼子啦！”我连忙担心地问：“娘怎么会让你来呢？”

爹叹了一口气，说：“你走后，鬼子又下咱村‘扫荡’了几次，咱家那个破席棚又给狗日的用刺刀挑了。村里的年轻人受不了鬼子、汉奸的气，都跑出来当八路军啦！你娘说：‘你在家我也是要饭，你走了我还是要饭。去和坤一起当八路吧！早点把鬼子打跑。’”

我听了心里又高兴又难过，泪水扑簌簌地滚了下来。爹用袄袖替我擦了擦眼泪，反而笑着说：“当了八路军就不兴小孩气啦！你娘要是知道咱爷儿俩在一块当兵，不知会多高兴哩！”

连长把爹分在我们二班。和爹在一个班里抗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每次集合出操，爹站排头，我站排尾。向右看齐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爹的鼻梁，夜里睡觉，我和爹睡在一个被窝里。

可是，不久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爹有个怪脾气，做错了事，班长和其他同志说他，他不过红红脸，就接受了，可我说他，他就横眉瞪眼，直想打我。有次出操，班长已经发出了“立正”口令，可爹还弯腰擤鼻涕。班长看了他两眼，他仍没有觉察。等一收操，我就冲着他说：“爹，你怎么搞的？班长喊过‘立正’了，你还擤鼻子！”

同志们都看着爹笑，爹把涨红的脸向下一拉：“别人没说我，你才当了几天兵，就来管我啦！”气得我一天没和他说话。到了晚上，爹背着班里的同志把我叫到一旁，先是检讨他的不对，然后说：“我才来，不大懂部队上的规矩。今后，我有什么错处，你看我两眼，我心中就有数了，可别在大家面前，叫我下不了台……”打这以后，爹不管做什么事情，眼睛总瞅着我。比如上课，别人都坐得好好的，可他因在家里蹲惯了，偏爱蹲着；但见我一使眼色，他就连忙坐下了。

爹到底是年纪大经事多，经过学习各方面的进步都比我快，有好几次战斗，他都受到连长的表扬。有一次，城里头的500多鬼子和300多伪军下乡抢粮，我们和他们打上了。我趴在坟包上向敌人射击。战斗越打越激烈，因为敌人太多，情况不利，班长发了撤退的命令，我只顾打枪，扭头一看，班里人都走完了。我手脚一慌，拉下的枪栓还没推上去，爬起来就去赶队伍。大约跑有50多公尺，觉着敌人并没追我，这时才发现班长和爹在掩护我。我加快几步，一下滚进班长的工事。举枪一看。糟啦！枪栓丢掉了。

“枪比命还要紧哩！”入伍后，班长老是这么教育我，我顾不了向班长请示，提起枪又往回跑。爹和班长大声喊：“刘坤！你要干什？”我头也不回地大声说：“枪栓丢了，我去找枪栓！”还好，跑了不到20公尺，枪栓就找到了。我拾起来赶忙又往回跑。子弹在我身旁扑哧扑哧直叫，真险呀！

战斗结束后，在班的战斗检讨会上，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气冲冲地朝我说：“你的眼长到哪里去啦？班长打撤退的手势，你为什么不看！没有一点组织观念。”

这时，班长又站起来说话了：“连长经常给我们说，一个战士，不但要机智勇敢，还要时刻注意指挥员的动作和口令。以后战斗中，刘坤同志要特别注意，不然会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散会后，爹又找我个别谈话。近来，他总是这样，不管我犯了什么错，开会批评过以后，总要找我再谈谈，上个小课。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1939年冬天。这时候我们的家乡成了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家里的生活有了保障，母亲也不再出去要饭了。从此以后，爹的抗日劲头更大了。班里的同志都称他“老积极”，他成了连里到处受欢迎的人物。

沂州幅军斗争纪略

刘洪连 任建华

沂州幅军是太平天国时期爆发在鲁南地区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武装。清初，民间秘密团体增多，结帮、练武形成风气。京杭大运河流经的江苏省徐州、海州、邳县、宿迁和山东省郯城、兰山、滕县、峄县一带的漕运船夫与贫苦农民，以“拜幅”的形式，组成秘密团体，反抗封建压迫。因凡入该组织者均以幅巾勒头，故被统治阶级称为“幅党”、“幅匪”。当时，这类组织呈分散式结构，互不相属，各自活动，且称谓不一。兰山、郯城一带称“幅”，台儿庄一带称“复”（幅），费县、峄县一带则称“棍”。因此旧籍在叙及此组织时往往“幅”、“棍”混用。王闿运《湘军志·平捻篇》云：“当时称谓，郯、兰境内曰幅匪，滕、峄境内曰棍匪。”到咸丰元年，由于黄河决口导致饥民累万，漕运改道造成船工失业，太平天国军队北伐，周边区域如安徽、河南捻军，邹县文教军，淄川刘德培起义军革命势力的推动，加上本地一部分官宦世家为代表的反清潜在意识与明末清初“九山王”王俊反明抗清斗争精神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导致了鲁南幅军武装组织的壮大。

幅军自1851年（咸丰元年）起义至1863年（同治二年）失败，在兰山、郯城、费县、峄县一带坚持武装斗争13年，配合太平天国、捻军、文贤教军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幅军起义失败后，其余部在阎广太等率领下，继续活动在苏北、鲁南一带，1875年遭清军合击，阎广太被俘死难。1876年，幅军首领赵庆安、张飞豹聚众至郯城县奶奶庙密谋起义，被清地方官府缉拿杀害。沂州幅军配合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



幅军旗山大寨遗址

爱塔传奇提供

起义军的斗争，大致经历了发展、壮大和衰亡三个阶段：

从1851年（咸丰元年）至1858年（咸丰八年），是幅军在起义中不断发展的阶段。1851年（咸丰元年），峰县靳豹、宿迁朱有谷、海州侯应元、沭阳陈玉标、郯城吕科仔及朱广田、刘雪德等纷纷在苏北与苏鲁交界地区举行起义。翌年6月（农历四月），苏鲁边地区大批无业饥民踊跃参加幅军。1853年（咸丰三年），费县有陈更池、薛得志、王升、阎三虎等于7月间在费县仲村集、仙姑庙（今属平邑县）结幅起义，活动范围遍及新泰、蒙阴、沂水等毗邻山区。靳豹、朱有谷、侯应元所率苏北幅军，则在苏鲁边境互相配合、支援沂州幅军。此时即幅党时期，其成员主要是失业船工、盐贩、无业农民、裁汰兵勇等。幅军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地主劣绅，抢掠分发其浮财。除由苏北入鲁的幅军陈玉标等部已与莒州、日照等地的地方兵丁交战（因缺作战经验被官府击败）之外，沂州本地的幅军尚采取昼散夜聚的活动方式，对于官兵虽亦拒捕，但未敢明显抵抗。此期，沂州幅军较固定的活动地点为今苍山县的城墙山（亦称成全山），宋三冈、邱春、于洛、万甲申、周克生（被官府称为周匪）最早据此。由于声势不大，清政府无暇顾及，只令地方官兵镇压。

随着全国农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幅军逐渐成为攻打清官兵和地主团练的武装力量。1855年8月1日（咸丰五年农历六月十九日），黄河因连绵暴雨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海。黄河改道使此带河道干涸，对捻军北上十分有利。秋，捻军进入鲁西南和邹、滕各县后，促进了鲁南幅军的快速发展，呈现出“江南邳州、宿迁、海州、沭阳，山东兰山、郯城、滕、峰等邑，幅匪千百为群，次第蜂起，夺攘矫虔，吏不能制，邑中桀黠，闻风相效”（见光绪二十一年《重修费县志·兵事纪略》）的局面。魏春、贾玖、梁光松、刘朝中、翟三（官书称为翟三秃子）、李其孟（官书称为李希梦）、褚四（官书称为褚四丫头）等积极组织联络贫苦农民，建立队伍，活动于蒙阴、费县、泰安、滕县等地。咸丰六年冬，费县石井人李其孟结众千余人，先后在兰山、郯城、费县、蒙阴、沂水等地打击当地劣绅，擒杀了梁邱团练长宋德升。其弟宋德基为此赴京控告，惊动朝廷，遂严飭山东巡抚崇恩查拿。咸丰七年二月初五，邳州新起幅军首领马汶标，带领300余人进军费县关阳镇、兰山县洪（横）山沟（今属苍山县），与当地幅军首领阎三虎、宋新诗部汇合，组成800余人的武装，击败了沂州府知府成善的官军。之后，这支队伍又南下江苏，与苏北幅军汇合，进攻苏鲁边的张家塘村，

焚烧了民团头目谢庆升家的房屋，尔后转移到磨山、层山（今属苍山县）一带。4月6日，马汶标、阎三虎率所部在兰、邳边境的高桥、石井等地与沂州协都司姜长清部官兵展开激战，幅军受挫，阎三虎被擒杀。马汶标率部北上蒙山，于费县张柳庄、郑城一带与费县知县所率官兵交战后，又巧妙地折回层山休整。此期，统治阶级为了扑灭幅军起义之火，加强了对幅军的镇压，使幅军遭受了一些挫折，一批首领亦在作战中被官军俘、杀。如：咸丰八年二月，费县知县收买李其孟部头领岳得安作内应，设伏杀害了李其孟和其兄李其孔（官书为李希空）、其弟李其贤。活动于蒙山一带的马汶标也因叛徒出卖而遇害。尽管如此，幅军并未气馁，反而更加积极地打击与义军作对的地主首劣，使“凡充团长之家多被其害”（见光绪二十一年《重修费县志·兵事纪略》）。在与官兵作战中，幅军亦打了一些漂亮仗。如幅军首领翟三（邳州四户人）在李其孟被害后，即收容了原李部属众，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六月，翟联合贾九部进攻兰陵，打死兰陵县丞姚凤长，活捉了兰山知县刘锦堂，山东巡抚崇恩因此而被清廷“摘顶”。此系幅军起义后开展斗争的第一阶段。此期，各部幅军规模尚小，互不相属，时而集中出击，时而分散隐蔽，相对而言，其力量尚不十分强大。

从1859年（咸丰九年）到1862年（同治元年），是幅军斗争的第二阶段。1859年（咸丰九年）春，翟三、于洛、邱春等部幅军乘捻军之势，转战峰县、兰山一带，新起幅军周克生等率众应之。不久，在山东巡抚崇恩奏留宁古塔副都统德楞额所率黑龙江骑兵进驻韩庄进剿义军的情况下，原在滕、峰活动的幅军多转移到兰山县和费县。他们与原在该地活动的幅军配合，势复炽盛。在此情况下，崇恩不得不命兖州官兵400人屯于兰、费，命泰安营守备率兵400余扼守九女关、白马关和紫荆关等隘口，以阻幅军向北发展。农历六月初，幅军集3000人分驻兰山县郭里、卞庄（今属苍山县）和费县集山诸处，并于是月上旬起，袭平邑集、上冶村，6月17日攻克平邑，进逼费县城，呈现出“旋灭旋生，愈扑愈炽”之势（光绪二十一年《重修费县志》）。咸丰十年二月，万甲申在尚岩聚众起幅，伏击了前去镇压的费县知县周鹄所率官兵，在新庄打死了沂州府千总王寿椿、外委段继先及其民团五、六十人，知县周鹄和把总张永庆仅以身免。兰山、蒙阴、费县地方官员纷纷告急。山东巡抚文煜遂令德楞额、郝士庠率部星驰增援，阻挡幅军北进。五月，幅军洪佃部与海州盛宗元部汇合，由峰县过大运河进驻红山，击败兰山知县胡叔琳部和兖标游击范正坦部及峰县民团，使调任峰县知县的周

鷓不敢与之交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军“辄堕伏匪，相戒勿深入”的局面。咸丰十一年二月，安徽捻军进攻山东，幅军乘势扩张，各部相继占山称王，建立据点。在沂州境内，周克生据大青山，邱春据黎墟、黄路山，宋斌、宋三冈（即宋世烈）据车辋崮，万甲申据城墙山，孙化祥据旗、旺二山，程四虎（名程九三）据水寨马头山，岳相林据阴阳寨，张九仔据立尖崮，王洪平据几辈崖山，刘淑愈、李宗堂据耿家埠圩……幅军山寨，“势如连鸡，首尾相应，官军孤单不能进战”（见《山东军兴纪略·幅匪（二）》）。各部幅军互相策应斗官军，四处进攻地方团练，派人向附近圩、寨散发旗帜，扩张势力。此时，运河以北，蒙山以南，西至滕县，东至沂河，仅剩峰县夹谷山、费县东墪、徂庄铺、天保山等几处地主圩寨固守不降。而幅军足迹从南部运河北到淄川，东至海滨。蒙阴赵红进、郑士元，新泰李成、刘季勇，莒县李建道等纷起响应，组织武装。力量强盛的幅军开始集中较大兵力打击清封建势力。如咸丰十一年三月，幅军一牛姓首领（官书称为牛闺女，其真实名字不详）联合兰山、峰县等地的万余名幅军，一举攻破关阳圩，杀死清拔贡生、兵部主事李松荫之子——候选训导李默及眷属30人，团丁200余人。东墪团练王殿麟之子王肇鼎亦于同年夏被李宗堂、李八、张太基部幅军斩杀。

幅军由小而大的发展形势，震动了社会各阶层，使参加幅军的人员非常广泛，连清朝进士、廪生、秀才、财主、商人、艺人、僧道亦纷纷加入到幅军队伍中来。沂州团总王嘉麟在镇压幅军起义后所撰的碑文中称：“自咸丰十一年吾乡土匪蜂起，始而市侩效尤，继而读书之人、殷实之家亦甘心乐从。又有为骑墙之见者，畏贼通贼因而作贼。”同治十年，费县知县史致仁在《创建高桥义学碑记》中称：“自咸丰间土匪倡乱，贼众出没其中，若荆山寺、胡家村、石井诸寺庙，据为巢穴，该僧道竟附为羽翼。”在平邑水寨程四虎部，盛传妇女守卫山寨吓退清官兵的事迹，都证明这次农民革命的深刻程度。

1862年（同治元年）初，活动于鲁南地区的幅军主要有：一是以峰县与费县交界处的云谷山为中心的刘双印部。咸丰十年夏，刘双印与牛闺女、滕四率众数千人，响应捻军号令，据守云谷山，清军久攻不克。后捻军张乐行、刘天福部被官军击散，多投奔刘部，山中义军增至万余人。同治元年正月，刘与兰山、费县的幅军相配合，转战于峰县、兰山、费县毗邻的兴林、甘露、郭里、黑风口一带。是年秋，刘双印部攻占齐村、邹坞、夹谷等地，大败清军后，继而联络长枪会和邹县白

莲教文贤教军，大败前来进剿云谷山的清军德楞额部。此后，刘部在鲁南名声大振。二是宋三冈、宋斌、程四虎部。先是宋三冈和宋斌率千余名幅军，联合姜三壮部转战于兰山、莒州、蒙阴等地。同治元年，该部进军莱芜，与莱芜知县所率官兵交战时，驻于费县水寨的程四虎闻讯后率兵赶去支援，挫败了官军。之后，宋三冈与程四虎及其他小部幅军相联合，以蒙山为中心建立据点，不时进击新泰、泰安、莱芜、蒙阴等县的地主圩寨。五月，谭廷襄令千总郭大胜率兵500余名，在数千名费县地主武装的配合下，进攻幅军水寨。程四虎先是突围离寨，后又联合白莲池教军回军反击，大败清军。九月，程四虎、宋斌率部北上临朐，支援淄川刘德培的起义军，因遭蒙阴、沂水两县知县阻击，退回费县。三是孙化祥部。孙化祥是费县幅军后起首领。咸丰十一年春，与其兄孙化清结幅起义，以旺山、旗山为依托开展斗争。是年夏，耿家埠幅军首领李宗堂、刘淑愈（进士出身）率部到旗山与孙化祥部会合，共建旗山幅军。孙化祥拜刘淑愈为军师，孙、刘合兵后，旗山幅军力量迅速壮大。孙以旗山为大本营，称九山王（又称七十二寨主），逐步统一了周围各部幅军，号称拥众10万。在孙化祥率领下，旗山幅军攻东墪，克南尹，援淄川，占仲村，连连奏捷，是此期鲁南幅军中最强者。刘淑愈曾为旗山大寨营门题联：“东狩获麟，寝其皮食其肉；中原逐鹿，大者王小者侯”，体现出反抗清王朝的鲜明的政治纲领。

幅军初创时期，各部互不相属，其首领多沿袭明末义军首领王俊故态，自称为“九山王”。后随着斗争的需要，亦曾有封王、推王之举。第一次是封王：咸丰十年夏，太平天国封峰县侯孟人刘平为“北汉王”，冀图由他统一领导运河以北各部幅军，配合太平军进行反清武装斗争。台儿庄之战失败，刘平战死，刘双印退踞峰、费交界处的云谷山，自称大幅主。第二次是推王：同治元年十月，兰、费、峰一带幅军需要联合行动，刘双印认为车辋宋斌系翰林宋小坡后人，有号召力，于是推举宋斌为王，统一领导北征。宋斌封万甲申为将军，封孙化祥为镇北将军，孙虽不受封号，但仍出军配合作战，清政府在青石关一带布重兵截拦，幅军以蒙山为依托，盘桓新泰、蒙阴、莱芜一带数月，因意见不一，丧失了北进战机，只得返回各自山寨。此系幅军斗争的第二阶段。在这为期4年的斗争中，幅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虽未形成严密的统一领导体系和公认的义军领袖，但各部幅军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并与捻军及白莲池教军互相配合作战。到同治元年，汇聚成刘双印、孙化祥等几支实力较强的部队，相互间的联系亦较之以



前更为密切，协同作战已屡见不鲜。

从1862年（同治元年）冬至翌年秋，是鲁南幅军由盛转衰的阶段。同治元年腊月十一日，清军参将张从龙、千总张学圣、郯城县丞李思谦奉总兵陈国瑞令攻幅军营寨徐圩，圩破，幅军200余人死难。自此始，清军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式，使兰、郯、费幅军的一批重要据点如长城、仲村、旗山、旺山、黎墟、水寨等相继失陷，首领刘兆青、孙化祥、邱春等相继战死。1863年（同治二年）8月2日（农历六月十八日），官军在幅军叛将王荣祥等配合下，攻破宝泉崮幅军据点，幅军首领程四虎于8月6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率4000众向清军投降。此后不长时间，活动于费县一带的幅军也被镇压殆尽。坚持武装斗争13年的鲁南（沂州）幅军终于彻底失败。幅军起义失败后，参幅人员遭到清政府清查屠杀，民众因株连受到地主团练的血腥报复，被杀和逃离家乡者不计其数。“沂水城边鬼夜哭，十万生灵遭毒痛。”清泰安人汪宝树的诗句，即是对当时统治阶级肆意报复滥杀参幅人员及亲属的真实写照！

幅军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幅军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不少幅军首领受阶级的局限，多“霸山为王”，甚至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时互相火并，影响了各部之间的团结。二是幅军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后期虽建立了一批据点，但由于活动范围不大，致使军需不足，兵源有限，加之武器低劣且缺乏作战经验，难以抵御训练有素的清朝正规官军。特别是清总兵陈国瑞带2000余名装备有洋枪的官兵入鲁南进剿幅军后，使双方的武器优劣更加悬殊。三是在清军的大规模围剿面前，大批幅军首领相继叛变，反戈相向，从而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四是幅军缺乏强大的外部援助。此外，当时沂州府属严重缺粮且流行瘟疫，也是造成幅军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乾隆皇帝与郯城

刘卫星 孙长生



乾隆，谥号清高宗纯皇帝，姓爱新觉罗，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公元1735年（雍正十三年）即位，次年改元乾隆。在清代，人们习惯以年号为名，故称之为乾隆皇帝。他善于文墨，通晓韵律，又喜爱巡游，四处题诗，因而有人说他是风流天子。有关他的轶闻趣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久不衰。近几年经过《书剑恩仇录》、《宰相刘罗锅》、《戏说乾隆》、《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文艺作品的炒作，使这位皇帝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乾隆皇帝在郯城也留有诸多传说，有的有证据可循，也有的无从考证，难怪有人提出疑问：乾隆是否真的来过郯城？他为什么会来郯城？又在郯城做了些什么？对郯城的社会文化有多少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亦曾引起笔者的思考。因此翻阅了有关史料，初步理清了乾隆皇帝在郯城的来龙去脉。现整理成文，以资存鉴。

乾隆皇帝在郯城的“巡幸”

根据正史所载，乾隆皇帝曾经六次来郯城视察，时称“巡幸”；先后在郯城逗留十余天，时称“驻蹕”。《辞海》将“巡幸”解释为古代帝王巡行地方，“驻蹕”解释为古代帝王出行在途中停留暂住。乾隆《郯城县志》记述前三次巡幸，对于后三次巡幸，嘉庆《续

修《郯城县志》开卷即称：“皇帝巡幸，驻蹕行宫，无藻流辉，恩纶叠降，恭纪篇端，以昭诚敬”。两部县志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乾隆皇帝巡幸郯城的基本情况。

(一)

乾隆皇帝第一次来郯城是1751年2月27日（乾隆十六年二月初二）。当时正值初春时光，风和日丽，皇帝也正值年富力强，威加海内。刚刚告别龟蒙的崇山峻岭，忽见郯城田野广阔，大道平坦。乾隆在春风得意之际诗兴大发，御制七律一首（下文有专题介绍）。郯城这边的文武官员、绅衿秀士和耆民老妇都俯首跪在城北五里铺，迎接圣驾的光临，皇帝则赏给耆民老妇银牌。据《高宗实录》记载：二月初三日，乾隆传谕将当年御道两旁的地亩钱粮（赋税）蠲免十分之三。还特意加上“见兰山、郯城二县民气似逊他处，深为軫念。著将兰山、郯城二县极次贫民，俱加赈一日。”同时命令山东巡抚准泰（满族）遵旨速行，一定要让百姓都得到实惠。

乾隆的首次郯城之行轰动不小，“分数蠲免，发粟赈济”。“士民建感恩亭于城南三里，立碑颂德。”这感恩亭就是人们常说的南皇亭，遗址在郯城县郯东路与皇亭路交界处北侧，原郯城酒厂南。

(二)

乾隆皇帝第二次来郯城是1757年3月21日（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二）。其实，皇帝于二月初一就已进入了郯城县境，在县城西北60里的桥头大营驻蹕。

二月二进驻县城之南12里的曹村大营。二月初三到达红花埠，然后告别山东，进入江苏，开始了江南巡游。

乾隆这次来郯城，仍和上次一样，蠲免了当年御路两旁地亩钱粮的十分之三，凡老民老妇都赏赐给银牌。

(三)

乾隆皇帝第三次来郯城是1762年2月24日（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初一），前后三天。二月初一驻蹕县境西北的桥头大营，知县张金城随营带领引见，二月初二驻蹕县城西边的“郯子花园行宫”，二月初三各官送至红花埠，出郯境取道赴江南。

这次巡幸和前两次不同。当时山东巡抚阿尔泰为皇帝预先建造了一座行宫。行宫的位置在“郯城县治之西三里花园庄，花园庄即古郯子花园也。”这座行宫雄伟壮观、气势恢宏：前面有大宫门、垂柱宫门、内宫门，宫门外有御桥三座；后面是皇后寝殿、配殿和照房穿廊；东面是御书房、茶膳房、朝房和外勤房；西面是皇太后寝殿、照房和宫门穿廊；最中央是皇帝的寝殿、便殿、左右配殿和宫门穿廊。在这座行宫里，乾隆皇帝召见了沂州知府李希贤，询问了沂沭河两岸的形势。李知府汇报得很有条理，博得乾隆的称赞表扬，并接受了皇帝赏赐的一副字画。此时皇帝兴犹未尽，又挥毫写诗一首，并御制对联一幅，装裱于寝宫东次间。知县张金城随之道贺，紧接着在御书房后面建立御笔亭一座，刻碑恭纪这次巡幸。

乾隆从江南回銮后又传下圣旨：凡办差的文武官员俱有赏赐。除前次的蠲免、奖励之外，又恩赐缎匹、貂鼠、荷包等物。知县张金城获赏锦缎一匹。同时，官员们有参罚者开复，无参罚者加俸一级，以示“皇恩浩荡”。当然，普通百姓就与此无缘了，或许还要付出更多的血汗。

(四)

乾隆皇帝第四次来郯城是1765年2月21日（乾隆三十年二月初二），驻蹕在“郯子花园行宫”。像以前一样，皇帝下旨蠲免御路两旁地亩钱粮的十分之三。

(五)

乾隆皇帝第五次来到郯城是1780年3月12日（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一），当日驻蹕新建的“问官里行宫”，写下七言律诗一首，御制楹联一幅。次日驻蹕“郯子花园行宫”。这次巡幸除了蠲免地亩钱粮以外，还赠给郯城《御题平定西域全图》两份，还有佛像石刻一帧，澄泥砚

六方。这些国宝分别被“恭贮”在两座行宫之内。

应当补叙的是：早在1779年（乾隆十四年），山东又一任巡抚国泰（满族）在郟城城北问官里增建行宫一座。这座行宫规模更大，景观设置颇多，楼台亭阁、折桥游廊共计177间，以备皇驾光临驻蹕。可惜的是这座行宫现在已荡然无存，所收藏文物也不知流落何处。算起来这座建筑距今只不过二百来年，史料尚在，遗迹难寻，实为憾事。

（六）

乾隆皇帝第六次来郟城是1784年2月29日（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初五）。当日驻蹕于“问官里行宫”，次日驻蹕在“郟子花园行宫”。除了蠲免御路两旁地亩钱粮的十分之三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馈赠。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年过古稀。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巡幸，也是郟城最后一次接待全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从此以后，整个大清王朝也像乾隆一样走过了巅峰时期，进入了举步维艰的衰老阶段。

乾隆皇帝来郟城的原因

乾隆皇帝先后六次来郟城，并在郟城驻蹕十多天，是有一定社会背景和特定原因的。

乾隆皇帝生在盛世，长在宫廷，即位于成年。康熙的励精图治和雍正的集权专制为他奠定了坚实的统治基础。而乾隆皇帝本身也做了许多维护统一、稳固国防、奖励生产、发展文化的大事。纪晓岚曾称赞他“圣学渊博，精明强干，历世练达，经天纬地”。乾隆前期风调雨顺，海内升平，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史称“康乾盛世”。全国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为乾隆的“巡幸”提供了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

乾隆一生多次外出巡游，他曾四次东巡到达盛京（今沈阳），两次西行漫游嵩山洛水。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他六下江南。为了南巡顺利，他提前几年派人勘察御路。1749年春，山东巡抚准泰曾有奏折，声称经过山东原有中路和东路可供选择。“自泰安至红花埠一路，较之兖郡至韩庄闸稍远，似应从中路行。”但是乾隆没有同意这个建议，特别传谕准泰，令他会同江南督抚再行考察，详悉商酌。“将两路应行之处，速行绘图，定议请旨，候朕指示。”当年冬天，准泰绘好地图，呈报时再次建议说：“滕县至黄林庄一带道路宽平，应请钦定中路为御蹕大道，其属甚便。”然而，乾隆依然没有采纳准泰的意见，他审阅地图，最后敲定：走东路，经郟城，过红花，下江南。现在分析，很可能出于如下考虑：

第一，乾隆是一位文化造诣很高的皇帝，即位后就开“博学鸿词科”，四处寻访书籍。后来还完成了《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南巡时走东路经郟城，可以更好的领略齐鲁文化。在东路上途经曲阜，他祭祀了孔庙，想必也是看到了“圣迹”里的《学于郟子图》。既然孔子曾经东游郟地，问官倾盖，他也要沿着圣人的路走，把郟城圈定为驻蹕之处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从地理位置上看，郟城是山东最南部的县，红花埠驿站是山东、江南之间的枢纽。“郟邑为江苏接壤，山左通衢，銮舆必历，省耕省敛。”在郟城驻蹕，可以很好地了解山东、江苏两省的耕作制度和收成情况，便于比较两地风土民情的异同。乾隆的祖父康熙大帝南巡时也曾走过这条道路。

第三，乾隆南巡不仅是观光游玩，他还要掌握和了解各地的政治情势，以便加强其政治统治。郟城自古是英杰辈出、人才荟萃之地。他希望获得这一带人士特别是知识界的支持。当时郟城有位翰林院庶吉士王恒写了一篇《圣驾东巡诣阙里赋》，表达了他在皇帝光临自己家乡时高兴和感激的心情。文章很长，最后一句是：“覩云日之光辉，拟形容于万一，抒忠敬而奏赋，宣皇德于无极。”或许，宣扬皇恩功德达到极致，正是乾隆皇帝来郟城乃至南巡各地的最重要原因。

（未完待续）



古临沂县境内的驿站

李凤军



平时读报，常常见到这样的句子，说临沂改革开放前是“四塞之固，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内货不出”，其实大谬不然。作者不察，人云亦云，竟至以讹传讹。原来这句话出自蒙阴某乡碑文，并非概况蒙阴的闭塞，更不是说临沂。最起码的历史事实就有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三次（1684、1698、1703）驻蹕蒙阴太学生秦洗（shen）家，如果这里山高路险，皇帝怎么会路经这里呢？

其实，临沂过去虽然不是交通发达，却有东西南北国道，这里且说古临沂县境内（现三区）的驿站。

根据临沂县志记载，清朝初年因为原有经过徐州的国道驿站荒废，朝廷南下国道分设东西两路，东路取道临沂，至此临沂成为南北数省通衢。“县驿居中，南至郯城，北至青驼，再由青驼至蒙阴，往返皆二三百里疲敝不堪。康熙十二年，知州邵士，酌量程途，在南路距城五十里李家庄，添设一驿，自此至郯城七十里。北路青驼寺驿，移至距城七十里徐公店。而后道里适均。经兖东道徐惺转样具题，除城驿归沂州管理外，徐公店、李家庄各设驿丞。乾隆十四年，驿丞裁，俱归本县。其经费出自地丁存留。当时夫马如下：

里甲驿：（在城内县治前）走递马六十匹。马夫三十名。白夫四十名。按，里甲为明代社会基层组织。城市中的里又称坊，近城者则称厢。每里人户为一百一十户。洪武三年(1370)始在江南个别地区实行。十四年，经户部尚书范敏

倡议，推行于全国城乡。

徐公店驿：走递马六十匹。马夫三十名。飞递公文马夫二名。抄马牌二名。药材兽医一名。

李家庄驿，与徐公店同。

驿站的作用主要有三项，一是公文和军事情报传递，二是使节供应包括食宿换马等，三是军粮饷糈转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长达3000多年，其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

临沂县境内的驿站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或增或减，已经很难找到资料。清末随着海运业的发展，邮电业、汇兑行出现，驿站也就逐渐荒废，疲马冗卒，闲散滋事，浪费资财，到民国成立，临沂的驿站就只有裁汰撤销了。

临沂北路古驿站有明一代最重要的是青驼寺驿站，位置当在现在的青驼镇。因为古代遗留两个石驼，寺因以名之，后来设乡建镇，都从此名。

经过青驼寺驿站的不知有多少使节客旅，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有那些文人骚客给这古驿站写下了一些诗篇。

“驴背寒销破帽温，鞭丝渐远雪泥痕。乱山一路青驼寺，多少东风到店门。”这是清朝康熙丙戌进士，历城人王莘在他的《二十四泉草堂集》中写“沂水山行即景”诗描绘的青驼。诗人在一个春暖乍寒的日子里，自济南南下，一路颠簸经过青驼，有感而发，随口占吟。

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宜兴）词人陈维崧有年端午时节，北上到青驼，回忆起十余年前曾路过青驼的事情，也是诗兴大发：“鲁山更比吴山翠，路入青驼寺。乱峰怪石罅围墙，墙里人家一半枣花香。当初有个卿家燕，与汝天涯见。晓风残月忆从前，不道因循过了十余年。”

词写得比较婉约，非常细腻。

“青驼二十里，徐公岭过半。上岭复下岭，驿马中间换。肩舆不留行，仆夫面已汗。连坡尽荒草，石田草中乱。此间山脊乾，不雨常苦旱。我行咨暑雨，对此转生赞。幸兹梁菽收，水绝天与灌。古人称逢年，用力必无玩。更从悟强怨，人喜我勿叹。西北风何来，推送健双趺。下岭亦不滑，高高眺前岸。”乾隆甲戌进士，历官侍读学士的北京大兴人朱筠，在他的《笥河集》中也记载了在青驼至徐公店路段的所见所闻。

清人李鼎元所撰《使琉球记》中，就对青驼古镇的两个石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嘉庆五年（1800年），作为副使的李鼎元，奉诏随正使赵介山赴琉球册封琉球中山王。他从嘉庆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离京记起，至十一月初三从琉球完旨返闽归国，逐日记录其所见所闻、所历所思，语焉甚详，文采飞扬。其中记历这段官道所见：“再行二十里，有坊曰「琅琊古郡」，后题「兰山令祁恕土新建」。连日逐沂水，傍蒙山行，颇有山水趣。又二十里，宿青驼寺。土人云：『佛刹有青石驼，蹄腹陷於土，惟头及鞍尚可辨』，或系大家墓道物。然驼之设於墓道，制亦未为久远。十五日(丁卯)，阴，微风。山行五十里，过沂州徐公店驿，至伴城食。山於此尽，平郊麦苗较茂。又五十里，宿沂州府沂州驿。”老李所言伴城，应为今日半程镇，为青驼寺至临沂的半程。

这几篇诗文很有意思，后人从中体味到古人出行的情况，而我们则可领略古临沂县境内驿站的旧时风采。

根植沂蒙沃土的艺苑奇葩 (连载)

——山东柳琴戏起源与发展概述

肖 民

风格独特 别树一帜

柳琴戏在长期流传与发展中，不断地吸收姊妹艺术的营养，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在剧目、唱腔音乐、舞台表演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地方戏曲百花园中别树一帜。

柳琴戏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仅据1957年山东省戏研室调查、抄录所得就有近200出。就其题材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门类：

清官戏（以包公戏为最多），如《黑驴驮尸》、《白马驮尸》、《小螯山》、《断双钉》、《仙花记》、《鱼篮记》、《秦香莲》、《三踏寒桥》等。

杨家将戏，如《拦马》、《斩子》、《刺火棍》、《小五台》、《小雀山》、《盗发》、《潼台会》等。



薛家将戏，如《东廻龙》、《西廻龙》、《三反》、《五反》、《金家庄》等。

明代戏，如《南北京》、《二龙山》等。

爱情婚姻戏，如《打干棒》、《小书房》、《天台》、《丝鸾记》、《四屏山》、《罗鞋记》等。

生活故事小戏，此类戏中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诸多情趣，深受观众喜爱。如《喝面叶》、《拾棉花》、《吵年》、《双换妻》、《砸纺车》、《打枣》等。由于这一类剧目数量很大，又多由“小生”、“小旦”、“小花脸”应功，故有时也把柳琴戏叫做“三小戏”。

连台本戏，如《金镯玉环记》、《五女兴唐》、《金鞭记》、《空棺记》等。

除此之外，还有近200个“篇子”。所谓“篇子”，是一种与曲艺段子很相似的独立唱段。大多是将牌子曲“娃娃”联缀在一起，唱一种景色，说一个道理，或叙述一段故事。多以一人台上唱，多人幕后和的形式演出。这种“篇子”，应该是柳琴戏从曲艺说唱艺术发展、成长为舞台戏曲拉魂腔的原始形态。起初是单独演出，后来用作整台戏的“戏帽”，叫做“压场篇”，再后，便基本从舞台上消失了。现在还能查到文词的篇子尚有100多个。如《风花雪夜》、《三皇五帝》、《酒色财气》、《孟姜女哭长城》、《贪花段》、《大烟段》、《倒十字》、《凤仪亭》、《单刀会》、《马前泼水》等。

柳琴戏剧目的来源，大致为：从兄弟剧种移植过来，特别是从柳子戏移植的剧目相当之多；由曲艺段子如洋琴、渔鼓、大鼓等改编而成；依据章回小说、历史故事改编而成。如1934年前后，艺人马学成等在济南演出时，因剧目不足，一出戏往往反复多次重演，引起观众不满。只好找来一些章回小说，利用白天休息时间给演员讲讲故事，共同商酌一个“梁子”（情节梗概），分分角色，当晚即上台演出。唱词、唱腔、对白，全由演员即兴创作。起初不免粗糙，久演之后便逐渐精密完备，最后成为固定的剧目。另据调查，老艺人尹成潭（至今一百多岁，后人在临沂柳琴剧团、艺校），虽然识字不多，但天分很高，曾编了大量唱词，很受同行及后人称道。此外，还有从“篇子”扩展而来的，一些生活气息和情趣非常浓厚的小戏，也属于此类。

柳琴戏的剧本也有自己的风格，文词通俗生动，包含大量的俚俗语言，有的直白，有的诙谐，妙趣横生。即使是从其他剧种移植过来的剧本，宾白和唱词也有很大变化。这与柳琴戏长期流行于农村、艺人多系农忙务农、农闲从艺的穷苦农民有直接关系。

柳琴戏的唱词常以口语入唱，通俗易懂。格式以三字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对韵律、平仄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但有几种特殊的格式，在别的剧种中较为少见。

1、“娃子”：（“娃娃”，“八句子”实即明清时代[耍孩儿]）八句五十四字，句式、用韵十分严格。如《张郎与丁香》中张万仓唱段：

要饭篮，挎肩上，
肚里饿，下四乡，
成天我跟狗打仗。
东庄要碗渣豆腐，
西村要碗冷剩汤。
浑身痒痒墙上蹭，（ceng）
到白天荒村要饭，
到夜晚宿落庙堂。

一、二句是两个三字句。三、四、五、六句是前四后三的七字句。七、八句是前三后四的七字句。八句词分为三组，1-3句为一组，4-6句为一组，末尾两句为一组。这与柳子戏的“娃娃”相同。与[耍孩儿]格式完全一致。

2、“羊子”：（即明清[山坡羊]）唱词共十二句，第五、六句叫“撵”或“雏”，最后四句叫“耳朵”。如《赵美蓉观灯》中赵美蓉唱的一段：

赵美蓉上场来闪目观看，
 打量着好红灯无边无岸。
 观一盏万岁灯一朝之主，
 有一些大臣灯列在两边。
 榜眼探花连鼎三，
 独占鳌头是状元。
 观一盏秀才灯躬身施礼，
 观一盏相爷灯怀抱笏板。
 说声好红灯可观，
 无锡县好红灯一年一番，
 说声好红灯可观，
 观罢这棚那棚再观。

这种格式的羊子，艺人称为“公羊”，如果省去“撑”就叫“母羊”。省去“耳朵”即为“秃尾巴羊”。省去“耳朵”，再把前边八句唱词都变成七字句，就成了“穿心羊”。与柳子戏中的“山坡羊”相近又有不同。

3、“三句撑”：（“三条腿”、“三撑子”）三句为一组，每组前两句均为三、三格式的六字句，第三句是前四后三的七字句。每句都押韵，一、二句押平声，第三句押仄声。如：

西北角，乾为天，
 城门大，壕沟宽，
 夜晚不关门两扇。
 挖地穴，三尺三，
 地堂板，躺上边，
 暗藏虎狼人难见。
 信炮响，往外窜，
 铜牌手，满地翻，
 马锁四蹄难交战。

篇幅大小不限，多用于节奏紧迫的快板唱段。

4、“倒脱靴”：在一段七字或十字唱词的最后一句用，为字数很少的短句。如：

小佳人挑着饭篮头前走，
 后边小小把蚂蚱扑，
 一扑扑在蒺藜上，
 扎得小手冒血珠，
 呜呜地哭。

这种格式的唱词以丑角用得最多。有时正工青衣也用。

5、“狗咬狗”：就是修辞学中的“顶真”手法，即唱词的后句第一字与前句的最后一个字，须是同一个字或谐音字。如“偷情”中的一段唱词：

忽听谯楼一更初，
 出家妙常盼丈夫。
 福小命薄住寺院，
 怨天恨地奴命孤。
 孤孤零零无人问，
 问声窗台哪来的书？
 书中本是潘郎字，

字字行行世皆无。

6、“一条鞭”：特点是句句用韵（韵书中叫做“楼上楼”）。如《武家坡》中薛平贵的一段唱词：

双挽手，站帐前，
陈大哥在上听我言。
那日宿在后宫院，
梦着黑虎在面前。
惊醒吓我一身汗，
天亮宣上圆梦官。
他对小弟讲一遍，
叫我游玩后花园。

……

“一条鞭”唱词平仄要求比较严格，应做到上句仄声，下句平声，这是为了演唱的需要。

柳琴戏的声腔风格独特，以丰富多彩的花腔，别致的拖腔，区别于其他剧种。女腔委婉华美，男腔朴实浑厚。突出特点为：

1、丰富多彩的花腔。基本集中在女腔中，几乎是每腔必闻。一如器乐曲中的华彩乐段，起伏迭宕，摇曳多姿，有极强的感染力，深受观众喜爱。

“拉魂”的美称同它有直接关系。

2、别具一格的拖腔。柳琴戏的拖腔极具特色，与其他兄弟剧种迥然不同。其女腔拖腔为小七度（6 5）跳进，俏丽悠扬，优美动听；男腔多为同度（5 5）或二度（6 5）进行，开阔奔放，质朴无华。拖腔多用于慢板、慢二行板的偶句。快板、快二行板则多在结束句运用。

3、大量运用切分音和弱拍起唱，以及频繁使用装饰音，也是柳琴戏唱腔的一大特色。由于大量切分音的运用，改变了轻重音的强弱关系，产生一种强烈的变节奏的效果，使旋律连绵透迤，回环曲折，给人以扑朔迷离的感觉，极具感染力。而频繁使用倚音、滑音，既能淋漓尽致地表达细腻复杂的感情，又能体现鲁南方言的特点，充分显示了剧种属性与独特风格。

柳琴戏属于发展不够健全的板腔体戏曲。板式很不完备。仅有慢板、二行板（慢、快）、快板，散板等为数不多的板式。二行板为基本板式。每种板式的旋律和节奏特点很不鲜明，基本上只依速度划分。传统的演唱方法的节拍，不论板眼，全用有板无眼的一拍子击节。但在长期的演唱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唱法，还比较有特点。如“调板”（也叫“掉板”。一种演唱时由快到慢的转板形式）；“吞板”（唱腔句式短促、规整，每一乐句均由闪板起唱，间奏为乐句末音的重复）；“连板起”（散板清唱。伴奏从上板时加入。多用在慢板、慢二行板唱腔之前）；“四句头”（四句比较固定的唱腔，四个乐句落音须为2 1 5 5）；“含腔”（一种旦角花腔，多用来表现少女羞涩、爱慕、自爱自怜的含蓄感情）；“叶里藏花”（旦角唱腔中旋律固定的一句唱腔。为回旋式进行旋律，多用在甩腔上）。“撻崖子”和“接崖子”（唱段在奇句上结束，人物下场，称为“撻崖子”。由锣鼓将偶句补上，或由上场演员接唱，称为“接崖子”。由多人幕后合唱接，谓之“里腔”）。

柳琴戏早期伴奏乐器为三大弦。约在一百四五十年前，艺人们依照琵琶，创制了柳叶琴，代替三弦成为主要伴奏乐器，一直沿用到新中国





柳琴戏走进临沂校园

建立前。伴奏，原来只用柳琴打击节奏，烘托气氛，并不包腔，后来才渐渐发展为随腔托音并有了开头过门，中间过门。还从其他剧种移植、借用了一些牌子曲，如“大八板”、“小八板”、“山西开门”、“南洋开门”等。也有艺人们自己编写的，如“五六五”、“鸳鸯戏水”、“会佳丽”等。

早期拉魂腔只用一个梆子敲击节奏。后来在集镇打地摊演唱时，为了吸引观众，演唱前敲击大锣或小锣，但没有成套的点子。以后又演变为弹琴兼大、小锣。约在民国初年，郯城县沙墩村张秀荣、张秀起、杨二群组织的班社（既唱柳琴也演京剧），开始把京剧打击乐中的某些点子用于柳琴戏。临沂很有名气的拉魂腔艺人梁学惠曾到该班社学习打击乐，并一起研究吸收了京剧的“单抱边”、“双抱边”、“四边静”、“水底鱼”、“一柱香”。一时，各班社会纷纷学习效法。与此同时，莱芜梆子鼓师李四娃到临沂柳琴戏搭班，又把他所掌握的锣鼓经带入班社，使柳琴戏的武场更趋完备。

柳琴戏的表演艺术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粗疏到完备的过程。即从开始的一个自弹自唱“唱门子”到两个人（一生一旦）对唱“对子戏”，再到两人扮演众多人物的“抹帽子戏”，再到班社。初创时的班社，人数不是太多，七、八个人便可组成一个戏班。十个人就是一个满象样子的大班。因此有“七忙八不忙，九人看戏房，十人成大班”之说。

早期柳琴戏没有行当之分，讲究揽得宽，要求“生、旦、俊、丑、老小正生、花白脸”一脚踢。后来逐渐分工，并有了名称，但叫法特殊。如三髯生叫“大生”；彩旦叫“老拐”；丑角叫“勾脚”；兼演青衣和小旦的叫“二脚梁子”；老旦、青衣叫“老二头”；小旦称“小头”。

柳琴戏因为没有正规的科班，表演全凭演员从生活中提炼的一套方法，显现出朴素健康的生活气息。民国以后，在京剧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程式。如旦角的步法“四台角”、“旋风式”、“剪子股”、“金蝉脱壳”；身段“整鬓”、“提裤”、“提领”、“燕子拔泥”、“单展翅”、“双展翅”等。生角的表演没有什么特殊的程式。丑角表演在柳琴戏中占有很大比重，风格特点鲜明，幽默诙谐而不庸俗，而且有一些本行当的特殊身段，如“仙鹤走”、“老汉走”、“鸭子扭”、“抽梁换柱”、“老龟扒沙”、“老龟脱壳”、“窟窿拨蛇”、“颠脚步”等。

柳琴戏的表演也有局限，因为早期演员生活及历史知识所限，演生活小戏较自如，演宫廷袍带戏、武戏则比较费力。

（未完待续）

燕翼堂及其主人

匡秀夫

蒙阴县垛庄镇位于蒙阴、费县和沂南三县交界。处于南北陆路交通要道，历朝官府都在此设有驿站，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传说宋朝大将孟良曾屯兵于此，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发生在这里。自清朝开始，垛庄的刘家就成为鲁南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堂号“燕翼堂”，他们历经几代人建设的“燕翼堂八卦宅”更是名声在外。

“燕翼堂”，曾是蒙阴县垛庄镇垛庄村刘姓大地方的堂号，喻义为：展翅高飞。据说是清朝乾隆皇帝御赐。“燕翼堂”鼎盛时期有土地5800亩，山林上千亩，另有酱园、酒店、油坊、百货等店铺，并在上海、济南等地设有商号。雇佣长工80余人，看家兵丁15人，长短枪20余支，办小学1处（有初、高级两个班），在沂蒙山区可谓首屈一指。

沂蒙抗日根据地开创之初，“燕翼堂”担负起了八路军驻垛庄一带部队、工作人员等的后勤供应，肖华将军曾带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驻在“燕翼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四支队进入沂蒙山区领导抗战。“燕翼堂”当家人刘云浦立志救国，毁家纾难，号召家人以刘晓浦、刘一梦为榜样，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在其带领下，全家上下齐动员，竭尽全力抗战，先后有26人参加革命工作，有6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有关记载，燕翼堂依山傍河而建，座北朝南、背靠孟良崮、南接蒙河，地势高爽，选址完全符合“枕山、环水、面屏”的古代风水理论，整个村落按《易经》阴



刘晓浦



刘一梦

“坎”阳“呈”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八卦风水理论选址布局。“燕翼堂”庄园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用坚固石料层层铺就，由160间仿古房屋组成，炮楼8个，里面可驻一个步兵团，宛如一座硕大城堡。庄园向外发射八条街巷，把整个庄园分割成均等的八块，街巷相通，巷巷相连，使庄园形成八街九巷，这就是九宫内八卦。经刘氏家族几代人，百多年的不断建设和完善，造就了这个建筑形式别致，色调古朴，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八卦宅。据说院内的仿古建筑、街道宽窄统一，并全部用条石铺成，不熟悉八卦宅构造的陌生人入内，往往迷失道路而不能走出去。

燕翼堂刘氏家庭不仅以资产显赫于世，而且更以开明著称，其家庭成员受共产党的影响较早，先后有26人参加革命工作。特别是刘晓浦、刘一梦，他们叔侄二人关系密切，共同参加革命，共同播撒火种，共同英勇就义的事迹，一直令后人敬仰。

刘晓浦，原名刘昱厚，又名小浦、刘太和、石玉河，1903年生，兄弟排行第四，故名“四少爷”。中学毕业后，1920年考入江苏南通纺织专科学校。因在校从事进步活动，被校方开除。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

和刘晓浦关系最密切的，是其三哥的儿子刘一梦。刘一梦原名增溶，又号大觉，1905年生，幼年丧父，临沂五中毕业后，考入济南商业专科学校，不久又考取南京东南大学。相近的年龄，国家、民族的不幸，“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使学生时代的叔侄俩便有着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刘晓浦于1922年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一梦也紧随其后转入该校，并在该校入党。他二人在上海大学期间，直接受陈望道、邓中夏、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教诲和影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五卅”惨案后，他们和上海大学的同学一起，受学校党组织的派遣，深入到工厂、学校，发动工人和学生，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组织救济受难同胞。通过学习和实践，他俩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刘晓浦、刘一梦假期曾回到原籍，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对其家庭成员和垛庄一带的亲友、邻居都有很大影响。他们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火花，为后来沂蒙山区的革命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暑假，刘一梦的言行被沂水县国民党政府察觉，便派两个警察持传票到垛庄去抓刘大觉。两个警察虽然奉命抓人，但不知刘大觉就是“燕翼堂”的“公子”。这时刘一梦的大伯父在地方上担任社长，两警察就先去见刘一梦的伯父并说明来意。刘一梦的伯父一听，便把他们让进客厅，热情地招待了一番，说明当地并无此人，临走时又给了他们一些“路费”，刘一梦因此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刘晓浦毕业后，在南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派刘晓浦任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技术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刘晓浦不畏艰险，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同志。7月，因叛徒出卖，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刘晓浦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其二兄刘云浦变卖土地、家产，携巨款去济南设法营救。他对二哥说：“你不要花钱救我了，要出狱先得自首，要我自首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和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是死对头！”

刘一梦在上海大学被迫停办后便加入了革命文艺战线。1927年冬，蒋光慈、钱杏村等在上海创办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刘一梦是该社主要成员及党的负责人之一。他经常以“一梦”、“大觉”为笔名发表文章，抨击当时的黑暗统治。他的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描绘了工农群众在旧社会受压迫、被剥削的非人生活及其反抗斗争，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鲁迅先后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写道：“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1928年秋，刘一梦由中共中央派往共青团山东省委工作。为了广泛接近下层民众，

便于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他脱下长衫，在济南、青岛的工厂做过工，在饭馆当过跑堂，在大街上拉过人力车。为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团省委利用《济南日报》星期副刊，办了个名叫《晓风》的周刊，刘一梦担任周刊的主笔。《晓风》周刊成为团省委的战斗号角，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1929年4月，刘一梦被叛徒出卖不幸在济南被捕。在狱中，敌人重刑逼供，妄想从刘一梦口中得知党、团员名单。刘一梦守口如瓶，宁死不屈。他对敌人说：“你们看太阳是哪边出来的？”

自刘晓浦和刘一梦被捕入狱后，党组织和他们的家庭曾多方设法营救，但终未获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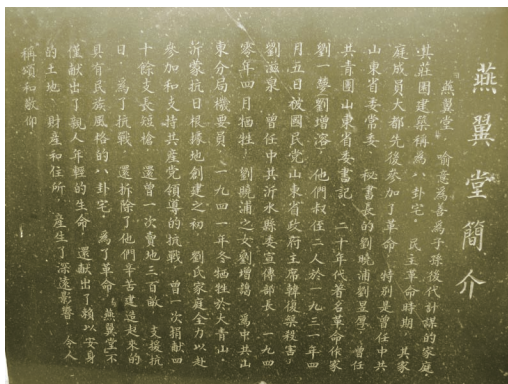
1931年初，蒋介石在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拼凑兵力组织第二次“围剿”，同时颁布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在全国制造反革命恐怖。同年4月5日凌晨，刘晓浦、刘一梦与邓恩铭等22名中共山东党组织的主要干部，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韩复榘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史称济南“四五”惨案，英勇就义的烈士为“四五”烈士。当时，刘晓浦年仅28岁，刘一梦仅26岁。

刘晓浦、刘一梦就义后，他们的亲属刘云浦赶赴济南，买了两口棺材，收殮后运回家乡在桑行子柩葬。刘云浦含着悲愤的眼泪，在坟前发誓：“共产党不取得胜利，我决不正式出殡！”

1938年5月，八路军解放了这片土地，山东纵队四支队经理部主任马馥塘、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先后代表部队和省委慰问了烈士家属。当地驻军及广大群众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燕翼堂”家长刘云浦深明大义，教育全家以刘晓浦叔侄为榜样，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曾一次捐献长短枪40余支，成立了垛庄独立营。此后，刘氏家族中先后有26名青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其中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1939年，刘家一次卖地300余亩，购枪100余支，支援了抗日武装。同时还抚养了一批烈士遗孤和革命干部子女。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为了抗战，“燕翼堂”的主人还主动拆除了他们辛苦建造起来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八卦宅。事情的起因是：日伪军多次占据垛庄，以“燕翼堂”八卦宅为依托易守难攻。我军多次攻打，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因此，经有关部队首长提议，“燕翼堂”的主人便拆除了这所宅院。为了革命，“燕翼堂”不仅献出了亲人年轻的生命，还献出了赖以安身的土地、财产和住所！

“燕翼堂”这座具有浓郁民族文化韵味的建筑群，虽被拆除，现在仅能寻觅到它的断石残瓦，但它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了丰碑。新中国诞生后，这一遗址成为垛庄镇党委、政府的驻地。其中“燕翼堂”四位烈士的遗骨也于1993年10月迁居孟良崮烈士陵园，长眠于苍松翠柏之中。1999年，“燕翼堂”旧址被蒙阴县委、县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镗抗倭殉国

于泳

孙镗（1523—1556年），莒州状元坊（今莒南县坪上镇大铁牛庙村）人，明代抗倭名将。他早年任职于州府，因性格耿直，触犯上司被解职。他归家后，苦练武功，志在报国。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孙镗到江浙一带经商，正值倭寇扰掠苏州、松江一带。孙镗求见松江知府，申述抗倭报国之志，自愿捐献资财以助军需，知府赞赏其志行，把他推荐给参政翁大立。翁大立亲自面试其武艺，孙镗使用双刀骁健如飞，便录为士兵。一次，松江兵备副使任环遭倭寇包围，孙镗奋力杀人重围，将其救出，并击走倭寇，从而声名大振。此后，他派人回到家乡莒州，变卖家产为军需，召集亲族300余人，不领取公饷，英勇抗倭。《明史》称：“吴中倚孙镗若长城。”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渡过泖浒（水名），欲袭松江府。孙镗率队迎击，与倭寇激战一天，因援兵未至，由石湖桥撤退。其队伍刚至水中央，埋伏的倭寇蜂拥而起，孙镗不慎落水被刺牺牲。松江府将其事迹上奏明廷，嘉靖皇帝册封其为光禄寺书丞，赐御葬于大铁牛庙村孙氏祖茔，建祠祭祀。《明史·忠义传》有其传。

1992年，大铁牛庙村民自筹资金30万元，建起了仿古式的孙镗纪念馆。馆内有展现孙镗一生业绩的塑像和壁画，馆前碑林中立有孙镗戎装花岗石雕像。

在孙镗纪念馆堂前，有一块褐色石铁陨石，长1.4米，高0.8米，约0.6立方米，重约4000公斤，因形似卧牛而称之为铁牛。该村以铁牛命名，有“先有铁牛后有村”之说。“铁牛”陨石所在处原有“东岳天齐庙”，据庙内碑文记载，该庙初建于唐，然对该陨石却无记载。

1988年，经南京大学地质系王鹤年教授鉴定，确认该石为“顽鳞铁锦陨石”。迄今为止，莒南铁石陨石，是世界同类陨石之最。莒南铁牛陨石，对于天体研究和宇航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孙镗雕像



武宣卞皇后

杜 帅

临沂古称琅琊，可谓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名士英雄层出不穷。仅三国时便为我们熟知的诸葛亮，王朗，羊祜等等。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在这里介绍三国时颇有影响力的一位女性——魏武宣卞皇后。

武宣卞皇后（卞夫人），名玲珑，东汉延熹三年（公元160年）生于山东琅琊开阳（今山东临沂），父母早亡，有弟名秉，祖父卞广、祖母周氏。卞夫人原出倡家，即汉代专门从事音乐歌舞的乐人家庭出身的女子。青年时到谯县作歌舞艺伎，二十岁时被酷爱音乐的曹操纳为妾。建安初年丁夫人被废后，她成为了曹操的正妻，也是魏文帝曹丕、任城威王曹彰、陈思王曹植、萧怀王曹熊的母亲。曹丕继位后尊其为皇太后，曹叡继位后尊其为太皇太后。卞皇后卒于魏太和四年（230年）五月，与曹操合葬邺城西郊高陵。

武宣卞皇后以独立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屹立史林。189年卞夫人随操至都城洛阳；九月，董卓乱京、专擅朝政，推荐曹操为骁骑校尉。董卓乃犯上作乱，曹操推辞不就，当夜带一仆从微服逃走，欲起兵讨董。此时曹操左右人等见曹出走，均怕被董卓加害，纷纷欲另谋出路。卞氏则镇静地劝说众人：“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共死何苦！”大家便依从卞氏安排，掩饰异常，为曹操逃离争取了时间，卞氏方率众人寻找时机离开洛阳回到谯县。

曹操的原配丁夫人性格倔犟、任性，因是正室，便瞧不起歌伎出身的卞氏，常欺侮她们母子。曹操征张绣，本来张绣已经投降，却又因曹操诱掠其婶母，导致张绣夜间兵变，宿将典韦、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为保护曹操皆战死。丁夫人为曹昂死极为伤心，常哭骂于曹操，曹操自知理亏，开始还容忍，但俗话说“好话说三遍，鸡狗不耐烦”，况且揭疮疤的事儿。老是这样闹，他就终于不耐烦，生气将丁夫人送回了娘家。后来卞氏极力劝说曹操，劝他一定要亲自把丁夫人接回来。曹操和丁夫人的感情还是很深的，遂专程回到谯县丁的娘家，见丁正在织布，便抚摸着她的背温情地说：“我过去错了，今后保证再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同我一起坐车回去吧？”丁夫人连回头看都不看他一眼，仍织她的布。曹操虽觉得十分难堪，但一想起卞氏言语切切的劝告，只好耐着性，多次走到门外又返回来，最后再次劝说：“随我回去行不行啊？”，“真要与我分手了？”丁还是不言语。曹操无奈地对岳父、岳母讲：“看来缘分是尽了。别耽搁她，也不要她为我守节，找个合适人家改嫁吧。”

卞夫人扶正后，不念旧恶，常令人给丁夫人馈送东西，趁曹操不在时，还把丁接来，仍让她坐上位，自己坐下位；迎来送往，礼节一如先前。丁实在不好意思，便恳求卞夫人：“我是被废之人，你不能老是那样待我啊！”在丁去世时，卞夫人还请求负责她的丧葬事宜，曹操同意了，卞夫人隆重地把丁埋葬于许昌都城南面。

卞夫人随曹操出征，每遇年长白发之老人，总是拉着她（他）们的手关心地询短问长，并赠与绢帛等东西，往往还流着泪十分动情地说：“可惜俺的爹娘没活到您这个年纪啊。”原先，本家曹洪家境富裕而生性吝啬，魏文帝曹丕年轻时向他借钱而不得，十分厌恶他，做了皇帝以后，因曹洪的门客犯法，要处死曹洪。卞太后劝止了魏文帝，将曹洪改刑为免官削爵。杨修是曹植的好友，协助曹植与曹丕争太子位。曹操早有觉察，虽严令不得私交诸儿，杨修仍一意孤行。后来曹操便以“漏泄言教”罪，杀掉杨修，并同时写信告知其父杨彪，以示歉意。卞氏也给杨修的母亲袁氏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卞顿首……闻之心肝涂地，惊愕断绝，悼痛酷楚，情不自胜。夫人多容，即见垂恕。故送衣服一笼、文绢百匹、房子官锦百斤、私所乘香车一乘、牛一头……”除表示哀悼，赠物慰问外，还叙说了杨修是触犯军法，咎由自取，以安慰袁氏。反映了卞氏的宽厚为人及恻隐之心。

封建社会是“夫贵妻荣，母以子贵”。卞夫人的长子曹丕被立为太子，朝廷官员及后官仆人等皆向她祝贺、索要赏赐。而卞夫人却坦然冷静地说：丕儿是长子，立为太子嗣，我当为教育孩子没出大的过失而庆幸，哪里能再为此大行赏赐呢？当曹操得知卞夫人所为，便赞道：“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曹植是卞氏最疼爱的少子。有一次曹植犯了法，有关部门想要弹劾他。当皇帝的曹丕偷偷让卞氏侄子卞兰告知母亲，意思是让她出面调停。卞氏却很识大体，不因私情而袒护爱子。她对卞兰说：“没想到植儿会这样做啊。你回去禀报皇帝，不要因为我而违背了国法！”她警告家人、亲戚：“不要干违法乱纪的事。谁若犯了法，我非但不会去说情，更不会给你什么好处，反要给你罪加一等！”

史载：“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她和身边的人一样，平时吃的也都是一般的菜蔬米饭，没有富人家常吃的鱼肉。国用不足，为节省国家开支，卞氏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她向娘家人常说：“居处当务节俭，不要希冀赏赐。你们会怪我太薄情是吧？非也！可我自有为亲的度数。我侍奉曹君四十余年，节俭行事，早已养成了习惯，不会因你们再变为奢侈的。”初，其弟卞秉任别部司马，嫌官位低、财产少，对曹操常有怨言，经曹操、卞氏多次劝慰，秉“官不移，财亦不益（增）”。直至曹丕执政，才为舅舅卞秉盖了府第。建成以后，卞夫人来到将军府祝贺，并摆宴招待诸位亲朋，也都是寻常饭菜而已（竟无异膳）。

曹操建魏国袭汉制，共娶纳13个老婆，生有25个儿子、23个女儿，还收养了四五个孩子；生母早亡的孩子都由卞氏抚养长大。《易经》说：“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卞氏实乃百数人后宫的名符其实的领导者。好一个大家庭！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为不在社会上造成坏的影响，曹操不得不对后宫下达一项项《内诫令》。每项诫令，卞氏在后宫都带头遵守，并率先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后宫形成了一种节俭、廉洁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朝廷内外及整个社会。

曹操立卞夫人为王后，为表彰她的为人，特下了一道策文：“夫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今进位王后，太子、诸侯陪位，群卿上寿，减国内死罪一等。”卞氏正于内，使曹操专心致力理政，其功莫大焉！卞氏身处18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官至王后高位，能够始终如一做到：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怒不变容，喜不失节，不念旧恶，不因私情而背离国法，俭约成性，不贪求富贵，为人宽容、厚道，不仅严于律己，还能够做到率先垂范，实属难为也。真可谓：人中之凤，女性之楷模！

记忆中的乡村文化生活

王兆军

说书

农民和书打交道的地方，不是在私塾或学校，而是在集市听说书的。

说书是一种公众场合下的文艺活动，收费。说书的人，大都是在集市上出个摊子，围个场子。他们说的书，大都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历史名著和明清话本，如《武松打虎》、《三气周瑜》、《王娇兰百年长恨》等，也有的来自《说唐》、《施公案》和《包公案》等小说，还有些来自民间传说。

黑墩屯能说书的不多，但喜欢读唱本的不少。读唱本，讲故事，一般是在夏日的中午，大家在树荫下乘凉，打盹休息，不耽误听一段远离现实的传奇故事。再就是冬天，冰天雪地的，人们集中在草棚里或什么场屋子里，听上一段唱本故事。《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卧虎山》，都是热门的故事。农民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最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很多农民将小说中的人物当成历史真实。你告诉他那是小说，他们还不信呢。

集市上说书，是一种小生意。说的听的，都得讲究规矩。说书的，不能因为人少就不说了，只要你开了头，哪怕人少一点，你也得说下去。听说书的，你不能光听不给钱。到了“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尽量不要走开。这时，帮忙的人会拜托各位听众，给一点赏钱。你没钱不要紧，但不





要因此就离开。我想，这是说书人的心意，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一走了之，说书的不高兴。

说书的，一度曾被取缔，不能说旧事老书，只能说《铁道游击队》之类，农民不爱听。现在，这个行当虽说是恢复自由了，但怎么也不会象50年代那么红火。现在有了收音机，有了电视，走到哪里听到哪里。还都是名角开的场子，老艺人们的生意被新传播手段打了饭碗。电视里的说唱说书虽然是名家，但全国就那么几个，说书的风格也就单一多了。所谓全球化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大家都用一种东西，物种失去了价值，丰富多彩也就谈不上了。

影子戏

从前有玩傀儡戏的，叫做皮影子戏。

他们每年都来，在乡村巡回演出，他们有收入，农民多了些快乐。50年代，影子戏的主要内容都是《西游记》里的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铁扇公主，牛魔王，还有可笑的猪八戒吃西瓜，很吸引人。尤其是小孩子，他们遇到影子戏，连觉也睡不着了，在大冬天也看上大半个夜晚，有瘾。

影子戏艺人的待遇，主要是以粮食作为报酬，没有现金，或者只有很少的一点钱。遇到这种演出活动，村里就有人到各家各户去收粮食，也要一点熟食。这些，大概算是演出的费用和报酬了。影子戏艺人们在演出结束之后，多半是将收的粮食随手卖掉，拿了钱再去另一个地方。这样，他们既有收入，也不至于行走累赘。

这是一种灵活的报酬方式。如果艺人非要钱不可，那就很麻烦。农民宁肯将超出现金数额的粮食拿出来，也不肯直接点出小钱来。我小时候看过几次影子戏，注意到有人到家里收集粮食的情景。小孩子当时只关心《西游记》里的故事，不注意他们之间的报酬关系。

当地有句俗语，玩影子戏的遇到劫路的——人多没有打架的。现在可好，影子戏没有了，劫路的却多了起来。

现在，好像各地都没有影子戏了。有个电视节目，号召全社会拯救民间艺术，但是光说不行，得解决民间艺人的演出和报酬问题。任何艺术门类，首先必须有市场、有用场，才能得到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书法家，其实都是朝廷里或王侯家的书写员。他们每天都用笔墨生活，才练出一手好字。现在的人不明白，纷纷要当专业书法家，反而写不出好字来。各种文化艺术都是一样，必得有用处和市场，才能发展起来。

玩龙和求雨

玩龙和求雨，是另一类文化活动。

玩龙，或者说舞龙，是在元宵节或者春节期间举行，非常隆重。我在《白蜡烛》中对旦彰街的玩龙活动有比较细致的描述。现在，黑墩屯也有玩龙的游戏了。这种活动，用人多，只有比较大的村子才能做得起。我所重视的是玩龙这一仪式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龙本身是懒惰的，只有在它捉拿妖怪的时候，才派生出风雨雷电来。龙本身并不具有给人间行雨送风的善意，人类得到的只是某种事物在行为中所派生出来的副产品。用这一哲学去理解人类的行为，也许有些启发。

求雨，是在长时间大旱后，由社区头面人物倡导的全民祈祷活动。先是有名望的人商量举事，决定每家出多少粮食多少钱，然后开始募集。募集来的钱粮，用来置办求雨仪式上用的香案、供品和尚道士的招待费。因为这种活动带有一定程度的神秘色彩，大家都很严肃，不让小孩子靠近，更不允许小孩子们随便说话。

我参加过两次这种活动，但没见过和尚念经道士作法。我被大人要求做的，就是手里拿了香烛，跟着村民的队伍慢慢行走。有的地方，求雨时要找些会杂耍的人在前头开路，增加神秘性和娱乐性。到某个既定的地方后，由懂门道的人物举行仪式，烧香，贡献，祷告，作揖，磕头，反复强调活动的主题，祈求上天照顾这一方百姓，等等。

除了求雨之外，还有一次是拜冰雹老爷——雹子神。1953年和1954年，黑墩屯两次被冰雹侵害，当时流传说，雹子神的姥姥家是我们东边的柳庄。这个神灵很孝顺，每年都要回家看望他姥姥，经过的地方就要受到他的侵害。于是我们黑墩屯人就发起一次祷告神灵的运动，给雹子神准备了很多东西，祈求他不要经过我们这里。雹子神可能接受了我们村的贿赂，以后很少来了，即使偶尔经过，雹子下得也不大。

打花鞭

花鞭，是一种游戏演出的工具。

平常，打花鞭的人都是单个行动。他们手里拿了一根竹节做的或硬木做的花鞭。所谓花鞭，并不是装饰了花朵或图案，而是说声音。花鞭的内里大概装了铜钱之类的东西，跳舞的人将那个道具转动起来，挥舞起来，按照某些招式，击打自己的身体，于是就在不同的地方发出各种窸窣窸窣的声音，虽不悦耳，但也动听。

这些舞蹈者，其实都是乞讨的。他们的乞讨形式，比较那些只是端个破碗和一根打狗棍的乞丐，稍微要艺术一些。最一般的乞讨，人总是可怜兮兮的，声音也不敢高昂，表情灰暗。打花鞭的就不同了，他们属于艺术乞讨，所以在他们跳舞结束后，就会当仁不让地要主人款待，如不款待，

就多给点东西，他们的表情，看上去也有些自信和自得，不像一般的乞丐那样低声下气的。

近年来，打花鞭的几乎绝迹。一来是粮食便宜，各地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乞丐少了。二来呢，是农民不喜欢那种最简单的表演，不如在家里看电视。电视这个东西，虽然很耗费时间，但那里的节目都是全国最好的水平，值得看，比看真人的表演更过瘾。

放风筝

从前，黑墩屯的孩子喜欢放风筝。

春天，踏青的季节，孩子们弄了竹子，破成细条，扎成八角形状，糊上纸，做成风筝，拿到野地里去放。放风筝有个忌讳：千万不能让风筝落到人家家里去，不知其中有什么讲究，反正是不吉利。所以，刮东风的时候，要到村子西头去放，刮西南风的时候，才可以在东边放——即使断了线，也不至于落到人家院子里。

当时最缺的是薄的纸和细的线。一个风筝，竹条本身就有分量吧，如果用的纸是杭连纸或者报纸，就更重，还有糨糊的分量，所以最好用非常薄的纸，或者丝绸。现在都是用丝绸或者化纤布了，那时谁家能有丝绸风筝啊！

风筝线也是稀罕的东西。好不容易纺的线，谁愿意给孩子弄去放风筝啊？要想春天放风筝，就得注意积攒。那时所用的线都很粗，风筝上不高，线却早就形成了很大的坠弧形，我们给这种坠下的弧形叫拉苏。

有人能将风筝放得很高。有本事的少年，还将橡皮筋拉得薄薄的，用竹片撑起来，成弓形，安在风筝最上边。这种用橡皮拉出的弓子，能在风中发出很响的声音。我那时放过八角风筝，但弓子做得不好，没有人家弄的响亮。

现在放风筝的人少了，没人再玩。大人忙于挣钱，小孩上学，风筝不见了，天空中显得单调无聊，乡村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先前的悠闲和有趣荡然无存。如果谁稍微注意，就会发现，凡是和农事有关但和挣钱冲突的文化活动，都在减少，甚至绝迹。现代人都在忙挣钱，可钱还是不够花的，艺术情趣却糟蹋得精光。

我也不知道怎样评价这种变化。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考棚街话说考院 井神楼阁尽春秋

临沂为府治所在地，但自乾隆前却一直没有考院，因此沂州府下属7个县的考生皆需去几百里以外的青州或曲阜赶考，甚是不便。自从知府李希贤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来沂州任职后，才开始考虑在临沂建考院。

自临沂西去曲阜最近也有320里，而日照、莒县的去曲阜则更远。李希贤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商同地方绅士，建议在临沂城建考院。他首先带头捐款带动有钱者乐捐，并选址在今考棚街路北，八小集巷以西，考棚西巷以东，五圣堂庙以南的地方修建考院。开工后很顺利地全部完成了整个考院的所有建筑，当年就使得下属7县的考生前来赶考了。从此兰山、费县、郯城、沂水、蒙阴、莒县、日照的考生们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去曲阜赶考了。这样不知节省了多少人力、物力，临沂人皆称赞这是一大善举。这座考院（俗称考棚）一直沿用到清末废科举。以后就改为学校了，它一直是山东省第五中学的校址，直到日伪时期被日寇占用并加以破坏，而现在留给后人的只有几张珍贵的考院老照片和一条以其命名的街道——考棚街。

沿着考棚街向东路北是原沂州府治旧址，再向东与沂州路相接，丁字路口处正对着考棚街有一座二层阁楼，俗称“井神楼子”，它是这一带的地名标志。这座阁楼建在明代，下层是砖石结构，上层是一座阁楼，因下层有一口井，故称井神楼。这楼上原来是供着关公，塑造得甚是精美，特别阁门上有清末本地翰林庄陔兰写的对联：“马过五关思汉鼎，花开三月想桃园。”书写得甚是精美。每年正月这里又是闹花灯最热闹的去处，楼前要扎一座鳌山和一座灯棚。所以这座井神楼向北可看到北大街繁华，向西可看到考棚街兴盛，向南更可看到商店林



清末沂州考院内门

立、车马如流。临沂城的多少重大事件都从它前面经过。像北阀军入城，日军侵略军入城，解放临沂时的巷战。罗炳辉的葬礼灵车由此挽过，张灵甫的灵车由此南下，李天霞由此被押解出城，王洪九匪帮由此逃跑，几个大汉奸由此押赴刑场，文化大革命造反的队伍由此示威游行……。总之，这座阁楼是阅尽了临沂城的沧桑。可惜的是文革后期被拆除了。

小红汪赵嬷嬷伏法 十三孔王洪九杀人

临沂明清至民国时的刑场在何处呢？它一直设在南关阁子门外。西旁有一御碑亭，内有一石碑，上书“大清高宗皇帝南巡驻蹕处”，东傍是小红汪。在今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的西门向西不远，有一片洼地常年积水，因其处于一片赤铁矿石之间，故其水看来皆是红水，故称“小红汪”。俗说因在此杀人甚多，水皆变红。在此处决多少犯人已无法统计，但在此处决了女惯匪赵嬷嬷，却广为人知。

赵嬷嬷，出生于江苏宿迁县，曾嫁给土匪赵登山为妻，从此她也成了一名女匪，在苏北、鲁南一带为非作歹，臭名远扬。其丈夫死后，她就成了土匪的头目，手下有400多名匪徒，敢于和官兵对抗。这赵嬷嬷能使双枪，善于骑马。手下有她亲生女儿和干儿子多人，跟着她，不离左右。她作恶多端，其中当属血洗东八里巷最为惨烈。

1923年6月，赵嬷嬷与众匪徒包围并攻入了东八里巷村（今属临沭县），见人就杀，四周门安上铡刀，共杀害了700多人，烧房屋1200多间，成为当地的一大惨案。

经当地人民不断地控告，才引起当时政府的重视，于是派官兵剿匪。几经战斗，终将其击溃。赵嬷嬷与其女儿及干儿子企图逃往东北，结果在威海被擒，用汽车将人犯武装押回临沂。当天晚上因大牢的女监未检查好，故将其看押在衙门前东侧的孙家旅店，当晚赵嬷嬷自费要了一桌酒菜，和女儿等吃喝了一顿。第二天就将其转在大牢的女监，经几次审问后即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照常食用泰盛馆的酒肉，让其饱食一餐。第二天，也就是1924年5月4日，赵嬷嬷一行犯人开始押赴刑场。押送女犯的“木驴”早已不存，只好用独轮车推着赵嬷嬷及其一个女儿上路，皆是五花大绑，后插“亡命旗”。当时只告诉她押往郯城。这时从县衙门至南阁子门的大街两旁皆站满了观看的民众。犯人共4人，即是赵嬷嬷及其长



清末十三孔桥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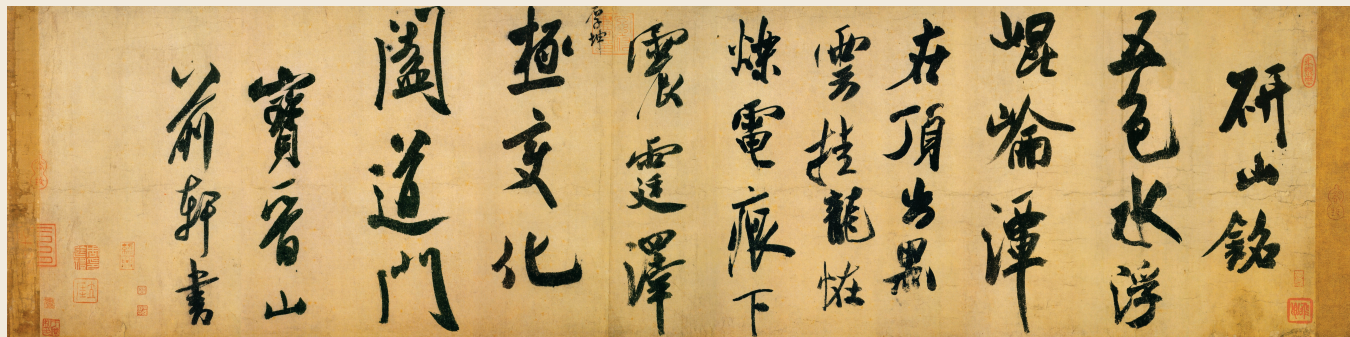


女、三女（二女已死）和其干女王玉兰。行刑的行列走得较慢，观看的民众皆称大快人心。当将犯人押出南阁子门后即不再南行，接着向东转去，赵嬷嬷见事不好，知道不是去郟城，便从车上滚了下来，接着由刑警将其押往小红汪，此次用的是斩刑（东八里巷村民要求凌迟，未被批准）。第一个斩首的是赵嬷嬷，执行者手起刀落，第一刀砍在了她的发髻之上，第二刀才将头砍下。接着其他三犯亦皆伏法。东八里巷的村民将其人头要回祭奠灵魂，并将其头挂在高杆上示众。这一刑场一直沿用到解放后50年代初期。

临沂城的北门外，横跨涑河有一座大桥，南段为三孔桥，中间是“诸葛堤”，北侧是十三孔桥。南桥名“迎仙桥”，乃明代所建，而十三孔桥乃清同治年间所建，一向方便行人。而在1947年至1948年却成了土匪司令王洪九的杀人场。王匪1947年2月随着国民党正规军占领临沂后，他“还乡团”匪部也在城内驻扎。王匪杀人成性，是有名的杀人魔王，除在西关几处杀人场杀人外，便是这十三孔了。因此处杀人太多，被群众称为“奈何桥”。原来是每到夏季水涨，王匪便将受害者装入麻袋，在十三孔桥上推入河内，名曰“下饺子”。其残酷手段令人发指。这就是王洪九匪部在临沂城杀人手段的一例。匪部侵占临沂共1年零7个月，先后杀死7千多人，故称匪首王洪九为杀人魔王。1949年他逃往台湾，1957年患中风后瘫痪，终日躺在床上，肌肉一块块地烂掉，直到1979年才死去。当时旅台的临沂人皆道他遭了天报，等于凌迟处死了。从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于公馆“研山铭”流失 普照寺集柳碑遭洗

今兰山路的东西段、横跨大街有一座石牌坊。其北面是石牌坊巷，这石牌坊的南面有一座府第，俗称于家公馆，大门上有一匾额“乐善好施”。原来这就是我国的大收藏家于腾的府第。于腾死于四川成都知府任上。其夫人王氏扶柩回籍，在此建府居住，并在此为于腾过继了一个儿子取名于天庆，以此为于腾送殡。后因王氏捐资办义学被朝廷封为一品夫人，并赠金凤冠一顶，山



米芾《研山铭》

东巡抚杨士骧题写一匾“撒环兴学”。原来于腾的全部收藏几乎都被王氏运回了临沂，其中重要文物有于腾所刻的《盛宋文选》的木版和大批的宋元古字画。可惜的是于腾夫人王氏不久病故，其过继儿子于天庆非常不争气，先后染上了吸毒等恶习，先是将《盛宋文选》木版卖到了青岛，不久又将所藏宋人画册卖掉。最后将最珍贵的米芾的名迹《研山铭》也卖掉了。这卷名迹先后被字画商卖到天津等地，最后又卖给了日本人。从此这件名迹一直在日本几十年。今幸逢盛世，于2002年又被故宫博物院用巨资购回珍藏于故宫。于腾在天之灵也应感到欣慰了。

提起临沂的名碑，在全国知名者当属《琅琊集柳碑》，它是刻于金皇统四年（1144年），由当时普照寺的僧人觉海集柳公权的楷书而成。西安的《玄秘塔碑》称西柳，而此碑则称东柳。此碑保留柳书的正楷大字，十分珍贵，《金石粹编》、《校碑随笔》、《金石索》、《冰山录》等书中皆有记载。可惜的是清康熙七年（1668年），临沂大地震被震断。修复后已残去多字。由于经常不停的传拓，使得碑文字口逐渐变细，个别字模糊不清，至道光年间被普照寺一个和尚将碑文重刻了一遍。于是有的字走了形，有的字变成了其他字，如“邦人”变成了“郡人”等，使这一名碑大大变样。可叹抗战期间又遭到了日寇的破坏。解放后重新安置于五贤祠内。更可悲的是“文革”时又被彻底破坏。现在只剩下几块残石。这一名碑就这样被毁了。虽然羲之故居和市博物馆皆有翻刻之碑，但皆非原样，幸喜今年有人从外地购回了康熙七年大地震前的拓本，使临沂人又重新见到《集柳碑》的原貌。这也是珍贵文物在盛世的重现吧。

东岳庙方花脸盗宝 西围门刘黑七诈财

临沂城的西关有条东岳庙街，这街的北头现在是兰山区委党校，原来这里就是临沂最古老的建筑物“东岳庙”的旧址。这座古庙，能见到文字记录是宋代重修和金代、元代、明代的重修碑刻。其石雕龙柱乃金代所刻，为全国最古的石龙柱。其殿为山西五彩琉璃的装饰，和北京九龙壁一样美观。而殿内铜造像乃明代泾王所铸，四周的壁画亦是明代人所绘。更为可贵的是还有几件珍贵文物。一件是明泾王所铸的泰国铜的大熏炉，上有铭文：“大明嘉靖十年泾王敬造”。此炉是三足双耳，上有镂空盖，盖上一狮子，中空，口中也能出烟。这个宝鼎一直保留在东岳庙，平日存放在道院，由当家道士看护。只有正月初八、三月二十八、四月初八这三次庙会时，才抬到大殿供人观赏。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临沂来了一支北洋军阀的驻军，军长名叫方永昌，因其额头上有白斑，故称方花脸。此人在临沂作恶多端，平日里搜刮民财无所不为。又听当地坏人告诉他东岳庙里有珍宝，于是他派人入庙，进入道院不由分说命人将宝鼎抬出，并派人爬上了大殿，将殿顶琉璃造像取下，从西门进城去了。道院的当家道长顾宪宝派人跟着看去何处，走到太公巷时被用枪逼回。在临沂传了300多年的珍宝从此就消失了。直到数年后被旅沪的临沂人发现是在上海变卖了。这一重要文物的丢失至今令临沂人感到是一件憾事。

临沂南关除南门称阁子门外，还有数个哨门方便居民出入。其最大者名“西大围门”。因其处于交通要道，故来往客商甚多，这围门平时也有军队把守。1928年（民国11年）8月，山东著名的惯匪刘桂堂（俗称刘黑七）被韩复榘招安。他自称国军，忽然率匪徒来到临沂屯兵西大围门外，声言要入城内。当时全城告警，人心惶惶，于是商绅派人至西大围门与其谈判。刘匪开口就索要一万大洋的“劳军费”。商绅们请他到大围门内路南冯瞎子饭店内进行招待，几经要求，终



范筑先

于给他三千大洋，才未进城。临沂城也就免遭这次涂炭。但事后三千大洋皆摊派到居民身上了。

药王庙设立戒烟所 模范狱改造黄赌毒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范筑先来临沂任县长，这是一名被临沂人称颂的清官。他来临沂后先后数次微服私访，对平民百姓的疾苦十分关注，特别是黄赌毒对人民的危害更令他深恶痛绝。首先下令凡贩卖毒品者三日内自首认罪并交出所有毒品，吸食者也一律在三日内自首登记参加戒烟组织。三日后果然有拒不自首者，当即抓捕了一个女鸦片贩子椒子鸡，将其毒品全部抄出，当堂判处死刑，并游街示众后在南阁子门外处决了。从此贩毒者皆纷纷自首认罪，所有交出和抄出的毒品在南关大教场春会时当众焚掉，此事大快人心。经范筑先精心安排，并带头捐款在药王庙设立了“戒烟所”，聘请中西医参加，给吸毒者医治。这药王庙位于今考棚街的西端，与白衣庵为邻，乃明朝时所建，内供神农、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历代名医。平日还有当地的中医在此值日给人看病，临沂的中医行会亦设于此。所有报名戒烟者皆在此集体食宿，门口有警察保卫，每天5点范筑先即先到达，全体起床后集合跑步，早餐后服药，服药后参加学习和娱乐，午饭后再服南瓜汤（林则徐的戒烟方法）午休，下午范筑先带头去“老明堂”工地义务劳动。这样进来的人个个体力皆有增强，不出三个月皆将恶习戒掉，于是召开欢送大会，请其家人一同参加。当家长看到自己的儿子不但戒了毒，还恢复了健康，无不称颂范县长的德政，当时送给他锦旗，上面写着“爱民如子”几个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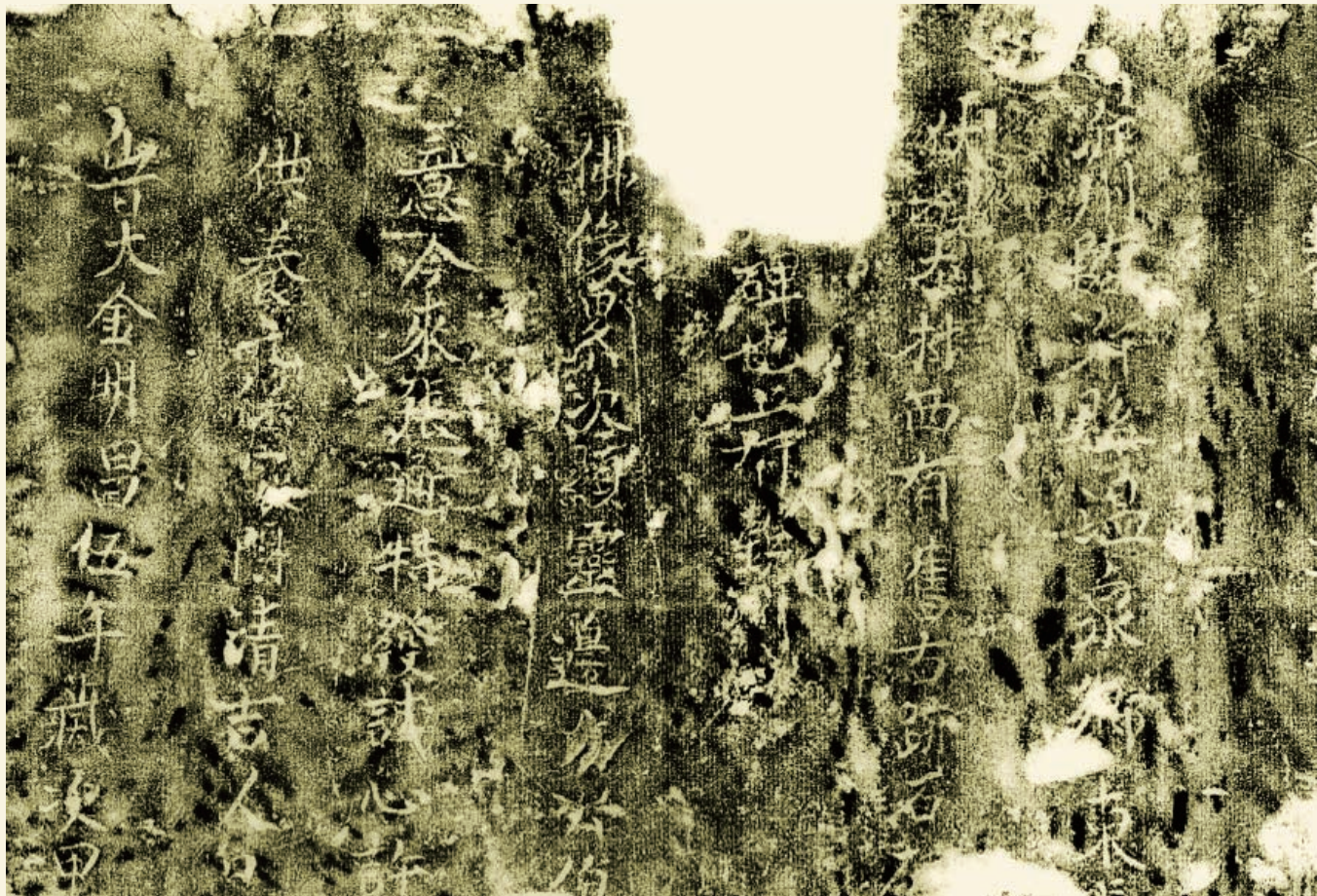
范筑先不但治毒，而且禁赌禁嫖。当日将所有赌场进行了查抄，只有大赌徒齐华亭逃到了美国教堂内躲藏，所有赌资一律没收，赌徒皆进入模范监狱。这监狱设在南关大教场，在狱中所有赌徒平日要学习和参加劳动，皆拒绝保释。同时又将所有妓院查封，所有妓女也集中到模范监狱，还选派医生为其医治性病，并设立了纺织等手工艺让其学艺，将来好自力更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妓女自愿从良，大多为其找主嫁人成立了幸福的家庭。从此临沂的妓院就不见了，性病也得到了遏制。范筑先县长的德政也一直被临沂人所称颂。

（未完待续）

新发现汤头温泉的重要刻石

刘家骥 许涛

乡的行政区划的设置。最早的记载见于战国时期的著作，譬如《国语·齐语》，到了唐朝：“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通志》。从此，乡作为县以下行政单位固定了下来。宋朝沿袭了唐朝的制度，而与宋朝对峙的金朝是个什么样子呢？本篇依据最新发现的碑刻，作出了明确地解答。





拓片局部



经幢残石

临沂市河东区有关汤头温泉的记载由来已久，《汉书》、《水经注》及临沂的各种史志皆有论述。更为人们经常见到的是民国二十四年续修的《临沂县志》中有一些温泉的老照片和人们经常传颂的“琅琊八景”之一“野馆汤泉”赞的舒祥诗（明代）。而有关更古老的碑刻始终未发现。如今发现了一块金朝的经幢残石；它上面的文字非常重要，它是金明昌五年（1194年）的刻石，此经幢原应是八面，现只有一半。其铭文为：“……东张村赵文王悦□薛□……沂州临沂县温泉乡东张……伏覩本村西有旧古迹石碑……碑也上有镌刻佛像累次显灵边□……意今来张通特发诚信许□……供养乞保家门清吉任□平安……时大金明昌伍年岁次甲寅……”

此石刻的重要性在于其确切记载了在金代临沂县的地名即有温泉乡和东张村（即今太平街道办事处之东张屯），而这一石刻即是在东张屯发现的。对照金代临沂的行政设置确实也设有沂州临沂县。而具体到乡——温泉乡，这还是第一次重要的发现。

关于温水之称可参考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沂州府志·古迹》所载：“温水乡，县东北六十里，汉昭帝封刘安国为温水侯，即此。”这段记载出于《汉书》王子侯表，“温水侯安国。胶东哀王（刘贤）子。元凤六月辛丑封，十年，本始二年坐上书为妖言赦免”。《水经注》的记载是“温泉入沂”。而现在的汤河是入沭。至于何时改道就没法考证了。但《汉书》记载了“温水”，《水经注》记载了“温泉”，这算是有史可查的。至于以温泉命名地名，这石刻的记载是（金代）明昌五年为温泉乡。这是临沂古代以名胜来命名地名的先例。故此这块经幢残石对考证汤头温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天外来客”

——莒南大铁牛庙村的陨石

徐淑彬



在黄海之滨的鲁东南，兖石铁路旁边的莒南坪上镇大铁牛庙村中，有一个千余年来被当地居民称之为“铁牛”的自然铁块，由于这个缘故，铁牛庙村在当地有较高的知名度。还在1982年春，我们对兖石铁路进行文物普查时就曾初访过这位“铁牛”。经近几年的研究表明，“铁牛”原来是一颗远古的“天外来客”——石铁陨石。

古老的传说

关于“铁牛”来历的传说，谁也不清楚是从哪一辈开始流传的。多少代生活在铁牛庙村和附近的村民们，一直在纳闷这个怪物是从哪里来的。由于旧中国科学的落后，“铁牛”在当地有着许多神秘色彩的传说。其中有一个附近家喻户晓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如今“铁牛”躺卧的地方，有一座尼姑庵，里面住着一位老尼姑。一个腊月三十的下午，老尼姑正在院中碓米，忽听得天上有惊人的唢哨声传来，她抬头望去，猛见得天空中有三头牛朝院里飞来，眼看就要落下，老尼姑急忙用手中的扫碓杆赶打飞牛，正巧这一下打在一头黑牛身上，它应声落地，另外两头牛吓得逃之夭夭，不知去向。那被打中的黑牛，就变成现在的“铁牛”。为了驱邪避妖，镇住这个怪物，附近村

民捐款在“铁牛”旁边修建了一座寺庙。如今，寺庙所在村子就叫铁牛庙，附近的南铁牛庙和西铁牛庙村都是因此而得名。

科学的见证

“铁牛”并不太象牛的形象，而是一块褐色的大铁块，呈南北向卧伏。北端翘起的部分，人们叫做“牛头”，中间凹陷的部分叫“牛背”，南端微凹的部分叫“牛尾”。它全长140厘米，最宽处80厘米，最大厚度80厘米。粗略的估算其体积约有0.6立方米，总重量约4000公斤以上。

“铁牛”的表面结构呈粗糙麻面，间有分布密度不均匀的气孔，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但其最大者可达10厘米。经取样分析，在锯开的新鲜断面上见有许多微小孔隙，颜色新鲜者为铁灰色，具有较多的延展性，难以焊割，与铸铁相比，前者无脆性。经南京大学王鹤年等人研究，该陨石的主要组成成分为铁质，约在70%以上，其次为硅、铝、镍等，还含有少量的铬、磷、硫、碳等。“铁牛”的主要矿物质成分为锥纹石、镍纹石、合纹石、斜方辉石和石英等，其次要矿物成分为陨硫铁、陨磷铁镍矿、铬铁石、石墨和磁铁矿等。在上述矿物中，陨硫铁、陨磷铁镍矿、镍纹石、锥纹石、合纹石为鉴定陨石的标志矿物。除上述外，“铁牛”还具有特征的结构构造，如海绵陨铁结构、维氏台登像构造、留曼线构造以及熔壳构造等。

把“铁牛”陨石的物质成分与结构构造同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各类陨石相比较，可知它是一种石铁矿类陨石。它的重量和体积仅次于我国陨石之王——新疆铁陨石，是我国目前第二块特大陨石。作为石铁类陨石，一般发现较少，约占陨石总量的4%左右。它的发现，对于探索天体的起源和演化，研究行星内部的物质组成以及宇航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千年前的撞击

“铁牛”是何时陨落到地球上来的呢？对“铁牛”现场考查表明，该陨石自坠落后，未曾移动过。对其清理时发现，底部埋入土中并深入下伏基岩片麻岩中约50厘米，底端与基岩接触部分，有厚约2—5毫米的熔融物所组成的薄壳，主要成分为长英质、混杂部分的铁质。估计是在坠落时撞进基岩的瞬间，同其接触的岩石受热后融化所致。在陨石隐入地下部分的表面还见有一些大型熔失沟和熔失坑，后者直径一般在10厘米左右，深5厘

米，形态上不规整。

对铁牛庙村一带考古调查得知，“铁牛”陨石所在处原有一座“南岳天齐庙”六间，当地人简称“天齐庙”，庙中原有泥塑像，解放前被毁。“铁牛”位于庙院内的西南角，旁边曾有两幢石碑，其中一幢石碑记载，该庙初建于唐代，为一道观，后来变成尼姑庵，明代曾重修。文革中两幢石碑皆散失。为了核实“天齐庙”与“铁牛”陨落的确切时间，我们通检了当地现存的明清两代编写的方志《莒州志》、《日照县志》，以及汉代以来的《史记》等古籍文献，均未见有关记载（按：我国有史以来各个朝代在编写上一个朝代或当朝的正史时，一般都将当时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与罕见的现象记录下来）。考古调查发现，铁牛庙村附近远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在其东的大青峰峪村就有旧石器地点。新石器以来至汉唐的各个时期古文化遗址和遗物也屡有发现。这表明这一带数万年来一直适宜人类生息繁衍。考虑到“铁牛”陨石的重量和体积，其陨落时给地球的撞击所产生的力量和震动是不会太小的。自周代始，铁牛庙以东40余公里的安东卫村附近就曾有莒国附庸“纪鄆”城。至汉代，当时的封建政府在日照曾设海曲县，专营盐业，西汉末年海曲县曾发生著名的吕母起义。明代为加强海防，则在安东卫设卫。可以说，自周代以来，该地人口繁盛，经济发达。从汉代以后的正史与地方志中不见“铁牛”陨石的记载看，该陨石陨落的时间可能在汉代之前，最晚不会晚于唐代建庙。由于这颗陨石见于基岩表面，周围又无可资鉴定的古文化堆积层，因此，要确定它究竟能早到什么时间，我们至今尚无证据。即使是从唐代建庙（唐代我国佛教盛行，各地修建寺庙风极盛）算起，“铁牛”陨石陨落到地球上至少有千年之余了。所以，我们称之为远古的“天外来客”。

由于“铁牛”陨石的发现对于探索天体的起源和演化，研究行星内部的物质组成，发展宇航事业都有着重要科学价值，该陨石已被正式命名为“莒南石铁陨石”。莒南县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将其加以重点保护，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几年来，经临沂市的陨石收藏爱好者们调查研究，认为大铁牛庙村的陨石应该是唐代陨落，莒南县的文物部门在确定该陨石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同时，也认定是唐代的陨石。迄今为止，该陨石还是世界范围内经科学家系统研究的最大石铁类陨石。

美景动诗灵 好诗留美景

——《沂蒙诗话》之二

李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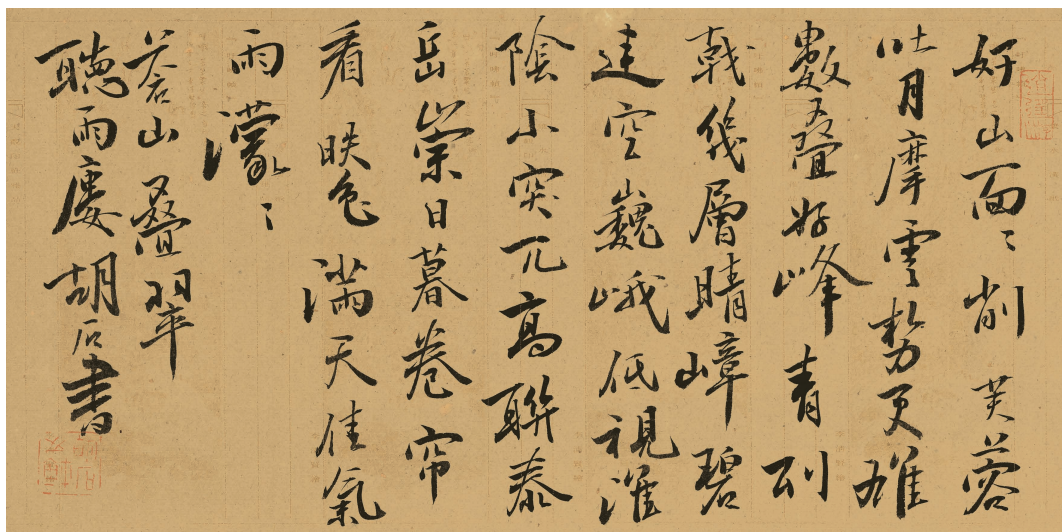
琅琊八景，久名于世。明清诗家，多有吟咏。明代舒祥的咏《琅琊八景》诗尤为人称道，至今传诵。所咏八景，有自然景观，有人文景观。历经岁月沧桑，有的景观早已无存，有的景观则焕然一新。当年的美景，曾激发了诗人创作的灵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今欣赏这历久不衰的优美诗篇，又会把读者带入那令人陶醉的美好境界。舒祥，河南新安人，生平不详。八首诗写于何时，也无史料可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八首诗是他在春天游览了八景之后写成的。一个外乡人对琅琊八景能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一方面说明八景确实很美，另一方面也说明舒祥对名郡琅琊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方面都明显地体现在他的诗中。八首诗贯穿着一个“美”字，一个“爱”字，即八景的美，诗人的爱。从总体上看，诗有如下特点：一是，着意春天，深蕴生机，给人以希望。二是，诗语清新，格调高昂，给人以鼓舞。三是，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给人以启迪。四是，写景传神，富有画意，给人以美感。具体到每一首诗，又各有特色。

《苍山叠翠》

好山面面削芙蓉，吐月摩云势更雄。数叠好峰青列戟，几层晴嶂碧连空。

巍峨低视淮阴小，突兀高联泰岳崇。日暮卷帘看秋色，满天佳气雨濛濛。

苍山叠翠景观，在今临沭县城北5公里处的苍山。这里层峦叠嶂，高插天际，山重水复，云笼霞披，林木葱翠。登苍山之颠可瞰大海。“叠翠”，是苍山的特点，也是这首诗所写的重点。诗的首二句写苍山的雄伟气势，以“芙蓉”来比喻山的秀美，用“吐月摩云”来形容山的高峻。三、四两句紧扣“叠翠”着笔。用“数叠”、“几层”写出了苍山的群峰竞秀；用“列戟”、“连空”来形容山形的奇险高耸；用“青”、“碧”来描绘山色的苍翠。五、六两句是写立足山巅，游目骋怀，顿觉天高地阔，感到“淮阴小”、“泰



胡石书法《苍山叠翠》



山崇”。这一方面是进一步写苍山的“巍峨”、“突兀”，另一方面也拓宽了诗的境界，把视野从苍山扩展到了更远更高的地方。诗的前六句写的是晴午游览苍山的所见所感。诗的七、八句却调转笔锋，写了苍山日暮时的雨景。春雨，又使苍山呈现出朦胧美。暮霭沉沉，春雨濛濛，卷帘静观，满天佳气。多么美的一幅《春日暮观雨图》。可见作者深得画家“润含春雨”的三昧。这两句诗隽永含蓄，余味无穷。读之，会使人联想起唐人王勃的“竹帘暮卷西山雨”，宋人苏轼的“山色空蒙雨亦奇”、“晚雨留人入醉乡”。春雨，为苍山增红添绿，春雨泽润的苍山，自然会更加葱翠。

《神峰积雪》

细认奇峰似未真，乱山高下夔如银。
冰封石窦流泉断，风搅林丛折竹频。
万木低斜无宿鸟，一歧平满少来人。
东君夜到知消息，开遍梅花几树春。

神峰积雪景观，在今苍山县城西北的文峰山。山峰高峻，背阴处冬季初春积雪，经久不消。东面一片白石皑皑，远望如雪。故称神峰积雪。诗的首二句写远望，奇丽的神峰似乎看不真切，只见参差错落的山峦都被如银的积雪覆盖。诗的三、四句写近看，坚冰封住了山上的石洞，平日汨汨喷涌的山泉已经断流；冷风搅动着丛林，平时亭亭玉立的翠竹也被吹得频频低弯。诗的五、六句写山中的寂静冷清，密密麻麻的山林里没有过宿的鸟雀，弯弯曲曲的山径上少有来往的行人。这清净洁白的境界，颇似唐柳宗元所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境。但是，冰雪毕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作者在诗的七、八句着意写了东君到来之夜，凌雪绽放的几树梅花。真是神来之笔。这点晴之处，激活了全诗。红梅映雪，春意盎然，迷人景色，喜悦心情，跃然纸上。诗的前六句极写神峰积雪的“冷”，正是为了衬托梅花绽放的“暖”。读着这两句诗，自然会使人想起明代诗人高启咏梅花的名句：“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原来神峰积雪的美，不仅美在白雪，更是美在梅花。可见这首诗的重点，好象在写积雪，实际上是在写梅花，在赞美梅花凌雪绽放、报到春信的高尚品格。

《平野晓霁》

苍苍微曙霁高台，几树桃花昨夜开。
疏柳啼莺三月届，断云迷雁九天来。

千门辟尽晨钟散，百役奔初晓漏催。

此际登临观下境，满城春色涌蓬莱。

平野晓霁景观，在旧沂州州治东。这里原有平野台，台上建有平野亭，左临城楼，右接城曲。亭名“平野”，取唐杜甫“平野入青徐”诗意。亭不知何时初建。元代初年，郡守储天章重修。成为一大景观。登临其上，可外瞰沂、沭、涑之水，内览城中的寺观、楼阁等建筑。尤其在曙光初照之时，登亭观光，更是赏心悦目。因称“平野晓霁”。金人刘文蔚曾为此写《平野亭赋》，元人张文翰有《平野亭记》传世。这首诗就是对平野晓霁景观的赞美。诗的首二句写晨光熹微，云霞浮动，笼罩亭台，几树桃花，带露开放，鲜艳夺目。诗的三、四句写翠柳莺啼，云天雁来，河滨三月，风景宜人。这四句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城外平野充满生机的桃源风光。读之，自然会使人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平野春色弥漫，城中春早人勤。诗的五、六句写城中寺院里的钟声飘散，家家门户敞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奔波劳作。诗的七、八句写作者清晨登临亭上，俯瞰城中之景，曙光普照，春色满城，犹如置身蓬莱仙境。全诗表现了作者对名城大好春光的赞美和对安居乐业生活的向往，既有对眼前美景的描绘，也蕴藉着理想的色彩。平野晓霁景观虽已不存，但这美的诗却能让人尽情想象那美的境界。

《普照夕阳》

碧玉楼头日未沉，几家残照半城阴。
斜分宝刹千层影，光灿瑶龛百丈金。
归雁携云投北浦，啼猿迎月上东林。
柴门欲掩诗僧定，坐向闲庭抱膝吟。



清末平野亭

普照夕阳景观，在临沂城内洗砚池北最高处。普照寺是在王羲之故居旧址上修建的。普照夕阳的奇观是有效地利用了光学的折射原理，透过普照寺西墙天窗的光线，照射在佛像身上，然后通过折射发散至四面八方，使整个佛堂都被夕阳的余辉照亮。可见这一景观是自然现象与人工建筑完美结合形成的。诗的首二句先写红日西沉的景象：巍峨庄严、金碧辉煌的的宝殿上头，还能看到下落的夕阳，城中只有几家稍高的房舍闪着夕阳的余辉，其余都渐渐昏暗了。诗的三、四句细写夕阳斜照古寺的奇观：夕阳照射在宝殿西墙的天窗上，显出层层叠叠的光影，金光又照射到瑶龕供奉的佛像百丈金身上，佛像的金光又照亮整个佛堂。诗的五、六句写傍晚在寺院所看到的远景：春天回归的大雁与落霞一起飞向北面的水滨，啼叫的野猿迎着升起的圆月攀上东边的树林。读“归雁携云”句，会使人想到唐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妙语。诗的七、八句写寺院入定之后，喜欢咏诗的僧人将要关上柴门，坐在闲静的庭院抱膝吟诗。这首诗写的是一种清净的境界，蕴含着诗人不入世俗的情怀。那“抱膝吟”的“诗僧”，也许就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在赞美普照夕阳景观的时候，自然也会想起书圣王羲之来。他在《登晒书台》诗中写道：“五车书废砚池荒，志士移家入渺茫”，“手泽千年磨不尽，几番风动散芸香”，抒发了对王羲之及其书法的赞美之情。

《孝河凝冰》

镇日东风鼓翠澜，长河吹遍水如干。
银屏皎洁连川合，碎玉棱层映月寒。
堤畔鹭联飞始见，波心鱼隐钓犹难。
王祥一去千多载，留得冰模与后看。

孝河凝冰景观，在临沂城北约13公里处的东孝友



孝河旧景

村。这里是孝子王祥的故里。村南有一条小河，称孝河。王祥是魏晋大臣，以孝行名世。晋干宝《搜神记》记载：王祥性至孝，事继母，“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这就是民间传说的王祥“卧冰求鱼”。这首诗写孝河凝冰，重点是写王祥的孝行，赞美王祥的美德。诗的首二句先写初春孝河的水：早春整日的东风吹起孝河的碧波，孝河上下春水涌动，使人感受到，惟有村前孝河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触景生情，睹物思人，自然就会联想起曾生活在这里的王祥。诗的三、四句写初春孝河的冰：春寒料峭，夜里河水又凝结了一层薄冰，晶莹的冰层象皎洁的银屏，覆盖了整个的河面，碎玉般的冰块在月色下闪耀着寒光。睹此景象，自然就会联想起王祥“剖冰求鱼”的传说。诗的五、六句写栖息在孝河堤畔的一群白鹭联翩起飞，河里的游鱼都深藏在水底。写白鹭长幼有序，联翩起飞，是衬托王祥的孝友懿行；写游鱼深藏，垂钓之难，是衬托王祥破冰求鱼，更是不易。诗的七、八句写王祥逝世已千多年了，他那冰清玉洁的德行却成为世代学习的楷模。作者对王祥的仰慕之情，都蕴含在诗中了。

《沂水拖蓝》

拖蓝曳练漾微波，百合泉来渐满河。
蒙谷雪消苍泽长，沭田雨后翠涛多。
青含冷雨沿堤树，绿锁寒烟近水莎。
但见渔舟随处落，不妨风浪夜如何。

沂水拖蓝是自然景观，在旧临沂城东北沂、沭汇流处。沂河北来，有时水清，沭河西来，有时水浊，两水乍合，一时清浊分明。伴随着浊水的清流，泛出美丽的蓝色，好象沂河中拖曳着一条蓝色的彩练，缓缓而流，经久不混，故称“沂水拖蓝”。有时相反，沂浊沭清，同样形成“拖蓝”的胜景。这种奇观时有时无，时东时西，使人感到奇异神秘，故列入八景。这首诗所描绘的就是这一奇观。诗的首二句，就写了春水满河，微波荡漾，“拖蓝曳练”的景象。诗的三、四句写蒙山山谷的积雪消融，化作长长的清流，注入沂河，古沭邑田野上的春雨使沭水陡涨，波涛汹涌。此时，沂河水流清缓，沭河水流浊急，二水汇流，便呈现出“拖蓝曳练”的美景。诗的五、六句写春雨飘洒，堤树泛青，烟霭朦胧，春草染绿，处处生机盎然，滨河两岸的景色更加迷人。诗的七、八句写河里捕鱼的点点渔舟，到了傍晚，便随处停泊，有的泊在烟渚，有的靠在柳岸，一点也不管夜晚的风浪会怎样。表现了渔民纯朴的风情，豪爽的性



格。读这两句诗，也会使人想起唐司空图的诗句：“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通观全诗，有景，有人，有情。不仅写了“沂水拖蓝”的奇观，而且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春雨渔乐图》。这样优美的境界自然令人陶醉。

《泥沱月色》

夜半银蟾印碧流，澄澄波底一轮秋。
分明水府开金镜，仿佛天河浸斗牛。
宿雁不惊矶上客，潜鱼还避渚边鸥。
渔郎隔岸相呼语，尽是芦花暗钓舟。

泥湖沱月，即泥沱湖的月色。泥沱湖原在临沂城西南9公里处。周十余里，中有圆洲，夏秋菱荷并茂，清香四溢，月夜泛舟，宛若仙境。这首诗就描写了这一景观。诗的前四句重点写湖天月色。首二句说，半夜银色的月亮照射在碧清的湖水上，澄澈的波底又呈现出一轮圆月。展现了月光如水水如天，天上水底双月圆的美景。三、四句用两个比喻来形容明月的美，一个是说波底的月亮，就象水府打开的金镜，一个是说天上波底的双月就象沉浸在天河里的斗牛二星宿。水天一色，境界空阔。诗的后四句转写湖上风光。五、六句写停宿在湖中的大雁不因石矶上的游客而惊飞，潜游的鱼儿却时时都要避开小洲边的鸥鹭。七、八句写渔人隔岸呼唤传语，顺着呼声望去，只见迷迷茫茫的芦荡深处暗藏着一只只垂钓的小船。全诗写月、写水、写雁、写鸥、写鱼、写游客、写芦荡、写钓舟、写渔郎，有色有声，有实有虚，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如梦如幻，别有风韵。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优美环境的赞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

《野馆汤泉》

汤山山下涌汤泉，溅喷珠玑颗颗圆。
半亩聚来清彻底，一泓深处碧涵天。
风狂暂失池心月，气热长生水上烟。
春雨正多还溢出，满沟环珮振潺湲。

野馆汤泉，即汤头温泉。景观在临沂城东北30公里处的汤山下。据《沂州志》载：这里“有泉三穴，沸如沃汤，上有亭榭。百步处，另名女汤、癞汤，俱为温泉，浴之，可以去疾”。这首诗的重点是写“汤泉”。写“汤泉”，又巧妙地选择了“春雨正多”的时间，这就使景观不论在时节、在色彩或音响上，都增添了更多的意趣。诗的首二句写汤泉喷涌的动态，泉水从汤山下

涌出，喷珠溅玑，圆润有声。诗的二、三句写泉水呈现的颜色，是清澈澄碧，半亩水面，澄清见底，天光云影，映在水中。诗的四、五句写有时夜里风大，池水激荡，碧波暂时隐没了浸在水中的月影，泉水长温，热气蒸腾，水面上时时飘浮着一层烟气。诗的五、六句写春雨正多，池水上涨溢出，水在沟中缓慢流动，泉水淙淙，如鸣珮环。全诗从水态、水色、水波、水质、水温、水气、水声等多方面写了汤泉的美，并以天光月影春雨相烘托，更增添了汤泉的美感韵味。下汤洗浴，清明时节尤盛，远近浴者络绎于途。诗尽管没有直接写清明人们下汤洗浴，但诗中特意点出“春雨正多”，说明诗中所写正是清明下汤时的所见所感。那男女老幼下汤洗浴的欢快情景，自然尽在不言中了。



汤头温泉旧景

颜真卿书法之古代研究

胡拙安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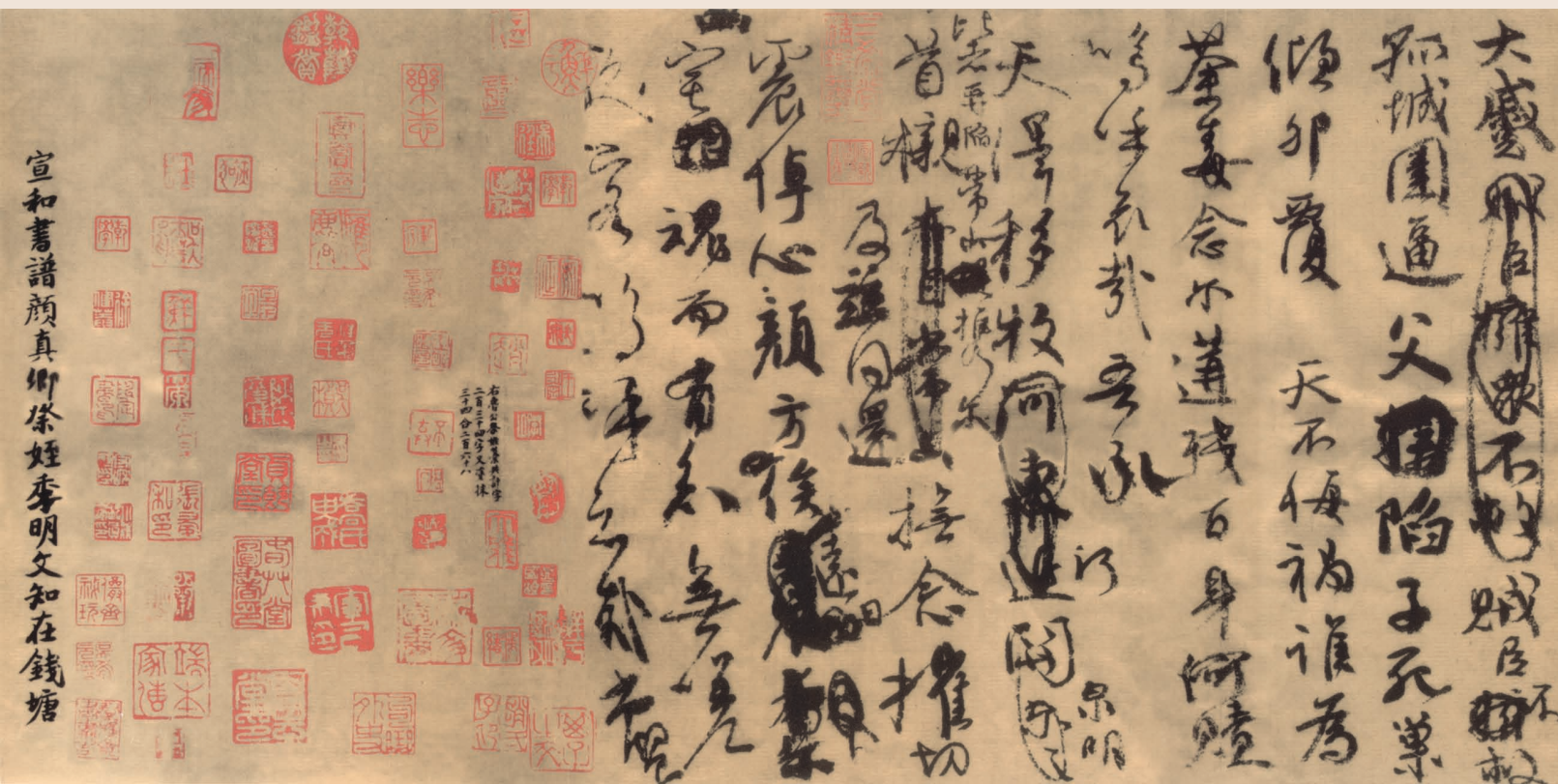


颜真卿（709—784，一说709—785），字清臣，汉族，祖籍唐朝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中国唐代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颜真卿的书法自唐至现代，历代都有人对颜书进行研究。古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书品和人品的关系，颜氏书法的源流，颜书的笔法等方面，也有对主要碑帖的评论。虽然多为意象式评点，但言简意赅，往往一语中的。

论述书品和人品的关系

首开其端的是宋人欧阳修，他在《集古录》中对此屡有言及：“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余谓鲁公书如忠臣烈



宣和書譜顏真卿徐姪季明文知在錢塘



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故虽其残缺，不忍弃之”。

欧阳修对颜真卿的推重，完全取决于他“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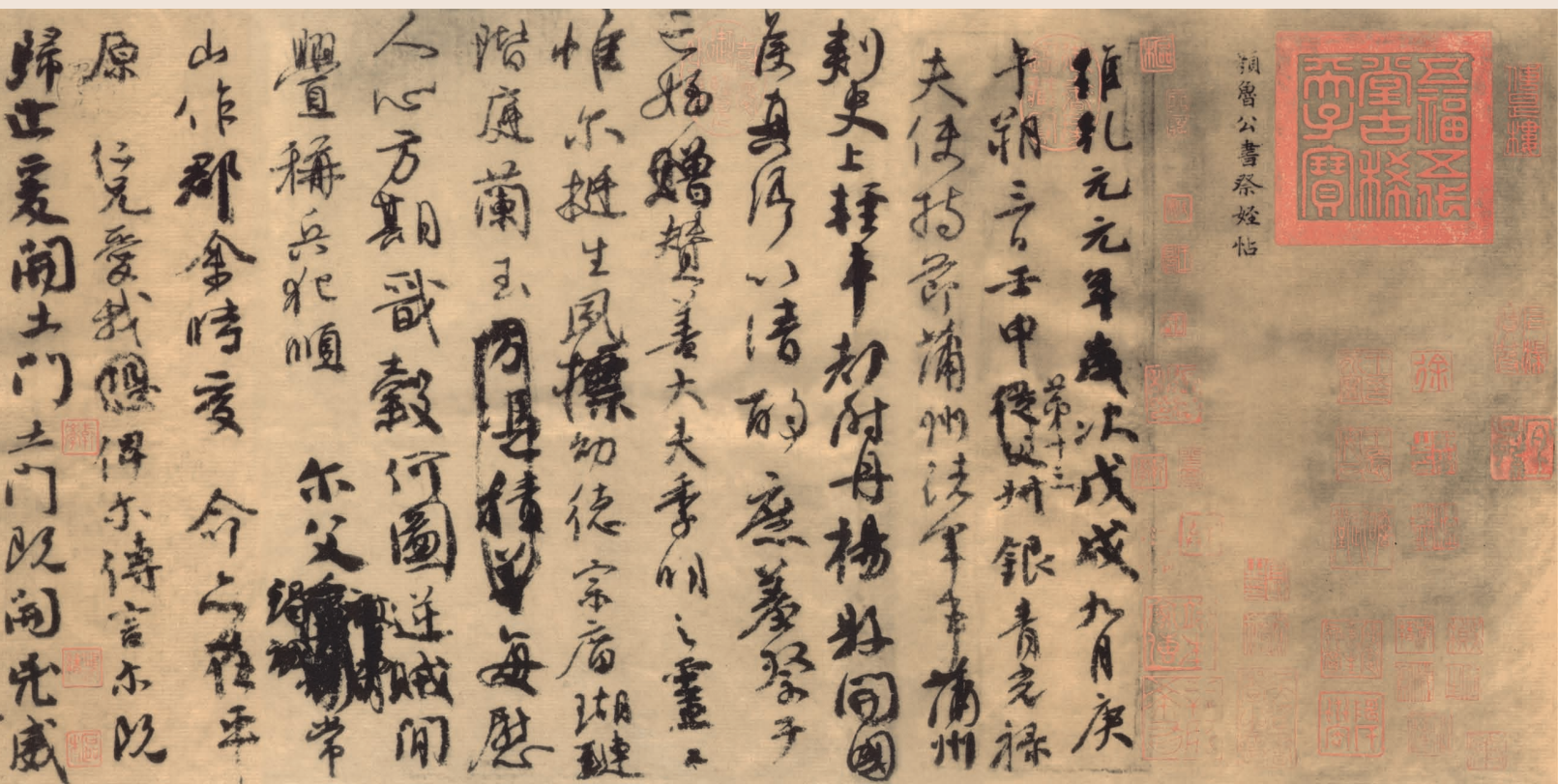
所谓“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这正是书如其人说的观点。既然书如其人，那么，“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故欧阳修又在《笔说·世人作肥字说》中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认为书能否“传遂远”，与书家人品关系极密切。人们之所以爱重颜书，珍视杨、李之书，实缘于对其人品的钦仰。

苏轼比欧阳修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密，他觉得上述说法未免绝对，故而易之以更为圆融的说法：“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为人而已。凛乎若见谏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

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题鲁公帖》）苏轼一方面认为书家人格与书作的艺术风格关系甚密，另一方面又不承认二者之间必然契合无间，因而以书观人、以书判人只能得其品格的“邪正之粗”（大概）。值得称道的是，苏轼在“字画工拙之外”注意到了“趣”（书艺之趣味），在人品、书品之间注意到了“理”，即“人情随想而见”之理），从而将探索的触角伸到书法本体的内核和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中。

和欧、苏相比，“书如其人”说被朱长文运用得更广泛、更娴熟。人品与书品的关系，已由言其大概而转为具体精微，并落实到具体的书法作品中。《续书断》称：“盖随其所感之事，所会之兴，善于书者，可以观而知之。故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余皆可以类考。”

在这里，人书互相观照已非泛泛而论，而是和书家创作时“所感之事”、“所会之兴”联系起来，并和具体的书作挂上钩，遂使书品、人品的关系从只可意会的理念形态，落实到了可以言传的具体的书法作品之中。



探索颜真卿书法的源流

黄庭坚《山谷题跋》说：“颜鲁公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处，故尊尚徐浩、沈传师尔。”又说：“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逸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山谷集》）明代董其昌也认为颜书学习了“二王”笔法，深得灵和之致：“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唯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室，绝去欧、褚轻媚习气”，“唐时欧、虞、褚、薛诸家，虽刻画二王，不无拘于法度。唯鲁公天真烂漫，姿态横出，深得右军灵和之致，故为宋一代书家渊源。”（《画禅室随笔跋自书》）到清代，康有为、阮元提倡碑学，认为颜书主要来源于北碑，吸取了北碑刚健雄浑的气质。康有为说：“颜鲁公出于《穆子容》、《曹植》，其古厚磐礴，精神体格，悉似《穆子容》，又源于《晖福寺》也。清臣浑劲，又出《圆照造像》，钩法尤可据”。（《广艺舟双楫·导源十四》）阮元认为：“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跋争座位帖》）刘熙载认为颜公不只继承“二王”和北碑，他师承前代书家范围还要广泛：“颜鲁公书，自魏晋及唐诸家皆归隐括。东坡诗有‘颜公变法出新意’之句，其实变法得古意也。”（《艺概》）

有的书家把颜书之源追溯到魏晋以前。朱长文说：“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唯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续书断》）孙承泽指出：“鲁公楷书带汉人石经遗意，故去尽虞、褚娟娟之习。”（《庚子消夏记》）

论述颜真卿的笔法

清周星莲认为：“颜鲁公古钗股、屋漏痕，皆是善使笔锋，熨贴不跛，故臻绝境。”（《临池管见》）明项穆说：“颜清臣蚕头燕尾，宏伟雄深，然沉重不清畅矣。”（《书法雅言正奇》）元郑杓、刘有定指出：颜真卿“善楷书、行草。盖古书法，晋、唐以降，日趋姿媚，至徐、沈辈，几于扫地矣。而鲁公蔚然雄厚端雅，有先秦科斗、籀隶之遗思焉。”（《衍极》并注）朱长文用比喻的手法描绘出颜书笔画的特点：“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

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续书断》）

颜真卿的笔画有如“古钗股”、“屋漏痕”、“蚕头燕尾”，是他敢于创新的结果。正如苏轼所指出的：“鲁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题孙莘老墨妙亭诗》）姜夔认为颜书笔法是改革“晋、魏之风轨”的结果：“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书法之无助，而晋、魏之风轨，则扫地矣。”（《续书谱·用笔》）

对主要碑帖的评论与研究

历代书家评论较多的碑帖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郭家庙碑》、《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元结碑》、《宋曠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祭侄文稿》、《争座位帖》、《与蔡明远帖》、《刘中使帖》、《裴将军诗》等。书论文章有的评论其艺术成就、风格特点，如说《祭侄文稿》“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道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出天造”（宋陈深）。有的指出其不足，如说《多宝塔碑》“小远大雅，不无佐史之恨耳”（明王世贞）；“此书太整齐，失之板耳”（明何良俊）。有的论述其在颜书演变中的地位，如认为《争座位帖》为“世之颜行第一书也”（宋米芾）。

由于审美观的不同，对颜书的评论也出现过不同的观点。如米芾对“颜体”正楷有持否定态度的言论，他说：“大抵颜、柳挑剔，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宝晋英光集》）“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海岳名言》）李煜也有类似的观点：“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于粗鲁。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书述》）

这些贬抑颜书的观点，自然要受到崇颜派的批驳。清冯班说：“颜鲁公书磊落巍峨，自是台阁中物。米元章不喜颜正书，至今人直以为怪矣。鲁公书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米元章以为恶俗，妄也，欺人之谈也。”（《钝吟书要》）孙承泽也不同意贬低颜楷：“宋人谓鲁公真不如行，有意不如无意，此非深知鲁公者也。宋人无真楷，坐是故耳。鲁公书道辉映千古，终以楷为极则也。”对于所谓“颜体”“粗鲁”，包世臣也有不同见解：“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艺舟双楫》）

曾子故里武城考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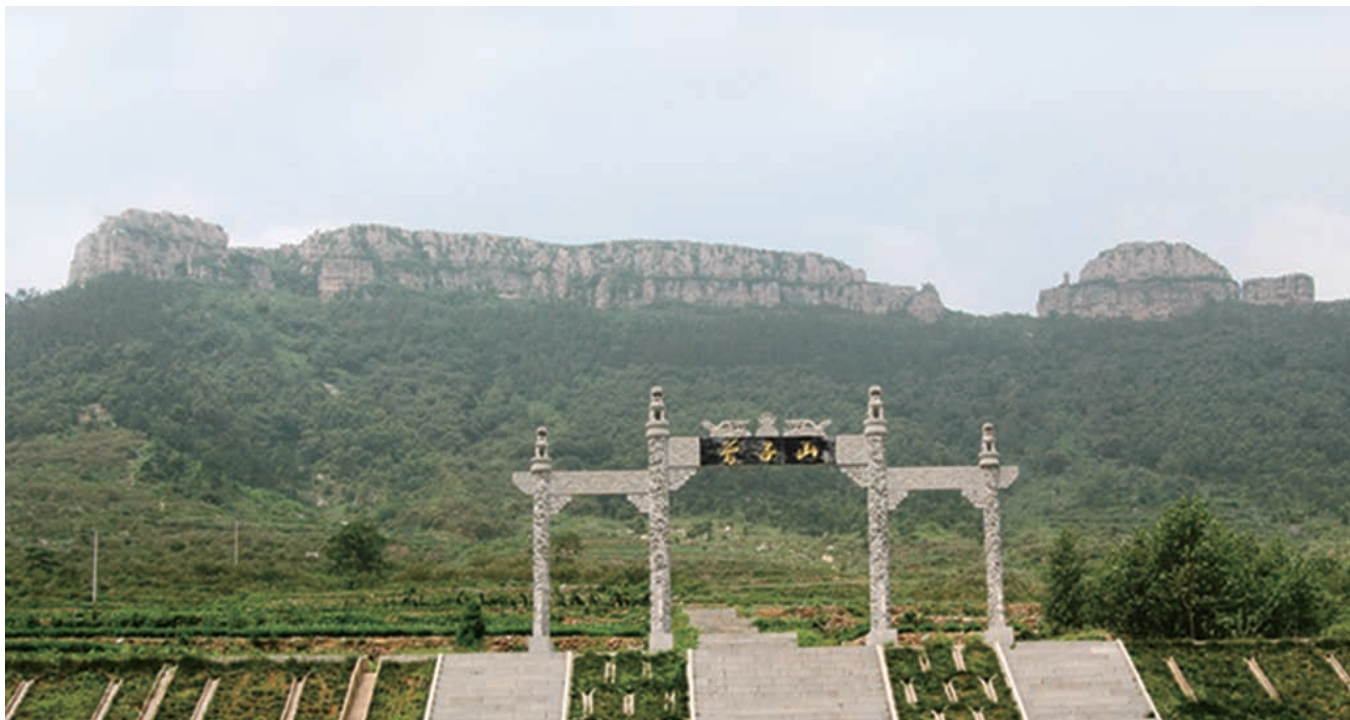
李洪廷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武城人，生于鲁定公五年（前505），约卒于鲁悼公三十五年（前432）。他是孔子著名弟子，儒家思想重要传人。

曾子故里鲁武城，又名南城、南武城，即今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于春秋鲁襄公十九年（前554）筑城，距今县城北35公里。

“武城”始见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晋杜预注曰：“泰山南武城县。”《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哀公八年、哀公十一年所言之武城及《论语·阳货》“子之武城”均指此地。《孟子·离娄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战国时，季氏据费为国，武城为费国所属。战国中期一度为齐国所有，武城始称南城。战国末为楚所辖。《说苑·尊贤》称：“鲁人攻鄆，曾子辞于鄆君。”《战国策》卷四《秦策二·秦武王谓甘茂》载：“曾子处费。”《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秦统一中国后，武城属薛郡。汉以后设南城县，又名南武城县，并一度为侯国。北齐撤南武城县并入武阳县，唐贞观元年（627）省武阳县并入费县。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兖州，子游为宰者。”又引《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这里的兖州是指唐贞观十四年所设兖州



上都督府，下辖鲁郡、泰山郡、沂州郡。《齐乘》：“武城，费西、滕东两县之间，子游弦歌旧邑。”后历宋、金、元、明、清至民国初期，南武城均属费县。1940年8月后为费南县所属。1943年12月后为费南县改称的费县所属，1946年4月为平邑县所辖至今。综上所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谓的“武城”与“南武城”为一地，系地处费西滕东两县之间之武城，其地理位置，确然明白，非指他地。

后人之所以将曾参、澹台灭明视为两地人，源于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和“澹台灭明武城人”的误解。孔子弟子曾子、澹台灭明本皆武城人，为什么独于曾子里籍前加一“南”字呢？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曾子南武城人》云：“宋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曰：‘武城有四：左冯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县名。……’清河特曰东武城者，以其与定襄皆隶赵，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实鲁邑，而东武城者，鲁之北也，故汉儒又加南以别之。史迁之传曾参曰南武城人者，创加也，子羽传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清代学者阎若璩《四书释地》“武城”条亦认为：“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传》之南武城，鲁边邑也。在今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吴未灭与吴邻，吴既灭与越邻。……《史记》加‘南’于武城上者，别于鲁之北有东武城也，明曾子之为费邑人也。”其说甚是。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一第三十五“曾参南武城人”条考澹台子羽（灭明）、曾参本籍时亦认为南武城、武城为一地。钱氏云：“传云：‘王犯尝为之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是子羽为近吴之南武城，确有明证。故子游之所宰，曾子之所居，即子羽之邑，为近吴之武城，亦曰南武城。《史记》所载，本甚明白。今必曰曾子非南武城人，而别寻一地以说之，皆非也”。

《明史》卷二百八十四《儒林传·曾质粹》载：明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者陷入穴中，得悬棺，碣曰‘曾参之墓’。”此后，嘉祥南武山之阿城遂被附会为曾子故里，春秋鲁武城的地望便被认为在今嘉祥县地。但今嘉祥县，为《禹贡》“大野之地”。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战国时为亢邑地，秦置亢父县，汉为亢父县地、巨野县地，隋任城县地、巨野县地，唐、五代、宋因之。金皇统中析任城及巨野置嘉祥县，县城初设于原巨野山口镇，嘉祥县之阿城位于县城南40里，西周春秋战国从未设邑，东汉始为金乡县城，后魏时金乡县城南迁原夏缙国、周宋缙邑、汉东缙县故址，即今金乡县县城所在地。此后，阿城无县治所在，北魏《水经注》称此为故城。嘉祥县设立后阿城为嘉祥县所属。

嘉祥阿城不是鲁武城，更非曾子所居之武城。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七《圣里志·四配世家·曾子》说：“西汉改武城为南武城县，今南城山有曾点墓是也。向使曾子不家武城，胡其母之织于此，而葬其父于南城也耶？据《春秋》、《论语》、《曾子书》、《孟子》、《史记》、《王符论》，曾子为费武城人的矣。”“嘉祥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乃今附会为费之武城，子游所宰之邑，曾子所居之武城，其谬甚矣！”“假借《史记》南武城之南字，而不考杜预注《地理志》、《括地志》）、诸儒辩证诸书，讹矣！”并呼吁应该“详加考订，为先贤正首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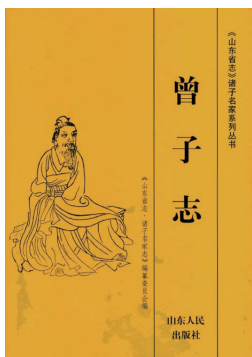
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考武城》认为曾子故里“在今之嘉祥县，其说全无所本”。“或曰：‘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成化中有渔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如此之类，盖难以尽信也。”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考费县”条云：“《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注：‘泰山南武城县。’自古迄明初，无异说。明成化后，忽以嘉祥之后汉金乡县城当之，《前录》（指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辩之已悉。明费人王雅量有《曾子居武城考》，见《山东通志·阙里志》，辨驳尤详。”同书在“考嘉祥县”条考称：“金乡县故城在南四十里今阿城村，明代忽名之为鲁武城者也。鲁武城

之不在县境（指今嘉祥县），《前录》考辨已悉。此等无稽之谈，稍知今古者必不为惑”，“非考明此城古为何城，终无以执沿讹之口”。经详细考证后，叶圭绶认为阿城为“汉金乡县故城明明白白”，“不知此为金乡故城可也，至谓之鲁武城，不可解矣”。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书〈武城家乘〉后》：“知春秋武城必在今费者，即以曾氏事证之。”并列史籍加以详证：“《史记》既云‘曾子南武城人’；《战国策》则云‘昔曾子处费，同姓名者杀人，曾子母织自若’；《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说苑·尊贤》则云‘鲁人攻鄆君，曾子辞于鄆君’，盖越兵假鲁伐三家者。《檀弓》云：‘季氏卒，曾皙依其门而歌’，以曾皙在费故附会其事。又云‘曾子之席华而晬’，曰季孙之所赐也。曾子父母及身终始皆在费，然则可因曾子证南武城在费。”在详考武城为费之武城后又说：“后人反以武城改曾子于嘉祥，其为谬也甚矣。…‘曾氏修谱者偶见《史记》言曾子南武城人，遂谓嘉祥即南武城，又妄与人争，是其识之愚也。”

清光绪年间曾国荃重修《宗圣志》卷十《林墓》记曾子第七十代孙曾国藩在其亲至嘉祥拜谒曾子庙墓后，对此也有怀疑。他在日记中说：“庙在南武山下，山高约五十丈，一片顽石，不生草木。”“在庙西南里许，北、东、西三面皆山，墓在平地。……余观山石顽犷，地势散漫，不似葬圣贤者，殊以为疑。”1997年1月，山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决定编写《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曾子志》，委托平邑县人民政府承编。1998年6月，初稿完成后，召开了志稿评议会。会议期间中国社科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临沂师专等单位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对志稿进行评议的同时，实地考察了曾子故里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对曾子故里平邑说给予了充分肯定。

综上所述，曾子故里为春秋鲁武城，即战国南城，汉南武城、唐至清末的费县南武城，今为平邑县南武城。对此，自战国、明、清至现代的著名历史学家、权威性史学著作都是肯定的。嘉祥南武城非春秋鲁武城，与曾子无丝毫瓜葛。曾子故里嘉祥南武城说纯属伪托附会。



清代历任山东巡抚

井窥斋

巡抚是明清时代的封疆大吏，又称抚台，掌管各省的军政。清代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官衔略低于总督，若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为从二品，若加兵部侍郎衔为正二品。明初巡抚为临时差遣之官，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多为监察督理各地税赋、河道、军事等事务临时而设，事毕则返京交差。明代后期巡抚之职位高权重，有权节制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实际成为三司的顶头上司，遂逐渐成为一省最高军政长官。



袁树勋

有清一代历任山东巡抚凡152人，名单如下：
方大猷，浙江乌程人，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任。
丁文盛，辽东广宁人，顺治二年（1645年）任。
张儒秀，辽东人，顺治四年（1647年）任。
吕逢春，辽东人，顺治五年（1648年）任。
朱国柱，辽东人，顺治五年（1648年）任。
夏 玉，辽东人，顺治六年（1649年）任。
耿 燉，辽东贡生，顺治十一年（1654年）任。
许文秀，奉天人，顺治十六年（1659年）任。
蒋国柱，奉天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任。
周有德，奉天辽阳人，康熙二年（1663年）任。
刘芳躅，顺天宛平进士，康熙七年（1668年）任。
袁懋功，顺天香河人，浙江进士，康熙九年（1670）任。
张凤仪，直隶宣化进士，康熙十年（1671年）任。
赵祥星，奉天义州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任。
施维翰，江苏上海进士，康熙十八年（1679年）任。
徐九龄，浙江钱塘进士，康熙廿二年（1683年）任。
张鹏，江苏丹徒进士，康熙廿三年（1684年）任。
郎永清，奉天人，康熙廿五年（1686年）任。
钱珏，浙江嘉兴举人，康熙廿六年（1687年）任。
佛伦，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廿八年（1689年）任。
桑格，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卅一年（1692年）任。
杨廷耀，奉天海城人，康熙卅四年（1695年）任。
李炜，直隶武清举人，康熙卅五年（1696年）任。



孙宝琦



周馥

王国昌，奉天官学生，康熙卅七年（1698年）任。
 赵世显，奉天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
 蒋陈锡，江苏常熟进士，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任。
 李树德，汉军正黄旗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任。
 谢赐履，广西全州举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任。
 黄炳，满洲正白旗人，雍正元年（1723年）任。
 陈世倌，浙江海宁进士，雍正二年（1724年）任。
 布兰泰，满洲正白旗人，雍正三年（1725年）任。
 塞楞额，满洲正白旗进士，雍正四年（1726年）任。
 岳浚，四川成都荫生，雍正六年（1728年）任。
 法敏，满洲镶蓝旗人，乾隆二年（1737年）任。
 硕巴，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四年（1739年）任。
 朱定元，贵州广平举人，乾隆五年（1740年）任。
 晏斯盛，江西新喻进士，乾隆七年（1742年）任。
 喀尔吉善，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八年（1743年）任。
 方观承，安徽桐城人，乾隆十一年（1746年）任。
 阿里衮，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十一年（1746年）任。
 白准太，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十二年（1747年）任。
 兆惠，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任。
 鄂容安，满洲镶黄旗人，鄂尔泰长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任。
 杨应琚，汉军正白旗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任。
 郭一裕，湖北汉阳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署任。
 鄂乐舜，满洲镶蓝旗进士，鄂尔泰从子，乾隆二十年（1755年）调任。
 白钟山，汉军正蓝旗人，乾隆二十年（1755年）署任。
 爱必达，满洲镶黄旗人，遏必隆孙，乾隆廿一年（1756年）署任。
 鹤年，满洲镶蓝旗进士，乾隆廿一年（1755年）调任。
 杨锡绂，江西清江进士，乾隆廿一年（1755年）署任。
 阿尔泰，满洲正黄旗副贡，乾隆廿二年（1756年）任。
 崔应阶，湖北江夏荫生，乾隆廿八年（1763年）任。
 梁燾鸿，陕西三原荫生，乾隆廿九年（1764年）任。
 明德，满洲正红旗任，乾隆卅一年（1766年）任。
 李清时，福建安溪进士，乾隆卅二年（1767年）任。
 富尼汉，满洲正黄旗举人，乾隆卅三年（1768年）任。
 彰宝，满洲镶黄旗翻译举人，乾隆卅三年（1768年）任。
 富明安，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卅四年（1769年）任。
 何焯，浙江山阴人，乾隆卅六年（1771年）任。
 周元理，浙江仁和人，乾隆卅六年（1771年）任。
 徐绩，汉军正蓝旗举人，乾隆卅六年（1771年）任。
 杨景素，江南甘泉人，乾隆卅九年（1774年）任。
 郝硕，汉军镶黄旗荫生，两江总督郝玉麟之子，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任。
 国泰，满洲镶白旗荫生，四川总督文绶之子，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任。
 诺穆新，满洲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署任。
 明兴，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九年（1783年）任。
 长麟，满洲镶黄旗进士，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任。



张人骏



尚其亨

胡季堂，河南光山荫生，胡煦之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署任。
 惠龄，蒙古正白旗人，乾隆五十五年任，五十八年再任，嘉庆五年三任。
 江兰，安徽歙县贡生，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护任，五十七年再护。
 吉庆，姓觉罗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任。
 福宁，满洲镶蓝旗生员，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任。
 穆和兰，满洲旗人，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任。
 毕沅，江苏镇洋（今太仓）状元，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任。
 玉德，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任。
 伊江阿，满洲正白旗人，永贵之子，嘉庆元年（1796年）任。
 宜兴，满洲旗人，嘉庆四年（1799年）以仓场侍郎暂署。
 岳起，满洲镶白旗举人，嘉庆四年（1799年）任。
 陈大文，河南杞县人，原籍浙江会稽，进士，嘉庆四年（1799年）任。
 全保，蒙古镶黄旗人，嘉庆五年（1800年）护任，十一年署任。
 蒋兆奎，陕西渭南进士，嘉庆五年（1800年）任。
 吴俊，江苏吴县进士，嘉庆五年（1800年）护任。
 和宁，又名和瑛，蒙古镶黄旗进士，嘉庆六年（1801年）任。
 祖之望，福建浦城进士，嘉庆七年（1802年）任。
 倭士布，满洲正红旗人，嘉庆七年（1802年）任。
 陈钟深，广西临桂举人，嘉庆八年（1803年）护任。
 铁保，满洲正黄旗进士，嘉庆八年（1803年）任。
 长龄，蒙古正白旗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
 邱庭隆，顺天宛平进士，原籍江苏，嘉庆十一年（1806年）护任。
 吉纶，满洲镶蓝旗任，嘉庆十二年（1807年）任，十四年再任。
 百龄，汉军正黄旗进士，嘉庆十三年（1808年）任。
 朱锡爵，顺天大兴举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护任，十七年再任。
 同兴，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任。
 章煦，浙江钱塘进士，嘉庆十九年（1814年）署任。
 陈预，顺天宛平进士，嘉庆十九年（1814年）任。
 和舜武，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廿三年（1818年）任。
 程国仁，河南商城进士，嘉庆廿四年（1819年）任。
 李鸿宾，江西德化进士，嘉庆廿五年（1820年）署任。
 钱臻，浙江嘉兴荫生，钱汝诚之子，钱陈群之孙，嘉庆廿五年（1820年）任。
 徐忻，直隶天津举人，道光元年（1821年）任。
 琦善，满洲正黄旗荫生，道光元年（1821年）任，三年再任，五年三任，七年四任。
 杨健，湖南清泉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护任。
 程含章，云南景东厅举人，道光三年（1823年）任，七年再任。
 讷尔经额，满洲正白旗进士，道光五年（1825年）护任，六年再护任，九年任。
 伊里布，满洲镶黄旗进士，道光五年（1825年）任。
 武隆阿，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五年（1825年）任。
 贺长龄，湖南善化进士，道光六年（1826年）署任，七年再署任。
 陈中孚，湖北武昌进士，道光六年（1826年）任。
 卢坤，顺天涿州进士，道光六年（1826年）任。
 刘斯崐，江西南丰进士，道光九年（1829年）护任，十二年再护，十六年三护。

钟祥，汉军镶黄旗进士，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

经额布，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任。

杨庆琛，福建侯官进士，道光十九年（1839年）护任。

托浑布，蒙古正蓝旗进士，道光十九年（1839年）任，廿二年再任。

程鹞采，江西新建进士，道光廿一年（1841年）授，未到任。

梁宝常，直隶天津进士，道光廿一年（1841年）任，廿三年再任。

麟魁，满洲镶白旗进士，道光廿二年（1842年）任。

王笃，陕西韩城进士，道光廿三年（1843年）护任，廿四年再任。

觉罗崇恩，满洲正红旗廪贡，道光廿四年任，咸丰三年署任，四年三任，七年四任。

陈孚恩，江西新城（今黎川）拔贡，道光廿七年（1847年）署任。

张泮中，陕西潼关进士，道光廿七年（1847年）任。

刘源灏，顺天永清进士，道光廿八年（1848年）护任，咸丰元年再任。

陈庆偕，浙江会稽进士，道光廿八年（1848年）任，咸丰元年再任。

李惠，陕西华阴进士，咸丰二年（1852年）任。

张亮基，江南铜山举人，咸丰三年（1853年）任。

吴廷栋，安徽婺源拔贡，咸丰七年（1857年）护任。

文煜，满洲正蓝旗人，咸丰九年（1859年）任，十年再任。

清盛，满洲正蓝旗人，咸丰九年（1859年）护任，十一年再任。

谭廷襄，浙江山阴进士，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

阎铭敬，陕西朝邑进士，同治二年（1863年）任，五年再任。

丁宝楨，贵州平远进士，同治五年署任，十一年再任，十三年三任。

文彬，满洲正白旗进士，同治十年（1871年）署任，十二年再署。

李元华，安徽六安举人，光绪二年（1876年）护任。

文格，满洲正黄旗进士，光绪三年（1877年）任。

周恒祺，湖北黄陂进士，光绪五年（1879年）任。

任道镛，江苏宜兴拔贡，光绪七年（1881年）任。

陈士杰，湖南桂阳拔贡，光绪九年（1883年）任。

张曜，顺天大兴人，祖籍浙江，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

福润，蒙古正红旗附贡，光绪十七年（1891年）任。

汤聘珍，湖南善化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护任。

李秉衡，奉天海城人，祖籍山东，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任。

张汝梅，河南密县人，光绪廿三年（1897年）任。

毓贤，满洲正黄旗人，光绪廿五年（1899年）任。

袁世凯，湖南项城人，光绪廿五年（1899年）任，廿七年丁母忧服阙改署任。

胡廷干，河南光州（今潢川）进士，光绪廿七年（1901年）护任，三十年署任。

张人骏，直隶丰润进士，光绪廿七年（1901年）任。

周馥，安徽建德附贡，光绪廿八年（1902年）任。

尚其亨，汉军镶蓝旗进士，光绪三十年（1904年）护任。

杨士骧，安徽泗州进士，光绪卅一年（1905年）任。

吴廷斌，安徽泾县人，光绪卅三年（1907年）署任。

袁树勋，湖南湘潭人，光绪卅四年（1908年）任。

孙宝琦，祖籍仁和人，宣统元年（1909年）任。



毓贤



杨士骧

马陵之战战址之争

秦士杰

战国中期的齐魏马陵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孙庞斗智的故事两千年来流传不衰，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马陵战址究竟在何处却一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存争论。

应当承认，马陵战址的确认、马陵之疑的破解是历史遗留的一大难题。究其原因是史籍记载的疏略，史料的不足，使我们很难直接找到明确的答案；而后人的种种猜测、臆断，又频添了重重迷雾。为了使马陵之战研究继续推进，我们不妨对战址争论的来由和历史作一番简略的回顾。

最早记载马陵之战的史籍是《史记》、《战国策》、《竹书纪年》和《孙臆兵法》。作为史学名著的《史记》，对马陵之战的记述虽较其它各书更为详细，但也有不够全面、不够明确的缺点。有些记述甚至相互



抵牾，给人带来不少疑惑。诚如缪钺先生所言：“司马迁撰史记，采战国策纵横说辞凡九十余事，其中也有不尽可信者。”以至在战争起因、时间、交战国、战场以及战争过程等方面均有疑点。《竹书纪年》、《战国策》虽然保存一些珍贵的战国史料，但历史上原本早已散佚，现在能看到辑佚本已非原出，资料十分有限，亦不能提供马陵战址的明确答案。

正因为马陵之疑是古即有之的客观存在，所以就需要人们去面对，否则，“其为惑也，终不解也”。尽管解开此疑案并非易事，但从古及今探求马陵战址者仍是不乏其人。长期以来，那些指称马陵战址的人，都是在为史籍经传作注疏时以寥寥数语发表意见，很少有人作系统、综合的研究。最早指称马陵战址的是东晋的虞喜。他在《志林》一书中说：“马陵在濮州鄆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他的这一说法不知何据，但被唐代张守节采用。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用虞喜之说，并加上一句话：“按：庞涓败即此也。”由此产生了马陵战址鄆城说。然而，张守节引虞喜的说法并非《志林》原文，他是以自己复述的。张守节是唐朝人，唐朝有濮州，而晋朝并无濮州，晋朝鄆城东北六十里亦无马陵，地形也不是“涧谷深峻”，所以鄆城说从一开始就不能成立。后因鄆城一带区划变迁频繁，遂又衍生出范县说、濮县说、莘县说，皆以虞喜、张守节之说为祖本。与鄆城说长期并存的是元城说，其始作俑者为晋刘宋人徐广。徐广在《史记音义》中说：“马陵，在魏州元城县东南一里。”徐广的说法源于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杜注：“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后林尧叟又在杜注后加注：“史记，马陵道狭，而旁多阻碍，可伏兵。”从而将元城马陵与马陵战址联系在一起。史记三家注的另外两家即刘宋的裴骃（撰《史记集解》）和唐代司马贞（撰《史记索隐》）都引用徐广说“在元城”，于是在史记三家注中就形成了鄆城说与元城说并存的局面。然而，徐广的“元城说”其实是对杜预注的误用。杜预是为春秋时期“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一事作注，指出会盟的地点是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的马陵，这与马陵之战并不相干。由于杜预、徐广都是为经籍作注疏的学术权威，“元城说”有很深远影响，就连有名的唐《元和郡县志》、宋《太平寰宇记》、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各书都采用元城说。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管是鄆城说还是元城说，其产生的形式都是一样的，皆由一句注文引起。虽然最初的说法本无什么根据，但后人辗转引用，陈陈相因，这最初的说法便成了“根据”。说来奇怪，尽管从两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多次改朝换代，这两说仍能长期共存。两个美猴王也不怎么打架，亦未分真假。要说绝对不排斥对方，也不尽然。主濮州鄆城说的张守节就曾经发难：“齐师走大梁，败魏马陵，岂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说定非也。”张守节找不到更有力的论据向对方诘难，就按自己设想硬找理由，拿不该渡河说事。其实他又错了：马陵战时，大梁与元城同在河水东岸，去元城不必渡河，所以张守节的诘难对元城说没有什么影响。总而言之，这两说并没有真正交锋。再就是这两说的生存方式也是相同的。不管有多少人需要指称马陵位置，都可在二者中任选其一，根据需要选中哪个就以哪个为根据。所以我们现在不必去统计有多少主张鄆城说，有多少书引证元城说。两说长期并存的状况是与其存在方式相伴的，人们遵循的模糊学，只在为经籍注疏时采用或引用某一说，没有谁去叫真，正经八百地论证探讨马陵战址究竟在哪里。

到了清代，情况有些变化。清代编史修志之风大盛，一些在历史上与齐魏战事相关的地方自然对马陵之战旧事重提。地方志涵盖面广，记历史、记大事、记名人、记古迹、记传闻轶事，很多方面都涉及到马陵之战。由于地方志编纂时间短、内容庞杂，修志者也不可能深入研究马陵之战的所有方面，他们只是尽力搜寻当地有关资料，再与史书记述进行整合，将马陵战事写入志书。清代有多部地方志记载马陵之战在本地，因此就有多处孙臆射杀庞涓的地点。如《东昌府志》、《濮州志》、《范县志》、《观城县志》、《沂州志》、《郟城县志》、《新郑县志》、《大名县志》等。这样鄆城说、元城说又被派上用场，靠近哪个就挂靠哪一说。沂州、郟城靠不上这两说，它的根据是马陵山一带与马陵之战相关的地名和传

说。由此，郟城说也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冒出来的新说。若以县志记载而论，与范县、大名、濮州是同一时期。另据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载：“马陵岗在县治南六十里许，绵亘五十余里，上有孙臆、庞涓二庙”，中牟县虽有马陵地名、孙庞遗迹等，但县志编者并不认定齐魏马陵之战在当地，而是在志书中特别注明：“按：孙臆杀庞涓于马陵在山东兖州府郟城县，今有马陵山。涓事梁惠王为大将军，召臆至魏，刖其足。中牟属魏，故土人祀之，因以马陵名岗，实非斫树白书处也。”河南的志书如是说，可见郟城说在清乾隆时期就有不小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地方志，将同一件马陵之战，拉在许多地方，实在是有些乱套。于是，编通志的就出面裁决。《山东通志》：“谨按，在直隶元城县是也。元城县附郭，故或以大名府言之。方輿纪要，马陵道在大名府东南十五里。”另一部《山东通志》则说：“战国马陵在今直隶大名府元城县东南十五里，后人谓在曹州府濮州者误，谓在沂州府属者愈误。”为什么如此裁定，大概是元城说最早，主张者更具权威性。《大清一统志》则仿效正统史家司马光，取两说并存的态度，实则倾向于元城说：“杜注：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是马陵当在今直隶元城县。……”虞喜《志林》云：“鄆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马陵，涧谷深峻，可以伏兵。但元城县在战国属魏，鄆城则属齐。按是时孙臆入魏已三日，庞涓始反逐之，臆纵却走，亦不应退至齐地。而虞喜之言凿凿，姑从旧志两存之。”不管怎么说，清代编修地方志对马陵战址研究有所推动，它使所有与马陵战址相关的地方都有所行动，搜集历史资料，来证实马陵战场的位置。虽然从总体上未出鄆城元城两说的窠臼，但亦有所突破，新郑说基本退出，郟城说现身。

建国后，历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相继有多部著名史学家编写的通史问世。这些通史当然要涉及马陵之战这一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事，对战址也都标明了具体地名。然而由于这些史家无暇对马陵之战作专题研究，战址问题也只能沿袭旧说，依然是大名、鄆城、范县、濮县诸说并存，马陵战址仍然不能确认。不过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出土文物的发现，提供了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历史的新材料，推动了战国史的研究。帛书纵横家书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司马迁所未见到的历史资料。特别是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失传1700年的孙臆兵法重见天日，意义非同一般。这部较为完整的古本兵法，提供了有关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许多宝贵资料，为《史记》、《战国策》所未见。一个对孙子兵法、孙臆兵法以及马陵之战的研究热潮悄然兴起。马陵战址郟城说就是在此背景下崭露头角的。

1981年，《东岳论丛》第三期发表左牧文章《马陵之战战址及起讫时间考》，明确提出郟城马陵山为齐魏马陵之战战场。

1985年，《中国史研究》第一期发表王焕春文章《魏齐马陵之战在郟城马陵山》。

1991年，《临沂教育学院学报》第一期发表秦士杰文章《马陵考辨》。

1991年，《河北学刊》第二期发表王焕春文章《马陵之战新解》。

1991年10月，郟城县成立马陵战址研究课题组，并于12月15日在县城召开研讨会，宣读了论文《魏齐马陵之战在郟城马陵山新证》，临沂地区历史学会名誉会长、临沂师专王汝涛教授作书面发言《马陵之战的战地问题应认真研究》，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马陵战址“郟城说”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更多的人随之投入了马陵战址的研究。

1992年2月，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室主任吴汝嵩一行三人前来郟城马陵山考察，对郟城马陵战址研究提出了不少指导性意见。

1992年4月11日，第三届国际《孙子兵法》研讨会在临沂召开，马陵之战战址研究课题组长薛宁东、课题组顾问王汝涛教授参加学术会议。郟城县提交了有关马陵战址郟城说的论文四篇，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中《齐魏马陵之战在郟城马陵山新证》、《齐魏马陵之战发生在郟城马陵山补证》被收入大会论文选《孙子探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国家文物局、国防大学、省社联机构的专家学者相继来郟城马陵山考察，省内外社科研究单位及大专院校，都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开始对马陵之战作专题研究，发表了数十篇重要论文。1992年9月19日至21日，由山东省社联、省历史学

会、临沂地区社联，郯城县政府联合召开的“海峡两岸孙臆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在临沂召开，100多名专家学者和各方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35篇，与会人员通过研究论文，深入讨论，对马陵战址在郯城形成共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大众日报、河北日报以及省内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研究成果收入王汝涛、薛宁东、陈玉霞主编的《孙臆兵法暨马陵之战之研究》文集（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出版）。郯城说的提出，引发了马陵之战及《孙臆兵法》的大研讨，参与人数及发表的论文之多，都是空前的。以1992年学术讨论会为标志的马陵战史研讨高潮，其作用和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郯城说”的提出，并非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此说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活动。左牧是最早以论文形式提出此说的人（1981年），王焕春1985年在《中国史研究》发表论文时，已经潜心研究了10多年。秦士杰与王焕春经常联系，共同研讨马陵战址，于1991年发表论文。这些研究均属个人学术活动，与后来社会盛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毫无关系。1991年以后由于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使这一专题研究呈现了崭新的局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其间也有不同意见或相反意见，这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但郯城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不少文章或学术专著采纳了郯城说。其中有杨善群《孙臆》（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许海山《中国古代战争简史》（线装书局2006）、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院出版社2005）、周建生《齐鲁军事史》（黄河出版社）、王霞《孙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中国古代史》教科书及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等。2001年，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还在郯城马陵山设立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教研基地。2005年10月29日，莘县召开了马陵之战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纪要说，“认定莘县马陵为马陵之战址理由最为充分”。其主要根据是“虞喜志林的记述、古地名、老年人回忆和今日尚存的局部沟壑地貌可证”。但虞喜所说的郟城东北六十里与今天莘县大张镇马陵相去甚远，把马陵之战说成是沟壑之战亦于史无征。至于计划把大张镇改名马陵只为了扩大影响，而对确认马陵战址无补则是显而易见。会议的有些论文还是在试图探寻马陵战址，对人们也不无启发。总之，只要是旨在求真的文章，不管价值大小，都是有益。

马陵战址争议仍然存在，这是历史造成的烦恼。马陵战址研究仍不能停步。我们认为真理会愈辩愈明，关键是有人去研究。有了疑问不去探究，虽千年之后仍是疑问。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学识深厚的专家们参与研究。

特色鲜明 亮点纷呈

——简评《东山区志（1991—2005）》

周博 张广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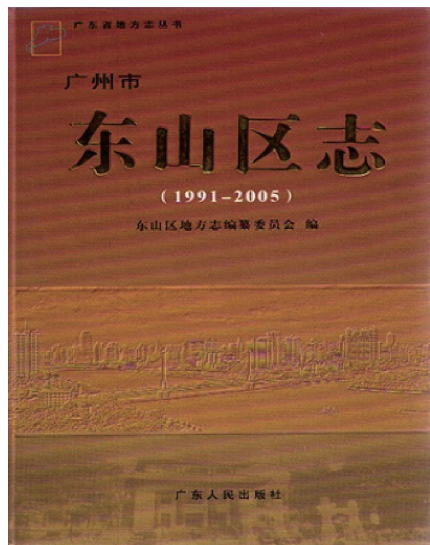
东山区是广州市辖10个行政区之一，地处广州市中心，西连越秀区，东接天河区，南畔珠江，北依白云山，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2005年6月7日，广州市正式宣布撤销东山区建制，将原东山区的行政区域划归越秀区管辖。《东山区志（1991—2005）》（以下称《续志》）历经7年艰辛磨砺编成，是一部条分缕析、朴实严谨、资料翔实、装帧精美的续修区志，于2007年11月呈现在读者面前。全志设7篇、46章、210节、537个条目以及序、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等，共100万字。收录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共配有图片480多帧、图表173个，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全面系统地反映1991—2005年东山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较好地体现了时代演进的历史脉络，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是一部了解东山地情的宝贵资料书。

一、地方特色浓郁

地方特色是地方志书的基本属性，体现地方特色，是对志书编纂工作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一部志书只要能客观、全面、准确地记述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它就会具有地方特色。但是，这并不是说志书编纂者无需在突出地方特色方面下功夫；恰恰相反，正因为一般志书都具有天然的地方性，所以才更需要编纂者努力把最主要的地方特色突出起来，凸现出来。

《续志》在篇目的设置和内容的取舍方面，将东山区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特殊性，做了比较深刻、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全面反映。东山区是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协和广州军区所在地，区内科研、金融、新闻单位众多，全区已认定的总部企业达110家，其中有5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东山设立地区总部或分支机构。《续志》为彰显东山区的区位优势，将“城区建设”篇作为第二篇，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东山区全面推进“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发展规划，完成市政、绿化、文化、安居四大工程55个建设项目，城区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

东山区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现区西界之德政北路已是古任嚣城的东近郊。从辛亥革命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曾是民主革命的发祥地，而东山则是民主革命的摇篮。孙中山、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先人曾常年或多次在东山这方土地上从事革命事业。区内以黄花岗、烈士陵园为代表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众多，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9个。《续志》在第五篇“文化”中将“文物古迹”升格为一章，总计3.5万字，详细记述了东山区内的



遗址旧址、墓葬、建筑、石刻，做到重点突出，特色明显。

东山因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广大华侨置业择居的首选之地，截至2003年，全区共有归侨、侨眷、港澳同胞眷属11.76万人，其海外亲属12万余人分布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续志》善于把握这一地方特色，将“华侨港澳同胞”升格为一章，并设立“侨情”、“侨务”和“贡献”三节，系统地记述东山区与华侨、港澳同胞的亲密关系，反映他们对家乡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积极贡献。可以说，整部志书洋溢着浓郁的侨乡气息，体现了东山作为“都市侨乡”的鲜明地方特点。

二、时代特征鲜明

《续志》时限是1991~2005年，正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社会经济变革幅度较大的时段，适逢经济转制、社会转型，是东山区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15年。本志用科学的资料体现观点，对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社区服务和商业自然行业的记载，力求真实、鲜活，时代感强。

“经济”篇安排15万字，在个体私营经济、服务业、高新技术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章节的内容上增大了分量，真实、鲜活地记录了东山区委、区政府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制定的一系列搞活经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根据“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工作思路，大力发展区街经济、区域经济和总部经济，推动全区经济全面发展的历程。“经济体制改革”一章记述了东山区的区街企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首先逐渐扩大企业自主权，然后逐步把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最后再逐步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外经外贸”一章也反映了东山区做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由80年代的“三来一补”发展成为引进外资和设备，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兴建“三资”企业，全方位对外出口的演变过程。

“政治”篇安排15万字，在区委主要工作和决策、党风廉政建设、人大和政协的参政议政、政府职能转变、组织工作和人事制度改革、工资制度和医疗制度改革等节、目、子目上都重彩浓墨地记载，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建设方面的措施和效果也贯穿于“政治”篇，从而烘托出时代的精华。将“重大决策与施政纪略”单列为第一章，提纲挈领，如实记述了东山区自1991年至并区前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规划，逐渐形成了总部经济、教育强区、社区服务、劳动就业四大品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化”篇将防治“非典”这一突发性公共事件，以专记的形式附在“卫生”章后面，如实记述了东山区委、区政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沉着应对、精心组织，建立健全防治“非典”工作机制，开展防“非典”宣传教育，以社区为重点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病人的救治、隔离和医护人员的防护工作，全区防治“非典”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过程，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

三、图表资料丰富

图照是信息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的史料。一幅好的图照，不仅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有很强的吸引力、感染力，可以发挥文字记述起不到的作用，它可以节省文字，还可以佐证文字记述的真实性、可靠性，弥补文字的不足，更能增强形象直观性，表现出事物的细微情节，有助于对志书内容的理解，还能形象扼要地表明文字难以表述清楚的情况。许多读者在浏览志书时，往往会首先翻阅图照，甚至会以图照为线索，去深入地研读志文。

《续志》共配有图片480多帧，其中彩色图照260多帧，剪裁得体，形象直观，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给后人留下了准确的史料。随文黑白插图照片220多帧，这些随文图附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具有图文并茂、以图证文、以文释图、延伸文字和深化内涵之效。如反映城区建设的图照中有荣获全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的东山广场、广东国际大厦，改扩建后的东山湖公园，整饬前后的东山龟岗对比图，展现了东山区“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的规划成果。反映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的照片，其中，有新建的东山区素质教育基地和中山大学医科学院，有现代化的中山图书馆和星海音乐厅，有群众体育活动的精彩场面，体现了东山区教科文卫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经济方面的照片中，既有环市东中央商务区的鸟瞰图，也有新建企业的外貌景观，还有售货人员的服务情形，展示了东山区经济稳定、持续、快速的发展势头。使读者一目了然，起到直观揭示地方特色的重要作用。

方志中表的形式多，作用大，对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尤为适用。清代学者朱彝尊论及表的作用时讲到：“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古人有“一表抵万言”的说法，这都充分显示出表的作用之大。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事类表，有大事年表、自然灾害表、建置沿革表、人物表等；一类是统计表，是由各类统计数字组成的表格或以统计数字为基础的统计

图。

《续志》正文中插入了173个设计完美、内容充实的统计表，共计205页，约占全书总页码的三分之一。这些表紧密配合文字需要，随篇、章、节、目内容而放置，文表相济，生动活泼。如231页的“1991~2004年东山区对外经济贸易情况表”要素齐全，设计合理，起到了概括综合、分类分析、纵横比较、化繁为简、信息量丰富的作用，收到了文字记述所达不到的效果，给人以强烈的说服力、感染力。

四、装帧设计精美

志书不同于一般的图书，它是珍贵的资治存史资料，对弘扬文化、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志书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志书具有重要的长期保存价值。因此，志书的装帧设计必须适应志书的这个特点。

《续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采用正十六开本，硬壳精装，不加护封。版面设计大方得体，富有美感。印刷制作精良，富有质感。封面设计布局简洁，色调典雅，将东山区远眺图以浮雕的形式凸显出来，展现了东山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下衬具有地方标志性的文物古迹，彰显了东山区的文化底蕴，使读者还没有翻开书本，就已经感受到志书浓郁的时代特色、文化特色、地方特色。

书封的纸板选择强度、韧性适度，不易变形的3.0毫米纤维纸板，经久耐用，便于志书的长期保存；封面采用高档装帧纸，通过压痕、烫金、凹凸等特种印刷技术手段进行表面处理，提升了本志的装帧效果；彩页部分使用全彩光泽铜版纸印刷，这种纸张吸墨性小，墨迹不融化，印刷图片的效果清晰、细腻，颜色逼真，层次丰富。

总体上说，《续志》工艺精湛，制作精美，书面平整厚实，书册棱角分明，槽位流畅顺直。在为读者营造以资料性为主体的阅读氛围的同时，构筑一个高品位的艺术审美空间，有效地提升了本志的品质。

五、建议和启示

(一) 本志中统计表的格式比较单一，形式稍显呆板。在二轮修志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选择地加大志书中图表的使用，特别是几何图形（如曲线图、条形图、平面图、圆形图、方块图、金字塔形图等）和形像图（如某种工、农业产品）的使用量，来显

示社会经济现象发展的规模、速度、水平、结构、地区分布等数字变化及其趋势。

(二) 《续志》人物志分“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三部分，其中“人物传”按“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了11名区辖内在1991~2004年去世的著名人物和先进人物；“人物录”收录了15名1991~2005年获得全国和省（部级）、市劳动模范称号的先进个人；“人物表”收录了1991~2005年获得全国性（部级）荣誉称号的先进个人。在二轮修志的过程中，可以考虑扩大人物志的收录范围，将地方上有名望的能工巧匠、草根艺人收录其中，为“小人物”树碑立传。

(三) 兰山区作为临沂市的市区，与东山区有颇多相似之处，在二轮修志中要注意体现自己的地方特色。作为全国第三大批发市场的集散地，商贸物流业已经成为兰山区的经济支柱。在《兰山区志》的篇目设置上，可以考虑以“商城”为主题单列一篇，介绍临沂商城由“大棚底”——“专业批发市场”——“临沂批发城”——“中国临沂商城”的发展过程，凸显临沂商城作为“中国市场名城”的地位作用，展现“商兴水胜，荟萃人文”的历史新貌。

(四) 《续志》的索引有所创新，值得借鉴。在《兰山区志》主题索引的设置方面，可以参考本志的设置方式，在笔画主题索引的前面，使用汉语拼音检字表，使查找更加快捷方便。图片索引包括彩页图片索引和黑白图片索引两部分，其中，黑白图片索引的设置二轮修志中比较少见，在兰山区日后的修志过程中可以采纳这一独具匠心的方式。

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者

——王沂蓬

俞 阳



北京奥运会金牌设计者 王沂蓬

王沂蓬，男，1958年出生，临沂市苍山县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他先后在无锡轻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学习，后在山东艺术学院教了10年书，曾赴俄罗斯、美国学习设计并工作。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天，王沂蓬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欢呼雀跃。当北京奥组委以国际招标方式征集奖牌设计方案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促使他积极投身到这场国际最高水平的设计竞争中。2006年1月，王沂蓬迅速组建了自己的设计团队，并且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锐意创新作为设计奖牌的根本出发点，最终从一百多种思路提炼出了“金镶玉”方案，突破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奖牌设计单一材质的传统，获得了奥组委一致好评。

然而国际奥委会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必须确保奖牌从2米的高度自由落到最硬地面后仍保持完好，而工作时间只剩下两个月了。王沂蓬抓紧请教玉石加工、力学、金属、材料学、结构学等各方面的专家，都没有得到满意结果。于是亲自进行攻关，从使用502胶、双面胶，到复合填充材料，连续几次实验都失败了，王沂蓬的心都要碎了。眼看最后期限临近，王沂蓬顶住压力，连续半个月没有脱衣服睡过好觉，大胆建议厂家“车”深接合槽2毫米，并在金属与玉之间缝隙中填充了液态阻尼材料，实现了“金玉合一”，遂在第四次实验中获得完全成功。

2007年1月11日，北京奥组委通过了奖牌的设计方案。2月8日，国际奥委会最终批准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奖牌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500天之际正式公布：正面采用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图案，背面则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佩玉造型的玉璧，正中的金属图形镌刻着北京奥运会会徽。“金镶玉”的创意，巧妙地完成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中西合璧，象征着“金玉良缘”的美好寓意，使奥运颁奖的盛典突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完美地表达了东方智慧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运动员的尊重，除了将中国文化带进奥运历史外，也让全世界对于中国设计刮目相看。王沂蓬以其勤奋、智慧和坚韧，为中国设计赢得了一块举世无双的金牌。

雪域神医 门巴将军

——记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总医院院长李素芝

孙文婷



李素芝

李素芝，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中共党员，1954年4月出生，1970年12月入伍，1971年10月入党，1976年7月毕业于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因学习成绩优异被留校从事医务工作；1976年12月自愿进藏任军医，1988年任西藏军区总医院胸腹外科副主任，1990年任该科主任，1994年任西藏军区总医院副院长；现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总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4级，少将军衔。

李素芝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植身雪域沃土，勇攀医学高峰，身体力行弘扬“老西藏精神”，刻苦钻研医学技术，满腔热情服务部队官兵，造福西藏各族人民。他先后研读过医学著作、国内外医学杂志400余种，整理读书笔记150多万字，先后攻克高原心脏手术和高山病防治两大世界医学难题。为攻克高山疾病这一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他历时10余年，通过对1万余例各型急慢性高原病发病机理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办法，先后完成了《高原适应不全症防治手册》、《高原红细胞增多症》、《高原病学》等专著，在高原病的研究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在他的倡议下，医院成立了药物研究所，先后研制开发出了“高原康胶囊”、“高红冲剂”、“花虫胶囊”和“九二接骨灵”等15种药品，临床应用治疗高山病效果明显，使驻藏部队急性高原病发病率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50%~60%下降到现在的2%~3%，治愈率达到100%，连续十余年没有一名官兵因急性高山病死亡。2000年11月，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200多次的动物实验、上百次失败打击后，李素芝成功实施了海拔3700米以上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包括双瓣替换术、法乐氏三联症、单心室、大动脉转位等），开创了世界先例，填补了国内高



原医学空白。他结合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积极开展科研工作，不断撰写学术论文，先后发表有价值的学术论文230篇，获得科技成果奖30项，他组织开展的150多项新技术、新业务中，20项创世界医学奇迹、36项属国内首创、86项填补高原医学空白，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20项。他先后成功主刀大小手术13000多例，抢救垂危病人600多名，成功实施高原首例浅低温心脏不停跳心内直视、肾移植、背驼式全肝移植等手术、高原首例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高原首例腔静脉滤网植入术等。

李素芝心系基层官兵，心系民族团结和西藏社会稳定，关心农牧民群众疾苦，他跑遍了西藏边防连队和哨所，行程逾百万公里，为军民巡诊21万余人次，发放“免费医疗证”12000多个，为高海拔官兵和驻地寺庙僧尼建立“健康档案”10000多份。他先后带领500余批医疗队，行程百万余公里，巡诊病人30余万人次。他积极推行西藏农牧民免费医疗，为1000多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他把西藏人们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被藏族群众亲切地称为“门巴将军”（门巴，藏语“医生”）。作为院长，他带领医院不断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目前，西藏军区总医院已成为集医疗、预防、科研、教学、保健及战时卫勤保障功能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医院。

李素芝通过精湛的医疗技术，良好的医德医风，赢得了“高原一把刀”、“雪域神医”的美誉，为推动西藏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为促进汉藏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被评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道德模范”，曾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四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9月14日，他作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受到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的亲切接见。2010年8月1日，中央军委给西藏军区总医院记二等功。



兰陵萧氏

唐士文



兰陵萧氏是西汉开国丞相萧何的后代。《南齐书·高帝本纪》记载：“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小讳斗将，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子鄴定侯延生侍中彪……”《梁书·武帝本纪》记载：“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后也。何生鄴定侯延，延生侍中彪……”萧彪因事免官后，迁“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今苍山县兰陵镇北4公里处的小仲村），成为兰陵萧氏家族的始祖。

兰陵历史沿革

位于山东省苍山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苍山县兰陵镇，其得名相传是因为“高陵”上遍生兰草或兰花的缘故。至于这个“高陵”是指地势曾高出周围平原地表的“兰陵故城遗址”，还是指兰陵镇以西1公里处的小山丘“温陵”（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300米，高出地表约8米），无据可证。温陵很有名气，《汉书·五行志》记载：“惠帝二年（前193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温陵“阳多瓦砾，相传兰陵盛时，民居至此，是廷东里地也”（民国五年《临沂县志·古迹》）

战国时期，楚国在兰陵置兰陵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子首次任兰陵令，乃受楚国相春申君黄歇聘请。由此可考出时在楚考烈王八年（前255年）。兰陵作为县治，至今已有2260多年的历史。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兰陵为东海郡之辖县。西汉沿秦制。三国魏时，兰陵为东海国辖县。西晋元康元年（291年），分东海郡置兰陵郡，郡治于丞县（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峄城镇），兰陵县属兰陵郡。隋开皇三年（583年），废兰陵郡，郡存在293年。隋大业二年（606年），改丞县置兰陵县，治今兰陵镇。唐武德四年（621年），改兰陵县为丞县，属沂州（州治今临沂城）。贞观元年（627年），兰陵县治移郯州（今枣庄市峄城镇）。宋因之。金明昌六年（1195年），丞县复称兰陵县，治今兰陵镇，属沂州。从元代起，兰陵地域归属沂州临沂县。抗日战争时期，兰陵镇为兰陵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8月撤销兰陵县建置。

萧氏起源

姓氏，是姓与氏的合称。《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士而命之氏。”《通志·氏族略序》：“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秦、汉以后，姓、氏不别，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

中国萧氏姓源有出自嬴姓萧氏、姬姓再出于子姓萧氏、外族改姓萧氏三种。东夷族领袖伯益，因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赐嬴姓。其裔孙孟亏在商代被封于萧（今安徽萧县西北），以国为姓称萧氏，即嬴姓之萧姓。西周初，周公东征，嬴姓萧国灭亡，其子孙有迁今浙江萧山者，亦有迁湖广等地者，其事迹史籍记载甚少。外族改姓萧氏是北宋时期，北方辽国契丹族拔里氏、乙室氏、回鹘述律氏、奚族石抹氏等，因崇拜西汉丞相萧何而改姓萧姓。兰陵萧氏则源于姬姓、再出于子姓。对于这一种萧氏起源，《新唐书·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一下》有明确记载，原文如下：“萧氏出自姬姓，帝誉之后。商帝乙庶子微子，周封为宋公，弟仲衍八世孙戴公生子衙，字乐父，裔孙大心平南官长万有功，封于萧，以为附庸，今徐州萧县是也，子孙因以为氏。其后楚灭萧，裔孙不疑为楚相春申君上客，世居丰、沛。汉有丞相酈文终侯何，二子：遗、则。则生彪，字伯文，谏议大夫、侍中，以事始徙兰陵丞县。”这段记载历史面目是：萧氏源于“姬”姓，再出于“子”姓。相传黄帝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东北），长于姬水，故以水名“姬”为姓。黄帝曾孙誉，代颛顼为帝，史称“帝誉”。其子“契”，因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今陕西省商县），赐以“子”姓。契后裔“成汤”，建立商朝。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子武庚于殷（今河南安阳市），以治殷民。周初，武庚参与叛乱，周公以成王名义率军东征，杀武庚。商帝乙庶子名“启”，归周被封于微（今山东微山县），位列子爵，故称“微子”。周公又封微子启于宋，都商丘（今属河南省），以奉商祀。微子启有弟名仲衍，其第八世孙“戴公”。戴公子衍，他的曾孙“大心”，于周庄王十五年（前682年）讨伐宋国大夫南官长万（其杀宋闵公而立公子游为宋君，使宋国大乱）有功，立闵公弟“御说”为宋桓公，被封于附庸国萧，曰萧君。其子孙以萧为姓，大心为萧氏受姓始祖（萧国位于今安徽省萧县）。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楚国灭萧国。其第十四世孙萧不疑，为楚相春申君黄歇上客，世居于丰、沛（今江苏省徐州市辖之二县）。萧不疑子萧琳，即西汉开国丞相萧何之

父。

以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中称萧遗、萧则为汉丞相萧何二子，以及萧则生萧彪之说有误：据《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及《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萧遗、萧则均萧何孙，非子也；萧彪之父乃萧何次子萧延（长子为萧禄）。

兰陵萧氏世系演变概要

西汉开国丞相——萧何

兰陵萧氏是西汉开国丞相萧何的后代。《南齐书·高帝本纪》记载：“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小讳斗将，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子酈定侯延生侍中彪……”《梁书·武帝本纪》记载：“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后也。何生酈定侯延，延生侍中彪……”萧彪因事免官后，迁“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今苍山县兰陵镇北4公里处的小仲村），成为兰陵萧氏家族的始祖。

萧彪生公府掾萧章，萧章生萧皓，萧皓生萧仰，萧仰生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望之是西汉宣帝、元帝时的大臣，曾迁居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20里），生光禄大夫萧育，萧育生御史中丞萧绍。萧绍晚年由杜陵迁回兰陵居住，生西汉光禄勋萧闳，萧闳生西汉济阴太守萧闾，萧闾生东汉吴郡太守萧永（据《南齐书·高帝本纪》，《梁书·武帝本纪》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萧冰），萧永生东汉中山相萧苞，萧苞生东汉博士萧周，萧周生东汉蛇丘长萧嶠，萧嶠生东汉州从事萧逵，萧逵生三国魏孝廉萧休，萧休生广陵府丞（据《南齐书·高帝本纪》，《梁书·武帝本纪》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广陵郡丞）萧豹，萧豹生西晋太中大夫萧裔，萧裔生萧整。

萧整，字公齐，西晋末年任淮阴令，因“永嘉之乱”而造成的北方战乱频仍，携家跟随晋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江左，迁居晋陵武进县（故城）之东城里（今江苏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万绥村）。当时，以河南、山东为主的北方人民与王、谢、周、林、黄、陈、萧、郑等士族大量南迁。东晋政权为了安抚流民和招徕北方士族，在江南地区设置侨（寄居、客居）州、郡、县，保持北方人原籍贯。侨置州、郡、县均沿用北方原地名，例如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侨立徐州、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市西北）侨立琅琊郡与临沂县。东晋收复青、徐等州后，曾把原州、郡名前加“北”字，与侨州、郡、县相区别。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南朝宋后，又取消原州、郡名

前的“北”字而在侨州、郡、县名前加“南”字，萧氏“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

萧整有3个儿子：长子萧儁、次子萧镡、第三子萧烈。萧儁，字子武，为东晋即丘令。其子萧乐子，字闰子，仕宋为辅国参军，昇明二年（478年）九月赠太常。其子萧承之，字嗣伯，仕宋为冠军将军。有3个儿子：长子萧道度，次子萧道生，第三子萧道成。萧道成便是南齐开国皇帝——齐高帝，为西汉相国萧何第二十四世孙。

萧镡生治中萧副子，萧副子生南台治书侍御史萧道赐。萧道赐有三个儿子：长子萧尚之，仕南齐为步兵校尉；次子萧顺之；第三子萧崇之，南齐东阳太守。萧顺之，字文纬，南齐丹阳尹、临湘懿侯，系齐高帝萧道成族弟。萧顺之有十个儿子：即：萧懿、萧敷、萧衍、萧畅、萧融、萧宏、萧伟、萧秀、萧憺、萧恢。其第三子萧衍，梁开国皇帝——梁武帝，为西汉相国萧何第二十五世孙。

萧整第八世祖东汉中山相萧苞的第九世孙萧卓，字子略，仕东晋为洮阳令。其女萧文寿，为宋高祖刘裕继母——孝懿皇后；其子萧源之（萧文寿弟），字君流，东晋徐兖二州刺史，袭父爵为封阳县侯。萧源之子萧思话，郢州都督。萧思话有6个儿子，即：萧惠开、萧惠明、萧惠基、萧惠休、萧惠朗、萧惠蒨。萧惠蒨，南齐左户尚书。生萧介，字茂镜，梁侍中。萧介生萧引，字叔休，南朝陈吏部侍郎。萧引生萧德言，隋秘书少监。萧德言生萧沈，太子洗马。萧沈生萧安节，唐相王兵曹参军。萧安节生萧至忠，为唐中宗、睿宗宰相。

梁武帝萧衍长兄萧懿，字元达，封长沙宣武王。其第五子萧渊明，字靖通，梁第六代皇帝（贞阳侯）。其曾孙萧文憬，任湖州司马。萧文憬生萧元祚，萍乡侯。萧元祚生萧谅，汝州刺史。萧谅生萧直，给事中。萧直生萧革，邵洲刺史。萧革子萧邺，字启之，为唐宣宗宰相。

梁武帝萧衍长子萧统，去世后谥曰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萧誉，后梁宣帝。萧誉第三子萧岿，后梁明帝。萧岿子萧瑀，唐高祖宰相。萧瑀兄萧珣，后梁封南海王。其子萧钧，太子率更令。萧钧子萧瑾，字玄茂，渝州长史。萧瑾子萧嵩，唐玄宗宰相。

萧嵩子萧衡、萧华。萧衡，太仆卿、驸马都尉。萧衡子萧复，字履初，唐德宗宰相。萧复生萧湛，萧湛生萧寔，唐懿宗宰相。萧寔生萧遵，字得圣，唐僖宗宰相。萧华，唐肃宗宰相。有子萧恒、萧悟。萧恒，殿中侍御史。其子萧俛，字思谦，唐穆宗宰相。萧悟，大理司直。其子萧傲，字思远，唐僖宗宰相。萧傲孙萧顷，

五代后梁宰相。

兰陵萧氏自西晋淮阴令萧整南迁江左后，家族兴旺，名人众多：刘宋时，因萧文寿为皇太后，宋外戚萧氏显赫。自南齐至后梁，萧氏皇帝计17位（侯景私自所许临贺王萧正德、王琳所立永嘉王萧庄除外），王侯者数以百计。南朝宋、齐、梁、陈，兰陵萧氏任宰相的有25位：宋宰相萧道成、萧贲；齐宰相萧映、萧嶷、萧子良、萧锵、萧晔、萧锋、萧鸾、萧坦之、萧遥光、萧懿、萧惠休、萧颖胄、萧宝源、萧宝义、萧衍；梁宰相萧渊业、萧宏、萧范、萧渊藻、萧会理、萧伦；后梁宰相萧欣；陈宰相萧摩诃。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萧氏又因有隋炀帝皇后之关系，不乏显宦，萧琮为宰相（内史令）。而到了唐朝，萧氏家族呈现辉煌局面，计有10位宰相。《新唐书·萧瑀传》赞萧瑀这一房云：“自瑀逮遵，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隋开科举制以后，兰陵萧氏出了5位状元：唐代萧颖士、萧邺；宋代萧服、萧国梁；明代萧时中。

兰陵萧氏迁徙述略

自西汉相国萧何孙萧彪迁居东海郡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起，萧氏在此后的400余年时间里，在兰陵共有18代。西晋末年，萧整迁居江南晋陵郡武进县故城东城里，这一支萧氏便成为“南兰陵兰陵人”。但当时在兰陵尚有萧氏未迁，这从《陈书·萧济传》和《陈书·萧摩诃传》中记载他们为“东海兰陵人”、“兰陵人”足以证明。虽然萧济、萧摩诃等与萧整一支的关系史无记述，但他们都是萧彪的后代并无疑问。

在南北朝对峙的160余年间，南迁萧氏主要活动于南朝宋、齐、梁、陈。齐梁两代分封于各地的郡王，不乏携带亲属赴任者，有的便留居任所周围传嗣。史载“皇舅房”萧引在梁末侯景叛乱时南迁广东“以存家门”：梁元帝第九子萧方智曾迁封地福建晋安（今南安县）；后梁宣帝萧誉第八子萧岑后裔迁湖南长沙外，亦有不少江南萧氏“投奔”了北朝。大体有以下六种情况：一是遭迫害和怀着不满情绪“叛逃”的，如齐明帝萧鸾第六子萧宝寅，当萧衍诛杀萧鸾诸子时投奔北魏，梁武帝萧衍第二子萧综，自以为是齐东昏侯萧宝卷子而于梁普通六年（525年）降于北魏。二是在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叛乱时逃到北朝的，如梁武帝八弟、南平郡王萧伟子萧祗及子萧放，梁武帝九弟、鄱阳王萧恢子萧退及子萧慨，一起奔于东魏，继入北齐；临川王

萧宏子萧正表太清三年正月降东魏。三是梁末成都、江陵沦陷后入北朝的，如武陵王萧纪第五子萧圆肃、安成王萧秀子萧勃及子萧济成都沦陷后归西魏，继入北周；萧懿孙萧吉、梁简文帝萧纲第九子萧大封、第二十子萧大圜，于江陵沦陷后归西魏，继入北周。四是梁亡入北朝的，如萧恢子萧泰（字世怡），萧恢孙萧该，始兴王萧憺孙萧恣，有的奔北齐，继入北周；有的到长安，入隋。五是后梁入隋的，诸如后梁宣帝萧誉第八子萧岑，后梁明帝萧岿子萧珣、萧璈、萧瑒、萧瑒等。六是南朝陈国灭亡后归隋的，如陈侍中、骠骑将军萧摩诃、光禄大夫萧允等。留在兰陵的萧氏，在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分裂局面的情况下，其中不少名士自然与原兰陵萧氏南迁宗族的后裔走到一起，官居长安及其他任所之地，为隋特别是大唐帝国的繁荣做出显著贡献。

唐朝末年，战乱不已，出现了继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之后北方人民大规模南迁的高潮。而在此之前，兰陵萧氏家族后裔有的因避战祸，有的因官守土、贸易经商等原因，先后迁徙于今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贵州、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随着岁月流逝，往往以新居之地作为籍贯，如南齐郢州刺史萧思话第五世孙萧德言，陈亡徙居关中，《旧唐书》称其为“雍州长安人”；梁鄱阳王萧恢第七世孙萧昕，《旧唐书》直云“河南人”，若无《新唐书》言其为萧恢七世孙，“世居河南”的记载，很难知其为兰陵萧氏后裔。这种情况，此后的史书中亦同。诸如《旧五代史》载后唐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南）人萧希甫传记；《宋史》载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萧注，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萧服，温州平阳人萧振，临江军（治今江西樟树市西临江镇）人萧燧，临江军新喻人萧贯，建昌新城（今属江西）人萧雷龙，永新（今属湖南省）人萧焘夫，太和（今江西省泰和县）人萧明哲等人传记；《明史》载华容（今属湖南省）人萧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萧鸣凤，泾县（今属安徽省）人萧彦及其弟萧雍，泰和（今属江西省）人萧岐，万安（今属江西省）人萧廩，庐陵人萧近高，延安卫人萧如薰和江西泰和县人萧磁、江西南丰人萧汉等人传记；《清史稿》载湖南湘乡人萧孚泗、萧庆衍、萧启江、萧庆高、萧意文，湖南蓝山人萧得龙，湖南武陵（今常德）人萧捷三，湖南清泉（今衡阳）人萧翰庆，湖南邵阳人萧良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萧震，安徽桐城人萧穆，安徽芜湖人萧云从，四川富顺人萧世本等人传记。在这些萧氏名人中，得到家谱印证的，都为兰陵萧氏后代，他们所言籍贯和萧德言、萧昕类似。即便尚未从谱牒中找到线索者，亦可证明他们源出兰陵。理由是：这从萧氏堂联、对联中可找到证据。如福建漳州追远堂堂联云：“源溯兰陵，宋代科名推首选；派分书社，清时仕籍看重辉。”湖南省民国萧氏谱戏台联云：“文著六朝，本本脉源昭日月；相传八叶，矫矫忠骨贯虹霓。”贵州《兰陵黔沿萧氏族谱》对联云：“祖君殷朝功垂汉室，宗延升帝统齐梁”，“流芳八世家声远，派源千秋世泽长”。兰陵萧氏起源与发展的历程，几乎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通史。而到现代，兰陵萧氏后裔遍布海内外。在全国13亿人口中，萧氏占总人口数的0.66%，约860万人口，2007年新公布的100个华夏大姓中，萧氏列第三十位。

萧氏堂号

堂号是中国姓氏之中某一姓氏的一个支派或一房（家族的分支）的称谓，用以标志某一姓氏或同一姓氏中的某一重要分支。堂号一般以郡望（汉代以后对每个郡显贵世族之称，意即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或始祖的居住地为名，有的直接以祖先有影响的人物、事件或突出成就为名。堂号大都具有浓厚的宗亲制度色彩与精神纽带作用，表示子孙不论后来迁居何处，都不会忘记故土的祖根。堂号主要刻写于宗族祠堂门头之上，或写在家谱、族谱封面、扉页及记载书中，或书写于书斋、店铺堂上及家

用物品之上等。

全国各地萧氏堂号有定汉堂、追远堂、兰陵堂、八叶堂、河南堂、敦睦堂、思源堂、师俭堂、正治堂、敬爱堂、昭穆堂、敦本堂、积庆堂、孝友堂、经述堂、三瑞堂、世德堂、四美堂、制律堂、友爱堂、听松堂、同文堂、笃本堂、俭让堂、永思堂、有序堂、雍睦堂、芳远堂、书山堂、斗山堂、诗礼堂、凤翼堂等。

兰陵堂：为萧氏主要郡望，其后裔以兰陵堂为徽号。福建晋江萧氏门匾均书“兰陵衍派”；福建漳州、泉州称《兰陵萧氏联修族谱》；湖北蒲圻称《萧氏宗谱〈兰陵堂〉》，贵州称《兰陵黔沿萧氏族谱》等，都以“兰陵堂”为其堂号。

八叶堂：南朝迄唐，兰陵萧氏有两大分支：一曰皇舅房，二曰齐梁房。皇舅房系南朝宋皇太后萧文寿弟萧源之的后代，因萧源之是宋开国皇帝刘裕的舅舅，故这一房兰陵萧氏称为“皇舅房”。萧源之第九世孙萧至忠，为唐中宗、睿宗宰相；齐梁房分为齐皇房、梁皇房。齐皇房指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这一房兰陵萧氏；梁皇房指南梁开国皇帝萧衍这一房兰陵萧氏。萧衍后代在唐朝有萧瑀、萧嵩、萧华、萧复、萧真、萧俛、萧倣、萧遘八位宰相；萧衍长兄萧懿后代在唐代有宣宗宰相萧邺。八叶堂以萧瑀等八位宰相为堂号。

河南堂：江西进贤有《河南郡萧氏家谱》，湖南益阳有《萧氏七修家谱〈河南堂〉》，福建武平有《河南郡萧氏族谱》等，皆以河南郡为萧氏郡望。河南郡当为地处黄河以南，或与兰陵籍萧昕等人移居河南有关，以上已言及。兰陵萧氏在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不断分支、分房而出现新的堂号，是必然之事。

书山堂：为梁武帝萧衍后代。书山祠堂位于台湾彰化县田中镇顶潭里，建于1930年，经1981年、2008年两次增建，规模很大。

斗山堂：亦为梁武帝萧衍后代。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建萧满泰祠，光绪六年（1880年）更名为斗山祠，1934年重建，2005年10月28日完成古色古香之祠貌。祠堂坐落于台湾彰化县社头乡俾斗村。现台湾有萧氏20多万人，列第二十八位。



架起生命的桥梁

——记临沂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侯子山

刘 伟



他，曾十多次担任国际国内心血管病会议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和手术演示；先后出版及参编了《介入心脏病学研究与实践》和《介入心脏病学》两部著作，独立完成科研课题1项，撰写省级以上学术论文23篇；1999年被评为山东省卫生系统先进个人，荣立二等功；2005年被评为山东省十佳医师。他，就是临沂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侯子山。

他领导的科室，1992年和1996年连续两次协助举办了“沂蒙——长城”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议；1997年被评为山东省特色专科，2000年经省卫生厅复审晋升为A级特色专科，成为山东省地市级医院中唯一的一家；2004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担任心内科主任的侯子山在临床中注意到，“风湿性心脏病”在临沂有着很大的病人群体。临沂地处鲁南山区地带，是风湿性心脏病的高发区，其中绝大部分为风湿性瓣膜病，二尖瓣单纯狭窄是最常见的病变之一。初期症状为瓣口狭窄肺郁血引致的呼吸困难。起初在重体力劳动后出现气急，继而中等度和轻度劳动后也出现气急。有的病例呈现类似哮喘的发作，心悸、阵发性心房颤动、乏力、易倦、头昏等症状。病人可有反复咯血，晚期病例可呈现肝肿大、腹水、皮下水肿等右心衰竭症状。

一些风湿性心脏病病人往往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的患者痛不欲生而自杀。这种病，从医学的观点看来，是一种顽固的、不易攻克的医学难题。以至于长期以来，形成了“大医院不想治，

小医院看不了”的状况。一般的病人用药物控制病情，情况严重的病人只能进行心外科开胸手术。

侯子山肩负着为广大患者解除病痛的责任感，执著地介入了这一领域。

经多方学习、研究和总结，他选择了“经皮穿刺球囊二尖瓣成形术”，一个1984年世界首次临床报告的新技术。将一个具有自身定位能力的二尖瓣球囊导管，经皮穿刺股静脉沿股静脉进入右心房，经房间隔穿刺将球囊送至狭窄的二尖瓣口，充盈球囊，使之狭窄的二尖瓣口扩张成形。病人是从二尖瓣交连部粘连处扩开，使瓣膜的扩开部分和瓣下的软组织重新组成一个新的闭合线，既解除了二尖瓣狭窄的问题，又不造成二尖瓣的严重副损伤而至二尖瓣关闭不全。

但是，要掌握这门技术谈何容易？需要手术者深悉心脏结构，对穿刺的感知、进入的深浅、定位都要了如指掌。1985年国内出现首例手术，到1990年，能够实施这项手术的也只会有一些老牌三甲医院，从来没有在市级医院开展这种手术的先例。

一台老旧的肠胃机，没有专门的手术室，没有任何介入手术经验的人员，这是心内科当时的家当。

简陋的工作条件不能阻碍倔强的侯子山前进的步伐。人员没有经验，就请来北京安贞医院的马长生教授做指导。没有合适的铅衣，侯子山自己做了一个小围裙，填上铅板，成为简易铅衣。整个科室只有这一件铅衣，外地专家会诊进行手术，侯子山就暴露在X线下观察。仅有的老式胃肠机工作不正常，侯子山又想了很多土办法。病人造影图像模糊，侯子山就趴在屏幕上瞧，反复推照影剂显影，有时候也顾不上辐射危害直接到台前。胃肠机不能摆体位，为了使病人透视有立体感，侯子山就做了一个支架给病人带上，使病人侧身，产生立体效果。

1992年，“沂蒙——长城”国际心脏病介入学术会议在临沂市人民医院举行，侯子山现场进行了经皮穿刺球囊二尖瓣成形术演示。作为山东省第一家开展此项高难度手术的地市级医院，侯子山得到与会代表和专家的一致肯定与好评，不间断的热烈掌声毫不吝啬地给予了他。2002年，侯子山又在全国最早开展了经皮金属分离器二尖瓣扩张术。2005年5月27日，作为手术演示组的四名专家组成员，侯子山在江西南昌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先心病、瓣膜介入学会上，作了专题讲座《经皮球囊二尖瓣成形术栓塞并发症的防治》，获得全体与会人员的好评。

娴熟的技术令人叹为观止。病人慕名而来，在侯子山门诊室里，诊桌前总是挤满了病人。患者有本省的，

也有从广州、哈尔滨、江苏、浙江等地远道而来的。

2006年6月的一天，日本友人田中周造年内第三次来到临沂市人民医院。作为一个在日本政界、经济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客人，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人民医院，特别是侯子山主任，他说：“我知道我的病很重，在这里住院时，我很想结束治疗，不再受这种痛苦。是你们精湛的技术解除了我的痛苦，谢谢诸位！我特别向侯子山主任说声感谢，因为每当我痛苦难耐的时候，侯子山主任来到我的面前，鼓励我坚定信心，是他给予了我活下去的力量，带给我希望。”

事情还要追溯到2005年，前来临沂进行友好访问的田中先生饭后感觉胃有些不舒服，却没有在意，在越发疼痛难忍的情况下来到临沂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急性前壁广泛心肌梗死造影显示心脏血管狭窄部位达90—95%，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生命危险。侯子山作为专家组组长全力投入治疗工作。

猖狂的病魔在肆虐，病人时常发生血压骤降的情况，心率一旦达到80，血压马上下降到只有50~60毫米汞柱，非常危险。最严重的时候，12小时内病人出现血压骤降20次，全靠强心针急救。保守治疗难以遏制病魔，怎么办！只能施行手术。

做这个手术不但有医疗风险，更大的压力来自日本。田中先生在日本政经界的影响力极大，一旦失败，来自日本的责难是可想而知的。

侯子山顶着巨大压力接受了任务。

他带着医护人员们翻阅资料，研究病例，反复论证，终于制定出多套手术方案及应急措施。在手术台上，思想高度集中的侯子山沉着地一步步进行手术。开始一切顺利，但当侯子山准备植入支架时，病人血压急剧下降，心脏急剧收缩。侯子山当机立断：手术不能停，注射升压药，继续手术！靠着不断注入的升压药物，一个小时后，两个支架终于被安安稳稳地放入田中的冠状动脉。两个星期后，田中先生康复出院。

这，只是侯子山所做的数千例手术中的一个缩影。至今，侯子山独立完成各种心脏病介入手术已超过4000例。其中，经皮球囊二尖瓣成形术1300余例，数量创全国之最，各种类型起搏器安置术250例，临时起搏器70例；完成射频消融术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心房扑动、室性心动过速500例；完成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2000余例，急症PTCA支架术60余例；先心病介入封堵术150余例；心包穿刺800例。1997年侯子山率领的心内科被评为山东省特色专科，2000年经省卫生厅复审晋升为A级特色专科，成为山东省地市级医院中唯一的一家。

临沂是革命老区，虽然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农民群众的收入不断提高，但对于心脏手术动辄数万元的花销，多数人还是难以承受。有些贫困的病人为了节省费用，靠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几个馒头充饥，硬梆梆如同石头般的馒头就着咸菜，喝着热水就是一顿饭。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侯子山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痛，他总是毫不犹豫掏钱给予帮助。

一次，病房里住进一个六十多岁的五保户。因为老人的身体原因，暂时无法进行手术，侯子山将老人安排进行保守治疗。老人身边开始还有一个远房亲戚在那里照顾他，并替老人交了五百块钱押金。几天以后，那个亲戚借口回家筹措医药费一去不复返，将老人丢在病房。当侯子山得知时，老人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侯子山马上自己掏钱从食堂打来一份可口的饭菜交给老人，并为老人垫付了住院期间全部伙食费用。

患有扩张性心肌病的18岁女孩小王，在心内科住院多日，病情不见好转，小王逐渐产生消极情绪，她的家人在知道孩子治愈效果差后，态度也变得冷淡，时常三五天不来看望小王。情绪的低落、家人的冷淡使得小王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她选择了绝食并拒绝治疗，病情日益恶化。侯子山带头牺牲休息时间，给小王喂水喂饭、谈话宽心，先后带头捐款捐物3000多元。关爱与治疗并举使病人的病情逐渐好转，出院的当天，家属送来了感激的锦旗。

1993年之后，随着“红包”的日益蔓延滋长，侯子山感到十分痛心，又有点无能为力，只能洁身自好，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尽量给予制止。

为了避嫌，就是一些至亲好友的礼物，侯子山也拒收。实在无法退回的，就用另外一种方式解决。苍山县的一个换瓣手术患儿，住院期间其母亲给他送来一袋大蒜。侯子山知道病人家境贫寒，坚决拒绝，可那母亲泪眼婆娑，竟然要下跪，并说如果不收下，就是不想尽心尽力的给孩子治病，他只好收下，随后就买了牛奶、鸡蛋等营养品给孩子送去。

心血管疾病具有发生突然、病情凶猛、症状复杂的特点，即使是高年资的大夫有时也会被一些表象所误导，延误治疗，造成对病人的伤害。侯子山经常对值班医生、护士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旦病人有情况，不管什么时候一定打电话给我”。

2003年冬的一个大雪天，下午刚刚做完三台手术的侯子山抵不住连日来辛勤工作的劳累，发烧39度，患上了重感冒。浑身疲惫无力，8点多就服药躺上了床，职业习惯使他随手将小灵通放在伸手可及的床头柜上。

凌晨2点，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起，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的侯子山眼睛尚未睁开就接听了电话：科室刚刚收进一位前壁心肌梗死的病人，病情十分危急。侯子山立即回答：“我马上就到，通知导管室，准备手术！”同时被吵醒的老伴劝道：“你年纪这么大了，感冒又这么厉害，再去吃X线，不要命了？”

“既然当了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就是我的首要责任。”侯子山穿上衣服就走出家门。2个小时后，手术完成，病人病情稳定下来，侯子山才舒了一口气，睡意、疲乏一起涌来。

因为长时间处于X线照射下，侯子山的身体受到很大伤害，左腿外侧汗毛全部脱落，1997年时血象一度出现问题，细胞形态发生变化。当时在内分泌科工作的一个老同学看不过去，劝他：“老侯，咱别干了吧。”家人也不放心，都劝他不要再干。侯子山也有些动摇了，一夜夜辗转反复彻夜难眠。但当老侯看到一个个危重病人通过手术转危为安、获得新生，看到病人家属由术前紧张忧虑、愁容满面，到术后露出会心的微笑、连声道谢，侯子山心里就又会变得热乎乎的，苦累疲劳、家人的担忧、射线的伤害，统统被他抛到脑后。为了病人，侯子山毅然决绝的留在心内科。

大爱无言，大道无形。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描述，不需要更多的词藻雕琢，侯子山主任的形象，已经生动地竖立在广大沂蒙百姓的心中。

《苍山县地方志编纂工作管理办法》2011年1月出台。

《莒南年鉴（2007—2009）》2011年1月出版发行。

《蒙阴县电业志》2011年1月出版发行。

《临沂年鉴（2011）》开始组稿

2月10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临沂年鉴〉（2011年）组稿方案的通知》，对年鉴的内容、编写方法、行文规范、注意事项、各供稿单位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并要求各单位于3月10日前完成供稿任务。

全市史志系统开展学习优秀志书活动

2月11日，市史志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开展“学习优秀志书，提高〈临沂市志〉编修质量”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县区史志办、市直各《市志》承编单位结合自己的编写任务，组织编写人员，从记述观点、篇目设置、记述方法、资料运用、行文规范等方面认真学习市史志办推荐的优秀志书，通过学习，加快编写进度，提高编写质量。

临沂方志馆建设被列入“十二五规划”

在2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临沂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方志馆建设列入“繁荣文化发展事业”中，这是方

志馆建设第一次列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

市史志办公室被授予临沂市文明机关

2010年，市史志办公室高度重视文明机关创建工作，成立了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创建文明机关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为各科室明确了创建目标和责任，每季度对创建工作进行检查督促，促进了创建工作的健康开展。结合创建工作，加强了对办公室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了干部作风建设，健全完善了办公室各项工作制度，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文明机关创建工作顺利通过了市文明办的检查验收，2011年2月被授予临沂市“文明机关”荣誉称号。

郯城县、平邑县、兰山区《地方志编纂工作管理办法》2011年3月出台 至此，全市九县三区《地方志编纂工作管理办法》已全部出台。

《临沂市志》编修工作简报（一）

自2010年《临沂市志》编修工作开展以来，绝大多数承编单位能够按照《〈临沂市志〉编修方案》要求，成立修志工作领导小组，确定撰稿人员，并组织人员参加《临沂市志》编修业务培训，制定下发文件，将收集资料、纂辑资料长编的任务分解到各有关科室，积极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很多部门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有专人分管，有经费保障

和办公场所，修志人员稳定，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主动与市史志办工作人员联系沟通，在修改完善篇目的基础上，多方查找资料，积极开展资料长编的纂辑工作。

至2011年1月，市老干局、畜牧局、发改委、计生委、临沂报业集团、市政府调研室、中级人民法院、市粮食局、邮政局、总工会等单位已完成或基本完成资料长编。其中，市老干局撰稿人员采取得力措施，在收集资料上狠下功夫，保质保量完成了资料长编。随后，严格按照行文规定扎扎实实开展工作，认真撰写初稿，并根据市史志办初审的意见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修改加工，保证了初稿质量。在为《临沂市志》供稿的一百多个单位中，市老干局率先完成了初稿撰写任务。市畜牧局组织人员认真钻研史志业务知识、加班加点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7.3万字的市志资料长编。以上单位认真负责、扎实工作的作法，为全市各部门单位树立了好的榜样，也为全市二轮修志工作创造了好的经验。

未完稿的单位中，多数单位已经部署，正在积极行动中，将于近期报送资料长编。但也有少数单位领导对史志工作认识深，重视不够，编修人员变动频繁，工作被动，已经影响了市志编修进度。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征文启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本刊特征文予以刊载纪念。

1、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治国创业、改革开放历史为内容，真实再现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前进的丰功伟绩。

2、文章形式以写史纪实为主。回忆录、报告文学、纪实散文均可，字数保持在3000字以内，文章最好辅以照片。

3、文章必须是未经公开刊发的，一般要求采用电子文稿的方式投送。

电子信箱为“yimengshizhi@163.com”，邮寄文稿投递地址为“临沂北城新区天元商务大厦634室，邮编：276000，联系电话：0539-8727560”。

4、文章截止日期为2011年6月15日，未经采用本刊不做退稿处理。

《沂蒙史志》编辑部